

主 办：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院

临沂市地方史志研究院

主 任：姜仕礼

委 员：李洪彦 段 洪 唐少清

卢少林 王文博 王卫东

陈宏图 李树峰 夏洪雷

黄夫群 刘如彬 程丽丽

邵 勇 杨 岩 侯宗良

刘焕英 周宗青 石洪欣

主 编：李洪彦

副 主 编：段 洪 呼国英 高 雷

特邀编审：曲文军 王纪明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美术编辑：胡拙安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1310012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护送王树声去山东解放区

余秉熹（安琳生）口述 何光耀 整理 04

【峥嵘岁月】

老红军常万富（上）

李 冰 10

鏖战齐鲁（八）

吴瑞林 16

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抗日政权的创建和发展（中）

赵 炯 19

【名人素描】

曾国华传（七）

王连城 曾林辉 24

张文俊：我的艺术年表

27

【史海撷萃】

高赞非与梁漱溟

林桂臻 整理 32

【文化掇英】

沂蒙大地一支笔（四）

——惠玉昆先生的书法历程和业绩

刘瑞轩 35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山东的音乐活动

章 枚 38

抗战时期的沂蒙农村剧团

郑玉强 44

【探索发现】

东夷故乡寻踪（四）

高 雷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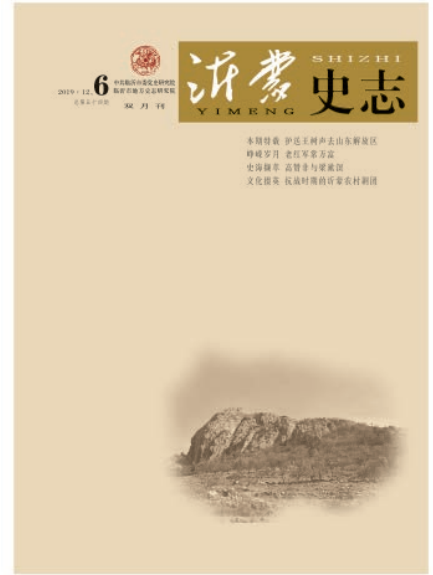
刘墉祖籍日照考

夏 勇 54

【文史论坛】

沂水“孟母故里”考（上）

刘海洲 59



地 址：临沂市北京路17号
 行政服务中心655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2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印 数：2000册

发送对象：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院系统内部

【影像沂蒙】

《沂蒙抗日根据地地图志·人物》——朱 瑞

本 编 62

【蒙山沂水】

“沂蒙山上好风光”之一——虎头崖

王相理 64

【诗画赏析】

钱谦益《费县道中》赏析（二）

平 凡 66

【史料辑存】

清代的山东东路驿道及十二邮驿

赵建国 田 忠 68

国民党临沂监狱的酷刑

搜 狐 71

【百家渊流】

山东日照、临沂两地区的明初“东海”移民

海曲申 73

【沂蒙乡亲】

军旅一枝花

——女汉子气息的车星

安迪妹 76

南下云南边陲（三）

——记父亲张明远

张小平 张昆华 78

【工作动态】

本 编 80

封面：虎头崖

（详见本期《“沂蒙山上好风光”之一——虎头崖》）

封底：笔无代术惟在勤练，变化之态皆由此处生。——龙溪说画
 胡石/书

护送王树声去山东解放区

余秉熹（安琳生）口述 何光耀 整理

受命运安

1947年2月，寒风凛冽，残冬犹存。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经受着国民党军空前残酷的“清剿”。

为了避敌锋芒，保存力量，鄂西北区党委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决定留少数部队就地坚持斗争，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继续牵制敌人；并决定一些年岁较大、身体不好的领导同志，化装离队，转移到华北、山东或其他解放区。

月初的一天，我被一道紧急命令叫到军区司令部——一间简陋的民房里。

“安琳生同志，你辛苦了，快请坐。”鄂西北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第一副政委刘子久亲切地叫着我的原名，热情地招呼我。

落座后我才看清，屋子里还坐着鄂西北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文敏生，鄂西北军区参谋长张才干，鄂西北区党委委员、行政公署副主任刘子厚。

刘子厚走过来，神情严肃的向我交待任务：“中央和中原局指示，王树声同志要尽快撤离鄂西北，转移到山东解放区去，区党委决定，由你负责护送，你有什么意见？”

“护送王司令员到山东解放区？我……”我迟疑着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王树声是我军高级将领，时任鄂西北区党委书记、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护送他到山东解放区，的确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任务，稍出差错，就会使党蒙受重大损失。而从鄂西北到山东，千里之遥，要闯过敌人道道封锁、层层关卡，谈何容易！更令我担心的是，从鄂西北到武汉这一段，沿途多属我以前活动过的地域，很容易被人认出，加上我们多年在山野丛林中转战，脚上有褪不掉的草鞋印，手上有硬梆梆的握枪的茧子，难以躲过敌人的盘查。

“困难是有的，但我们相信你能够克服。”张才干参谋长打断我的沉思：“你搞过多年的财税工作，与国民党、三教九流打了不少交道，有这方面的经验。护送王司令员的任务，非你莫属啊！”

文敏生副政委也说道：“蒋管区并不是铁板一块无空可钻。我们有党的领导，有拥护和支持我们的群众作后盾，还有地方党的同志的全力



王树声（1905—1974年），原名王宏信，汉族，湖北麻城市乘马岗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与领导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946年6月，参与指挥中原突围，率左路军先后突破敌重兵防守的平汉铁路和汉江防线。8月初，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7年7月，随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任鄂豫军区司令员。

配合，相信你能够圆满完成任务！”

首长们的一席话，使我信心倍增。面对组织上的重托，我毅然把任务承担了下来。

隐蔽荆门

由于几个月来艰苦转战，日夜操劳，王树声司令员身体非常虚弱，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先到荆门隐蔽一段时间。

为了确保第一站的安全，军区领导又派熟悉情况的荆当远中心县委的王展、章惠民两人及几位战士一起护送。

2月中旬的一天夜里，王展、章惠民、我与王树声及他的警卫员崔银茂等几人打点好行装，换上便衣，准备出发。就要离开曾经战斗、生活过的鄂西北根据地，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我们心情都十分难过。王树声更是依依难舍，他眷恋着亲手开创的根据地，眷恋着坚持战斗的同志们。临行前的最后一刻，他还召集在场的几位领导同志，重申中原局的指示，鼓励大家加强团结，坚定信心，迎接胜利。在同志们的再三催促下，我们才踏上了去荆门的路途。

第二天黎明前，我们顺利地到达了荆门革集，北山工委的丁锐、段玉美在此接应我们。段玉美的父亲住在这里，老人家热情地招呼我们住下。王展、章惠民等同志完成第一站的护送任务后，即与我们告别，去执行新的任务。革集距荆门县城不远，县城里的敌人经常从村子边路过，很不安全。我们征得王司令员的同意，在一周内又转移了两个地方，最后转移到比较偏僻的段家湾，在段玉美的姐姐家悄悄隐蔽下来。王树声足不出户，读书静养。

转眼20多天过去了。一天早上，王树声把我叫去，伸展着双臂说：“老安啊，你看我休养得咋样了？”

我心里明白，司令员早就憋不住了，便安慰他说：“您放心，我们已准备得差不多了。”

自打王树声住下后，我们便开始筹划下一步的行动。

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必须取得“合法”的身份。我和段玉美等反复商量，决定动用荆门县绝密的地下党关系——在国民党西流河（现为子陵铺镇）联保处工作的廖东周。廖很快便为我们弄来了两张通行证。经过研究，决定王树声和我化装成做烟叶生意的商人，王树声改名为刘义发，身份是老板，我易名张厚生，是伙计，先经沙洋、皂市到应城，然后再设法到武汉。同时又请人为王树声和我各做一身新棉布衣裳，巧装打扮。

一切安排妥当后，我又让段玉美到我的家乡应城，将我父亲的学徒镇成章请来。镇虽不是党员，但同情革命，思想进步，与我情同手足，十分可靠。他为人仗义，交往甚广，在鄂中一带小有名气，有他作掩护，我们会方便许多。

几天后，镇成章即随段玉美来到荆门我们的住处。他详细介绍了鄂中一带的敌情，并同我们一起研究了行动计划。为防敌人搜查，我们又决定把王树声的一支左轮手枪、我的一支驳壳枪和一支小手枪留下来，请荆当远中心县委代为保存。

一切准备就绪，只待上路了。

夜宿沙洋

3月初的一天，王树声、我、镇成章三人，大步流星地走在去沙洋的公路上。王

树声同志心情极好，一边走，一边打趣道：“我这辈子，还从未尝过商人的‘鲜’，今天扮个烟商，你们看象不象啊？”

“象，挺象！”镇成章应和着。

哪里象得起来？且不说满脸的胡茬，别别扭扭的蓝布棉袄，光看那大跨步走路的样子，就没有一点商人的味。我心里这么想着，口里还是开着玩笑提醒道：“刘老板，你的耳朵可是有点聋呵！到了沙洋，别忘了少说话。”装聋，这是我们预先商定好的，为的是怕话多漏嘴，让敌人看出破绽。

不知不觉地快到沙洋了，我的心也紧缩起来。

沙洋地方虽然不大，但扼水（襄河）陆（汉宜公路）要道，是敌人在鄂中的一个重要据点。国民党在此驻有重兵，而且对来往行人盘查十分严密。怎么应付过去呢？走着想着，我们来到一家茶酒棚前。走了一天的路，肚子早已饿了，王树声提议吃了饭再走。

刚落座，就听见叽叽喳喳地闯进几个人来，定眼一看，不好，是几个国民党兵。

“老板，炒几个菜，拿两瓶酒，咱哥儿们快活快活。”为首的一个家伙操着一口浓重的咸宁腔，怪声怪气地叫着。

坐在一旁的镇成章灵机一动，拍了拍我的肩膀：“琳生，进城有法了。”说着就端起酒杯向几个国民党兵走过去。

镇成章直冲着怪叫的家伙说道：“老总，听口音您是咸宁人，咱们是老乡呵！”

镇成章的确原籍在咸宁，转眼间便操起了一口流利的咸宁腔。

“老总”一见遇上“阔气”的老乡，顿时客气起来。镇成章与他左一句，右一句，又要了几个炒菜，与“老乡”共饮起来。

几杯酒下肚，那家伙早已忘了自己姓什么。

镇成章顺势讲到要进沙洋城，可又没关系、怕找不着住处。“老总”把胸脯拍得嘣嘣响：“没关系，进城、住宿全包在我身上了。”那家伙也真不“食言”，带着我们三人顺利进入了沙洋城，并为我们找到一个不错的住处。晚上，我们还以他的“招牌”，避过了敌巡逻队的检查。

奔赴汉口

闯过一关又遇一关。

如何到应城？步行，路途太远；乘公共汽车，沿途要经多处检查，且极易遇上熟人，风险很大。我和王树声讨论了几种方案，都觉得不妥。

还是镇成章有办法，他提议坐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汽车。这种车不受检查，按规定不能搭带押运货物之外的任何人。但司机和押车的士兵们大都是些贪得无厌的家伙，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都愿意做。

按照计划，我们三人早早地混出了沙洋城，到城外不远处的一个临时的车站等车。等不多久，便见一辆印有联合国救济总署标记的带篷卡车开过来。镇成章赶紧上前拦住车。司机和两个押车的家伙一见白花花的银元二话没说便让我们上了车。

卡车一路颠簸，载着我们直驶应城。打了一会盹，天已经亮了。借着透过篷布的阳光，我定神看了看车厢，不禁吓了一跳：车里还坐着一个应城西河渡姓张的家伙，此人在国民党县府里供职，仇视革命，而且还认识我。

坐在一个车厢，万一我被他认出，后果就不堪设想。我赶紧拍醒身边的王司令员和镇成章，示意他们情况异常，准备见机行事。我自己也赶紧转过身去，埋头佯装打盹。

就这么一直熬到天黑，车到天门皂市，姓张的家伙下了车，我心上悬着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我们一行三人在应城龙王集附近的雷家巷车站下了车，然后兵分两路，前往潘家集。镇成章的家就住在潘家集。在镇家后门附近几百米远的地方，有敌人的一个营房，驻有约一个连的国民党军。我们根据在多年的敌后游击战争中总结的对付敌人搜索的好经验——“贴烧饼”。就是在敌人“扫荡”时隐蔽到敌人据点附近去，这样看似危险，实则安全。骄狂的敌人往往不会想到，他们抓捕的对象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

我们决定把王树声暂时隐蔽在镇家。因为镇成章行侠仗义，广交九流，与国民党军也“过从甚密”，所以敌人不会轻易地怀疑或搜查他。

但安全也不是绝对的，虎口藏身时间一长，就难免被敌人发现。所以，我们决定尽快将王树声转移到汉口。

为确保行动安全，我又利用在家乡的关系，秘密地弄到了两张身份证，王树声易名为刘兴茂，我名为余秉熹。从此，“余秉熹”的名字就被我沿用下来，至今未改。

取得“合法”身份证后，我考虑到王司令员不易被人认出，而我则难免遇上熟人，如被人认出，不仅不能掩护王树声，而且还会连累他。因此我提出分途到汉口，王树声表示同意。

为避免出现意外，我又找到曾任我党秘密交通多年的鲁文成，请他护送王司令员赴汉。他欣然接受了我的托付，护送王树声从陆路安全抵达汉口。

王树声离开潘家集的当天下午，就有同志秘密通知我，说叛徒李春山已得知我回家，准备去告密。我当即告别了亲人，利用关系脱离了险境，之后从刘家隔乘船，由水路安全抵达汉口。

到汉口后，我按照组织上给的联络地址找到了我以前的警卫员肖秀楷。

肖受组织的委派，以开皮鞋店为掩护，专门负责接送过往的领导同志。我约他一起直奔我事先与王树声约好的联络点，顺利地找到了王树声，并把他接到肖秀楷安排好的住处。我和肖经过商量，给王树声做了一件上等丝绸棉袄。王司令员乐呵呵地对着衣镜说：“这下可成了真的阔老板了。”

辗转抵沪

3月的武汉，阴雨连绵。

王树声心系着解放区，不愿在汉久留。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在联络站开了一个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参加会议的除王树声和我外，还有肖秀楷和联络站的张鸣皋。

王树声首先发话：“汉口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我看还是早走为宜，以免生出什么枝节。怎么个走法，请大家讨论讨论，各抒己见吧。”

对于下一步的行动，几天来我也一直在考虑，只是觉得把握不大，所以没有与大家商量。听王司令员这么一说，我也就没什么顾虑了，把心中的想法和盘托了出来：

“下一步的行动，我考虑有三个途径：一个是先乘船到南京，再坐火车至上海，通过上海地下党想办法到解放区；再一个是先乘船到南京，从南京转扬州进入苏北，据说扬州附近有我们的税卡，只要能找上税卡就行了；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找我在国民党空军搞翻译工作的同学，请他为我们搞两张到华东的通行证，就说我们是去探亲的。”

肖秀楷说：“找税卡进苏北风险很大。据了解，最近国民党军对我们的税卡盯得特别紧，为了避免损失，原来的许多税卡都拆掉了。万一我们到扬州附近找不到税卡，岂不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挺进中原的王树声
(右一)，左一为刘
伯承，左二为邓小平

张鸣皋也说：“托人搞通行证，以探亲的名义进解放区也不很安全，敌人对这方面也查得很严。”

“到上海通过地下党帮助进入解放区倒是很可靠，只是这沿途怎么应付？到上海语言不通，人地生疏，怎么安身？”我道出了自己的顾虑。

“我有一个堂弟在上海做榨菜生意，对上海较熟，可不可以先去找他？”张鸣皋听我一说，赶忙插道。

“我看可以。”静静地听我们发言的王树声，这时站起身来一只手拈起身上的丝绸棉袄的衣角，微笑着说：“至于身份吗，还是老板，不过这次得变一变，不是烟叶商，而是榨菜商。”停了停，他又把脸朝着我说：“怎么样？”

“行，行。”我连连点头，补充道：“这样，我们在应城弄的身份证还可以继续使用。”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下一步就是买到南京去的船票。

那时，从武汉到南京的船班次少，票很难买。而且船上人杂，国民党特务、军官、政客充斥其中，也不安全。我们与王树声商量后，决定使用“囤黄鱼”的办法。所谓“囤黄鱼”，就是不买船票，而是设法上船找机房的船员，塞给他们一些钱，白天人就藏在机房睡觉，晚上混进统仓。这样人虽苦一点，但可以躲避检查，比较安全。

张鸣皋对船码头较熟，我们三人顺利地上了船（为了缩小目标，我们让肖秀楷留在武汉），经过两夜一天，总算安全地到了南京下关。

第三天夜晚，我们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王树声坐在靠窗的座位上，透过车窗望着深邃的夜空，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喜悦。我和张鸣皋紧挨着他，心情也都很愉快。到了上海，有地下党的帮助，一切就好办了！

“陈策生——”突然有人喊起一个我熟悉的名字。我赶紧欠起身，循着喊声的方向望去，只见隔我们座位两排远的地方，一位少女正和一名身着国民党海军军官制服的人热情地交谈着。

那军官正是陈策生——我中学的同班同学。此人迷恋权势，在国民党内混得很红，曾被派往英国海军“深造”。万一我被他发觉，后果将十分严重。

我轻声向王树声汇报了情况。王树声让我保持镇静，并与我调换了座位。我赶紧埋起头，趴在茶几上佯装睡觉。

过了一会儿，陈策生与那少女起身离开了车厢，再没见他回来。

一场虚惊总算过去了，我们平安地抵达了上海，并顺利找到张鸣皋堂弟的榨菜铺。

会师诸城

在张鸣皋堂弟的介绍下，我们住进了榨菜铺附近的“浙江旅馆”。当时，上海的国民党警察每天都来检查，挨个盘问，搞得十分紧张。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又把王树声转移到榨菜铺住下，我和张鸣皋则抓紧与上海地下党联络。

通过蔡承祖，我们与张执一接上了关系。张执一对王树声的转移工作非常重视，亲自把王树声安排在蔡承祖家住下，然后研究和布置下一步的转移工作。

一天，张执一把我叫去，他说：“前一段的护送工作做得很好，组织上和树声同志都很满意。目前你们虽然到了上海，但任务仍然很重，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我们已决定派陈祥生和你一起，立即从上海起身，经宁波到舟山沈家门，与那里的党组织联系，由他们安排帆船送树声同志到山东。”

根据执一同志的指示，我和陈祥生护送王树声经宁波到达沈家门。但在接头地点等了整整一天，不见接头的同志来。我们敏锐地感到，一定是地下党出了问题。

王树声很镇静，他分析了情况，认为敌人并未察觉我们的到来，目前只要我们不擅自行动，不会有大的危险，建议再等一等。我和陈祥生考虑到在沈家门人地生疏，安全没有保障，决定先回上海，另想办法。

回上海后，我们立即把情况向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经查，宁波的地下党遭到了敌人的破坏。看来，再经宁波、沈家门去山东，已经不可能了。

上海地下党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决定王树声从江苏浏河乘船走海路到山东。此时，原中原军区一纵二旅旅长杨秀坤也化装到了上海，党组织决定杨同时转移到山东。为缩小目标，决定分头行动：陈祥生护送王司令员乘一条船到山东日照；我护送杨旅长乘另一条船到烟台。在上海地下党的精心组织下，我们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和1个多星期的海上航行，终于先后胜利地到达了山东解放区。

1947年6月的一天，在山东诸城，我和王树声司令员胜利会面了。几个月的辗转奔波，王司令员更加消瘦，脸色黝黑，但精神抖擞，威风不减。他身着崭新的军装，腰间紧扎着宽厚的牛皮带，黄亮的枪套里，插着一支乌黑的左轮枪。我大步走上前去，握着他那早已伸出的大手，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激动的泪花不停地滚落下来。王司令员也很激动，他紧紧握着我的手，口中一个劲地重复着同样的话语：“你辛苦了，安琳生同志！”

老红军常万富 (上)

李冰

说起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传奇人物，就不能不谈老红军常万富。他在刘志丹受伤后亲背刘志丹上黄河渡船；刘志丹牺牲后，他又是一一五师林彪的骑兵警卫排长，在林彪平型关大战后受伤时他又亲背林彪送至延安。后随一一五师东进山东，他仍是师部警卫排长，跟着罗荣桓和陈光征战到1940年。八路军扩编太快急需粮草时，他又成了鲁中军区的粮秣委员。他的一生充满了神奇。

我的大姐李美秀，1945年冬经鲁中军区后勤部霍士廉特批，将我母亲从沂蒙山的高湖烈士陵园移回老家南峪村与烈士父亲合葬后，就大病一场，住进了八路军的野战医院。而由部队批准被派助大姐迁母回村的常万富大哥哥，却真爱上了这个秀气、老实、憨厚而又倔强的姑娘。他已离不开她了，后来还真成了我的大姐夫。这个老常从我母亲的领导、亲密战友，从我的叔叔一大哥哥一大姐夫，角色不断转换，还真和我们家有着不解之缘。

记得母亲因公牺牲后，尚在吃母乳中的我，哭得死去活来，只有常大哥哥能哄我，比我的姐姐们还灵。

毕竟母亲和他有三年多的战友情。三年中，我和每个姐姐都只见过一、两次面，而和常大哥哥却是经常在一起，所以感到大哥哥比姐姐们更亲切，更熟悉。他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是高大的英雄，是无所不能、任何困难都挡不住的奇人。

我的姐夫常万富，1916年农历八月初六出生在陕西省安塞县砖窑湾镇贾居村一个贫民家庭、几辈佃户，自幼放羊牧马，身板结实，有着一身好骑术，练就得一手好枪法。

13岁时，当他看到贫苦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还不够地主的地租，而遭受欺凌时，深恶痛绝。于是，不甘地主、劣绅欺负，毅然参加了刘志丹陕北红军少年儿童团。

1933年，17岁的常万富告别家乡，正式参加刘志丹领导的红



常万富

军。由于他工作积极，热情高，善于团结人，参军不久就担任刘志丹的扩红队长，曾创下了一夜动员20人参加红军的记录，为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的发展与扩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他还积极参与筹粮、筹钱等方面的工作，多次受到嘉奖。

1934年1月，参军仅一年的常万富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4月，刘志丹指挥部队打了一场大胜仗，缴获了敌人数百匹战马，遂决定成立陕北红军骑兵团，由谢子长任骑兵团长。因精通骑术，常万富被任命为刘志丹总部骑兵警卫排长。从此与刘志丹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5年9月，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经千辛万苦，从鄂豫皖苏区到达陕北的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不久，徐海东部与刘志丹部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常万富又成为十五军团指挥部骑兵警卫排长。自17岁任扩红队长起，人们就尊称他为老常，至他93岁辞世时，还是永远的老常。

1935年10月，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因常万富原为刘志丹部扩红队长，又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对陕北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特别熟悉，他又是十五军团团部的骑兵警卫排长，因而十五军团及陕北地方武装与中央红军间的联络工作，自然落到常万富的肩上。他经常给我们讲他所经历的几件事。

一、老常与刘志丹

刘志丹是常万富的革命领路人，他入伍后又从扩红队长成长为刘志丹的骑兵警卫排长，因而与刘志丹有着特殊的感情。

在刘志丹及陕北一些领导人挨整被关押时，有的地方武装的领导被无辜杀害时，老常曾消沉、悲观过。然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又给他燃起了革命的希望。他以无限的热情，投入到和中央的联络工作中，希望有机会能救出恩人刘志丹以及他所敬重的被关押的陕北红军领导们。

这天中午，在陕北黄土高原的一条山间小道上，十几匹战马向吴旗镇方向飞驰而去，马队过后，留下一条滚滚黄龙。一匹雪白的骠马奔驰在最前面，驾驭它的就是人称“神骑手”的常万富。

自毛主席带领的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吴起镇后，常万富已不记得这是第几次奔波在吴起镇和洛河之间，为毛主席带领的中央红军和西北我党地方武装进行联络沟通工作了。

这次他又带着任务来见毛主席，他的心情异常迫切而又激动。到了毛主席的所在地，一行人驻马勒缰，在毛主席警卫人员引导下，到达毛主席的办公室。

当时，周恩来副主席、刘伯承、叶剑英等领导全在。

常万富把要交毛主席的文件交完以后，壮着胆子对毛主席说：“有些地方武装的领导想见毛主席，让我问一问。行不？”

毛主席笑着说：“我在长征路上看国民党的报纸就知道，陕北出了个刘志丹，还建立了根据地。我就是来找刘志丹的，我来陕北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见到刘志丹呢？”

常万富急忙说：“刘志丹被当反革命扣起来了，现在被押在洛河川。”主席听后，十分诧异，刘志丹是陕北革命的领路人，怎么会被扣起来了。马上让常万富一行带着周恩来来到洛河川去解救刘志丹。周恩来跟着常万富一行人来到洛河川，看到刘志丹躺在用砖头垒的棺材似的小空间中，两手被绑在胸前，吃饭由刘志丹的部下喂食，

见此情景，周恩来大怒，旋即命令马上给刘志丹解开绳子，放他出来。

被解开绳子的刘志丹一脸憔悴，胡子拉碴，还是不敢从这个活棺材中爬出来，他哀怨地对周恩来说：“他们说了，我要是从这里出去，他们就活埋我。”

周恩来更火了，立即命令：“你们快把他扶出来！”

常万富忙向刘志丹介绍：“这是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周恩来副主席，是毛主席派来的，您快起来吧！这下您有救了。”

几个人忙上前把刘志丹从这个活棺材中扶出来。刚站起来的刘志丹“噗通”一声就给周恩来跪下了，几度哽咽着说：“谢谢毛主席，谢谢周副主席，您救了我的命！”说着已是满脸眼泪纵横。

周恩来忙向前一步，双手扶起刘志丹，深情地说：“刘志丹同志，你受苦了，快跟我们走，是毛主席派我来接你的。快跟我们去见毛主席吧！”

刘志丹瞪着他那双渴望而热切期盼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周恩来的那张透着无限慈祥而真诚的脸，“是毛主席来救我了？”在得到周副主席的肯定答复后，他这才相信真的是毛主席救他来了。

常万富忙让他的战士让出一匹马，周副主席带着刘志丹随常万富一行人，又驰骋回到吴起镇。

刘志丹见到毛主席，又一次给主席跪下，呜咽着对主席说：“毛主席，我可见到你，是你救了我，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毛主席忙上前扶起刘志丹说：“刘志丹同志，你说错了，是你救了我，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中国的命运。”

毛主席说这话是发自肺腑的。在革命最艰苦的年代，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放弃了苏区，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国工农红军的落脚点在哪里，革命的大本营放在哪里，目的地尚不明确。

直到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部队走到哈达铺，毛主席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才大喜过望。随即召开了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哈达铺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演讲指出：“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过去我们不太清楚。感谢国民党的报纸，给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信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还有徐海东，还有我们自己的根据地。”

毛主席的这一番讲话，激起了全场惊雷般的掌声。也就从这一刻起，长征的队伍才开始有了明确目的地，向陕北进发。

这就是毛主席为什么说刘志丹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这天，毛主席和刘志丹两人四只手紧紧相握，真是相见恨晚。他们彻夜长谈，有说不完的话。毛主席说：“刘志丹同志，我初到陕北，若不打一个大胜仗不能服众。你看应该打哪里，怎么打？”

两人看了一下地图，异口同声地说，要打，就打直罗镇。刘志丹执意要参战，毛主席竭力阻止说：“刘志丹同志，你才从苦难中走出来，身体虚弱，这次你就不要参战了。”

“我是本地人，最了解敌情和地形，我一定要参加这次战斗，以报答毛主席救我的恩情。”

直罗镇位于陕西省富县境内，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为甩掉敌人的尾随追击，在刘志丹的建议下，毛泽东、彭德怀等领导同志决定在直罗镇对尾追敌人发起歼灭战。11月21日至24日，红军围歼东北军第一零九师，此役共计俘虏敌人5300多人，打死敌师长牛元峰以下1000多人。这次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

的第三次“围剿”，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化，对以后的“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党中央奠基西北打开了新局面。

刘志丹被解救后，依然担任十五军团副军团长，配合中央红军作战。老常依然担任着他的骑兵警卫排长。在东渡黄河东征中，1936年的9月初，在孝义县兑九峪战斗中，刘志丹到前沿侦察时，被从背后来的流弹打伤，子弹由后背打入，穿胸而过，常万富窜到刘志丹面前扶好他，组织警卫排的战士，和他一起用担架抬着受了伤的刘志丹、亲自把刘志丹送上了黄河的渡船，老常才又回到战场。刘志丹在他的警卫员和马伏的陪同下乘船过黄河到瓦窑堡疗伤。

解放初期，在老常回乡探亲和老战友聚会时，才听随刘志丹的马伏说，因流血过多，在过黄河的中途刘志丹就牺牲了。

每每讲起这些，我的这位姐夫、老红军常万富都会满眼含泪，痛苦不已。

二、抢救电台

1936年10月，由贺龙、任弼时、萧克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陕北时，由于多次遭到敌人的尾追堵截，有一部电台分队掉队了，当时电台可是部队的命根子，没有了电台，部队就等于没有了眼睛，没有了耳朵，没有了喉舌，整个指挥系统就瘫痪了。更重要的是，一旦电台落入敌手，被破译了密码，其损失不可估量。

必须马上找回来。如果两个小时以内找不回来麻烦就大了。周恩来忙问：“来回180里路，还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谁能在两小时内完成任务赶回来？”

骑兵团长谢子长说：“这个任务只有常万富能完成。”周副主席命人把常万富叫来。

周副主席给常万富下了死命令：“常万富同志，拿着这封信，去把电台取回来，记住，这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若两小时内取不回电台、完不成任务就麻烦了。”

谢子长补充说：“如果两个钟头内你完不成任务，我就枪毙你。”

“是！誓与电台共存亡。”常万富斩钉截铁地回答着，飞马加鞭，骑着他的“虎子”驰骋而去。

路上要经过马步芳部队的防区，哨兵见一匹战马飞驰而来，忙打手势让其停下。只见常万富镇静自若，深吸一口气，摔鞭狠抽在马屁股上，只见那马腾空而起，像一支离弦的箭一样向敌营奔去。没等敌人反应过来，老常早已冲过了他们的防区。

找到电台后，又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就这样在两个钟头内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安全的把电台交到了周副主席的手里。老常受到通令嘉奖。然而，不幸的是，老常的爱马——虎子却累死了。

“虎子”曾是西北军阀马鸿逵的坐骑。陕北人民人人都知道马鸿逵是一个彪悍而凶残的国民党高官。个个对他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

红军终于在一次战斗中将其击溃，缴获了他的战马。这是一匹烈马，无人敢靠近，因为老常在战斗中作战勇敢，又是骑马高手，谢子长在庆功大会上就把它作为奖品奖给了常万富，虎子也就成了老常的亲密战友。

每次执行完任务后，老常就将爱马交给通讯员，交待一定要好好遛遛再饮水、喂料。但这次“虎子”一口气以极速跑了将近二百里路，消耗体力太大，体力的透支已达它的极限，老常抱着喘着粗气的虎子的头，流下了怜惜的眼泪，他对着马耳朵悄声说：“对不起，虎子，累坏你了，你为革命立大功了。”“通讯员，把虎子牵去好好遛遛，饮完水后多给它喂点黑豆。今天可把它累坏了，它为咱革命立大功了！”说完把马交给通讯员，自己也累得瘫坐在地。本应让虎子多遛会，让其体力得到彻底

恢复。但通讯员见天色已晚，觉得虎子太累了，想早点让它喝点水，吃上它最爱吃的黑豆，让他亲爱的战友早点休息。于是就按正常执行任务后的遛马时间结束了遛马，就开始喂食了。不一会，正在喝水的，可怜的老虎子口吐白沫，倒地而亡，它生生累死了。老常听到噩耗，痛哭流涕，一个一米八几的陕北硬汉竟哭的如此失声，他的亲密战友，为革命拼尽了最后一口气，永远地倒下了。老常哭得像个孩子，心痛的两天两夜没有吃饭。

乃至几十年后，只要提起虎子，老常总是眼泪汪汪。

三、抢救战友

1936年9月，红四方面军留守部队由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带领，二次过草地到达陕北。到达腊子口时，由于刚过了敌人几道封锁线，几天来干部战士们颗粒未进，许多战士干部已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都奄奄一息的躺在地上再寸步难行，而敌人的追兵很快就要赶到，形势万分危急。中央命令骑兵团要抢在马步芳部队前，争取一切时间多抢回一些战友，老常和骑兵团的战友们一趟趟往返于我军驻地与腊子口之间，看到满山躺着的红军战士，心急如焚，争分夺秒抢救战友。

还有口气的、年轻的就拽上马急速运回驻地，就这样骑兵们周而复始的抢运着尚有一口气的红军战士们。据老常介绍：把奄奄一息的红军战士运回住地后，就马上做饭给他们吃，但因这些人已多日没吃上饭，不该让他们马上吃硬饭，吃饱饭。确因常识不足而又爱战友心切，就尽量让这些饥肠辘辘的战友吃饱，这就使一些刚救回来的战士撑死了，大家都惋惜不已。

还有一次是挽救战友罗琪。在红军刚到陕北时，住在回民家中，罗琪不了解情况，想犒劳一下打了胜仗的部队，就买了一头猪，找了几个战士在他住的院子里宰杀。谁知这是一家回民家庭，这一做法严重地违反了民族政策，回族老百姓不干了，聚众上访。为了维护红军声誉，巩固新区，首长决定枪毙罗琪，以挽回影响。

老常知道此事后，组织所有陕北籍的红军，挨家挨户上门，说服当地回族老百姓。老常亲自找了带头上访的罗琪的房东，苦口婆心地说服，终于让房东同意随老常找部队领导去表示对罗琪的谅解，表达对红军的敬意。老常组织了陕西籍军人和当地老百姓乌压压一大片，长跪在总部门前，为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干部罗琪求得一张免死牌。在求得当事人的房东谅解下，首长同意免罗琪一死，要其戴罪立功。老常又为我党我军抢救下了一员虎将。

老常与罗琪的友谊源远流长。1953年老常在荣军医院差点病死时，罗琪又救活了老常，战友的友谊永存。

四、东征中背上受伤的林彪

老常在“西安事变”时，曾与张学良的东北军部隔河驻防。在河边饮马时曾互相喊话：“老乡们，打回老家去，打回东北去！”“咱们不要中国人打中国人，我们要和你们一齐打回东北去，救出你们的爹娘！”他们时常对东北军做着瓦解工作。在“西安事变”中老常曾多次护送周恩来副主席去西安谈判。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迫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呼声的压力，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毛主席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将北方的红军组建为国民政府革命军八路军，下设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常万富被分在一一五师

任师部警卫营的骑兵警卫排长，直接保卫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师首长。

师长林彪指挥的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平型关大捷，这一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扬了中国人的威风。战役中，常万富除了骑马传达师首长的命令外，寸步不离首长左右，时刻保护着首长的安全。

战斗结束后，缴获了日本的大洋马和军官服等大批物资。警卫排都换上了日本大洋马，林彪也兴致勃勃地换上了日本大洋马和日本军大衣。当时，刚打了大胜仗的林彪很是得意，包括警卫人员全部穿上日本各级军官的军大衣、服装，都骑着日本大洋马，路经隰县钱家庄时正好是阎锡山总部所在地，林彪说：“我们到阎锡山长官处坐坐再走吧！”于是一行人马向阎锡山防区奔去。谁也没想到，自己是一色日本军官打扮，以友军的身分无所顾忌的向阎锡山总部走去。

当时阎锡山总部哨兵一看，来了一队日本鬼子，而且是一色的鬼子军官，惊慌失措，值班的刘姓班长急忙命令开枪，跑在最前面的林彪不幸中弹受伤。

子弹从右侧打进穿过肺部，林彪滚下马来，却以迅捷的动作藏在了一块大石头后面躲起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常万富知道，这是他们一色的日本装备惹的祸。

他忙一边喊话，一边向林彪的藏身处奔去：“我们是八路军，不是鬼子！”边喊边一把将林彪从石头后面拉起来，背起受了伤的林彪边喊话边向阎锡山驻地飞奔：“我们是八路军，这是一一五师的林彪师长，来会见阎长官的，千万不要开枪了，林师长已经受伤了。”这时双方才知道是一场误会。

阎锡山知道这次可闯了大祸了，把刚打完平型关大胜仗、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抗日英雄林彪师长打伤了，岂不惹下天怒。

为了挽回面子，阎锡山开始发威：“不问清楚就开枪，把姓刘的班长给我拉出去毙了！”

被五花大绑的刘班长直呼长官饶命。林彪为了国共合作打鬼子，同时给阎锡山一个台阶下，忙为刘班长讲情：“我们也有错，我们也没想到，我们穿的是缴获的日本鬼子的服装。你就饶他这一次吧。”

阎锡山其实并不真想枪毙自己的手下，见林彪求情，也就顺水推舟送了个人情：“看在林长官的面子上饶你不死。”忙把姓刘的班长放了。

林彪经阎锡山卫生人员处置后，由常万富带人把林彪直接护送到延安，因延安医疗条件有限，为了彻底治好林彪的病，中央决定让林彪赴苏联治病。自此，一一五师由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代师长，罗荣桓任政委。常万富依然担任警卫连的骑兵排长。

鏖战齐鲁 (八)

吴瑞林

十、海阔天高

圣井村是莱芜第十区莲花山西部的一个山村，有七八百户人家，绝大多数为贫苦农民。这里土地贫瘠，人民的革命觉悟很高，村里有100多名男女青年参加了八路军，村党支部也是全县比较强的中共基层组织。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正式决定建立中共泰山特委。特委于1939年元旦成立，地点就是这个村庄。约在同年2月间，我告别李耐夫、李枚青同志前往圣井村与特委诸位领导同志会合。只见村里的道路是用石子、石板铺起来的，显示出山区村庄的特色。在村里，终于找到了特委书记兼四支队一大队政委夏辅仁同志，把分局的介绍信和纵队的任命书都交给了他。夏辅仁同志是位很持重的知识分子，白净的面容，语言虽不多，但对人态度和蔼谦虚。我们互相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他就带我到一个小院子里，说这个院子原是村长们的议事处，早已安排作我的住所，要我先休息好，待他通知特委各位委员来相见，然后再开会研究工作。

这个小院子也是用石块砌起来的，院内打扫得干干净净，一条小石子路直通院门，两旁的几棵枣树和柿子树悄悄地站在那里，光秃秃的，多么盼望有一身枝繁叶茂的春装！室内的墙壁用草泥抹了一层，上面刷了石灰浆，显得洁净明亮；用土坯砌的火炕，烧得暖烘烘的，更是舒适宜人。经过一天跋涉，躺在炕上也想休息一下，但想着想着，突然感到有些冷冷清清，不仅毫无倦意，反而更加兴奋了。整个圣井村街上虽时有行人，却没有人民的武装；泰山特委刚刚建立，机关不健全，更没有武装保卫；我这个带兵的人的门前，也没有一个站岗放哨的卫兵。想到这些，思绪一下被拉回到十几年前在川陕边白色恐怖下工作的冷清情景，那时关心照顾并掩护我开展工作的，在其中有我的一个姑妈，在通江有我的一个姨妈，在现时的冷清中我怎能靠特委书记和其他委员同志来厚爱优待呢？更何况现时的这种冷清局面同那时的冷清情景本来就不同，难道不能如同鲁东南那样开创出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的新局面吗？只有改变单纯地下秘密工作方式，转而采取公开的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我们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才能按分局和纵队的指示不断发展壮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

装，创造、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于是，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同特委全体同志坚强地团结在一起，突破工作作风的局限性，通过艰苦奋斗，把泰山区建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分局和纵队同延安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联系的一个重要战略通道。想到这里，虽一夜未眠，但也能慢慢静下心来了。

早上刚起床，夏辅仁同志和特委组织部长刘莱夫、宣传部长董琰、工会主席许光明、妇委书记刘军、青委书记彭自芳等同志都来了，夏辅仁同志一一向我作了介绍，大家都热情地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昨天他们就已商定到我这里来共进早餐，以示欢迎。只见刘莱夫同志提来了一篮子咸鸭蛋和小咸菜，董琰同志提来了一筐子馍馍，刘军同志提来的是一壶开水，彭自芳同志拿来的是筷子和碗。大家吃得很高兴。夏辅仁同志说：“为了欢迎你，莱夫同志昨天专门去牛王泉镇买来了这些咸鸭蛋。”我衷心地一再表示感谢。此情此景，又使我想起10年前一个中秋节的晚上，在川东宣汉东面的山坡上同第一次见面的川东游击纵队总司令王维舟同志借着皎洁的月光分食月饼的情景。同那次一样，这次早餐也是我一生中最记忆犹新的事，永远忘却不了。吃罢，夏辅仁同志就宣布特委会开会。大家自找座位，随和融洽，每个同志的特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莱夫同志是莱芜三区西上庄人，出生于农民家庭，知识分子，为人开朗，爱说笑话；董琰同志，新泰人，也是位知识分子，抗战前曾坐过国民党监狱，经张经武同志营救获释，他不像刘莱夫同志爱说爱笑，但善于思考，对问题的观察较仔细；彭自芳同志是从平津来的学生，东北口音，穿着长长的黑棉袄，戴着小瓜皮帽，不拘小节，不修边幅。刘军同志，是莱芜第一个参加八路军的女战士，抗战前在济南女师读书，徂徕山起义后参军，热情积极；许光明同志博山煤矿工人出身，40多岁了，为人忠厚老实，也不爱多说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集体，从现在起，自己要在其中很好地工作、生活和学习，要和这个集体打成一片，同呼吸、共命运。夏辅仁同志要我先传达分局和纵队郭洪涛、张经武、黎玉3位领导同志的口头指示。我尽自己所记，原原本本地作了传达。夏辅仁同志扼要地向我介绍了泰山区的基本情况。特委的工委、青委、妇委都建立起来了，配备了干部；特委所属的莱芜、泰安、新泰、博山、淄川、章丘、泰（安）泗（水）宁（阳）7个县也都建立了机关，配



莲花山

备了工农青妇工作干部，县以下建有30多个区委，不少乡村建立了支部，共有500余名党员（含候补党员200余名）；各县正着手建立群众组织，工作比较活跃，群众性的抗日斗争正在蓬勃兴起，但对敌占区的工作尚有待研究和布置。这些情况说明，泰山区是有大发展条件的。最后，会议研究了特委和军分区机关究竟安在什么位置为好的问题。

大家围着夏辅仁同志拿来的莱芜地图，你一言我一语展开了讨论。听了大家的意见，我认为泰山区应以莲花山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莲花山西起泰安确峪与徂徕山相接，东至莱芜四区的岐山观、青泥沟子一带，南连新泰的羊流店、阳村平原与龙廷相通，北达莱芜颜庄与泰（安）莱（芜）公路以南的盆地相依，位居泰安、莱芜、新泰之交，处于泰山区的中心，山岭、丘陵、平原、盆地、河流俱全，物产也比较丰富，是坚持游击战争的好地方。由于圣井地处莲花山西端，靠近泰莱、泰新两条公路，易受敌之骚扰，特委和军分区机关似以设置于莲花山中心地区的李条庄、野店、任家庄、孙家庄、蔺家庄一带为宜。因为这一带东临沂蒙山区，南靠新泰平原，北依莱芜盆地，自然条件和战略地位均优于圣井。我把这些想法说出之后，董琰同志首先表示同意，并认为李条庄处于泰莱新三县边，地理条件最为优越。其他同志也同意这一意见，于是会议一致通过了机关设于李条庄的决定。

经过一段酝酿，为了建设莲花山根据地，特委和军分区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有：一是改组莱（芜）南办事处，建立莱南县委和县政府。该县处于莲花山东端，辖莱芜的颜庄区和蒙阴的寨子区，以这两区为中心与新泰相呼应，以七中队作为莱南县独立营，在莱南县委的领导下掩护地方工作的开展，并开辟一条联系分局和纵队的通道。二是放手发动群众，广泛组织职工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建立群众抗日自卫队，掀起全区群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三是加紧军分区武装建设，分区分片开展活动。一中队活动于莱芜的鲁西、汶南两区；二中队活动于新泰、羊流两区；三中队即泰安独立营活动于泰安徂徕山区；六中队活动于莱芜的苗山、石马、文字观、常庄、白水湾、上下古德范地区；八中队活动于大汶口以南津浦线以东的泰泗宁三县边界地区；九中队活动于新（泰）蒙（阴）边的土门、龙廷、太洪峪地区；新建十中队活动于莱芜的寨里、口镇、雪野地区；十一中队活动于博山的夏庄、池上、上下瓦泉地区；淄川县委秘密武装由县委书记赵以川同志领导就地活动；章丘县委秘密武装以莱芜上下游庄为依托进行活动。这些武装一面掩护各县委开展地方工作，一面扩大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九中队还要同七中队配合，保持泰山区与沂蒙区的联系；十一中队的活动地区要以鲁山北部为中心，保护泰山区与鲁山的通道。四中队则在军分区的直接领导下，活动于莱芜的鲁西区到泰（安）莱（芜）边的范家镇，由一中队相配合，沿泰莱公路打击日军，掩护我过路人员，并开展这一带的地方工作。四是特委成员实行分工分片负责制。刘莱夫同志前往莱芜、博山，董琰同志前往泰泗宁、新泰，我前往泰安，分别向有关县委传达上级的指示和特委的部署；夏辅仁同志和特委秘书长刘舜卿同志坐镇特委主持日常工作。将上述决心和部署书面报告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请示审批，并由我和夏辅仁同志向四支队的领导同志当面汇报听取意见。分局和纵队以及四支队的领导同志对这一部署都给予了充分肯定，称赞泰山特委有大发展的决心和气魄，部署周密扎实，很好地贯彻了分局和纵队的战略意图，要我们坚定地干下去，全面地加以落实，取得预期的成果。

临、郟、费、峯四县 边联抗日政权的创建和发展 (中)

赵 炯

二、“四县边联”的巩固和发展——由国共合作的 联庄会办事处到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

于上述工作进行的同时，党的组织建设、武装建设、政权建设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一) 组织建设

1937年8月间，特委派丛林去延安向河南省委汇报工作、送交文件。在三原县云阳镇，丛林向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作了汇报，返回时，朱理治派刘文（化名于子彬）、何一萍随丛林一同来特委。刘文代表省委检查了特委所属各地区的工作即返回省委汇报。不久又返回特委，传达省委指示：一、批准特委在新形势下作出的各项决定；二、决定刘文为常驻特委，担任特委委员。

10月，根据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正式形成的形势，特委决定将机关迁往徐州。公开机关设在徐州北门外的牙税局，秘密机关设在坝子街民众教育馆。特委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工作方式，效果良好。为统一领导抱犊崮山区的工作，建立了鲁南中心县委，何一萍任书记，委员有宋子成、张洪义、丛衍瑞、李韶九等人。

本月，负责上层统战工作的特委书记郭子化以“社会名流”的身分，参加了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会长的“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任委员。他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如郭影秋等人到该委员会工作，大大地推动了本地区的抗日工作。

11月，特委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的精神，在黄口火车站西北的孙庙召开特委扩大会议，除特委委员外，还有十几个县的县委书记。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决议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通过了关于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一系列决议。

12月，特委改组，郭子化任书记，张光中任组织委员，何一萍任宣传委

员，丛衍瑞、陶洪瀛、刘文三人任委员。何一萍分工负责鲁南各县工作。

1938年1月，郭子化应临沂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的邀请，乘汽车去临沂商谈国共合作抗战问题。经六七天会谈，张里元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意团结协作，共同抗日。

2月，鲁南中心县委移驻抱犊崮山区，何一萍及县委大部分人重点搞武装。中心县委书记由宋子成担任，委员有梁度世、李韶九等人。

此间，苍山暴动失败后避往外地的一些党员如白山的宋逸安等人已陆续回家，并与郭子化取得联系。东白山、长新桥一带党支部恢复，宋逸安任书记。

从1月份起，党中央陆续派出干部到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工作，并带来中共中央配备给特委的电台一部。这批干部中有红军干部、抗战前即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党员和抗大、陕北公学、青调班的学员：谢文秀、童陆生、李锐、文立正、刘剑、李荆山、张震寰等数十人。他们的到来，充实了四县边联的干部队伍，加强了领导。

1938年5月17日夜，特委召开了地方党和鲁南农民抗日自卫军干部会议，参加会的有陶洪瀛、褚敬义、董晓卿及丛林、周南、张福林、王永福（现名王一夫）、刘剑等随特委机关转移的干部。会上郭子化重点讲了：部队要坚持地区、扩大武装、做好统战工作，但不能靠土匪武装；要积极发动工农武装，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军民关系等问题。会后郭子化分配刚由省委派来的王永福到四县边联工作，筹建中共临、郯、费、峰四县边联县委。

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

6月，中共中央根据徐州失陷后我向苏、鲁、豫、皖四省推进的战略，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建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任书记。

王永福到四县边联后，对外是边联办事处政治处副主任（主任是郑华光），对内是办事处党支部书记，继而任分区委书记。1938年8月，中共临郯费峰四县边联县委建立，王永福任书记。秋天，王永福调临郯地区工作，于化琪接任书记，从此四县边联的组织工作便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先后发展了邵光华、姚兴华、孙黎明、岳俊卿、鹿子全等一批党员。同时由于化琪主持以四县边联办事处的名义，开办了抗日训练班，并在里面发展党员，建立了支部。此时县委直接领导的有：高桥、大炉、驼阴、甘霖、九女山、东白山及长新桥等七个支部。兰陵的孙仲真、杜季伟等党员也在县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1938年8月，中共中央电示将苏鲁豫皖特委由河南省委划归山东省委领导。

山东省委根据当时情况随即决定撤销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另成立鲁南、湖西、苏皖三个特委，分别领导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所辖区域的工作。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调省委任统战部长，鲁南特委未成立前，四县边联的工作归省委直接领导。

1938年12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郭洪涛任书记。

1939年2月，鲁南特委成立，宋子成任书记。四县边联归鲁南特委领导。9月，鲁南特委改为三地委，隶属关系不变。

1940年5月，山东分局派赵罇等许多干部来鲁南。6月，成立鲁南区党委，赵罇任书记，下辖三个地委，四县边联归二地委领导。

（二）武装建设

四县边联的存在和发展除了靠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外，很关键的一条，就是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一支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这支武装力量，随着四县边联的建立而建立，随着四县边联巩固发展而成长壮大，最终成为无

坚不摧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

早在黄口会议上，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作出了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决定。会后特委采取各种措施，利用一切合法形式，组织发动各地举行抗日武装起义，以便建立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各地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努力下，一支支抗日武装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

特委委员张光中回沛县后，先后掌握了原地下党拥有的部分武装，又动员一些有民族意识愿意抗日的地主把私人武装交出来参加抗日。时逢川军由湖东战场退下来，已溃不成军，便利用各种形式索取这些散兵的武器，先后得到步枪10多支，迫击炮一门，后又通过关系用这门迫击炮与徐州专员李明扬、沛县县长冯子固调换了18支步枪。很快拉起了100多人的抗日武装，成立了“人民抗日义勇队”，下辖二个中队。

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朱道南，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到家乡峰县，虽然和党组织失掉联系，但仍坚持斗争。他以峰县教育局视学的公开身份，组织领导了峰县二区邹坞暴动，拉起一支150多人的武装。这支队伍先后挫败了国民党县大队的清洗和顽军收编的阴谋，同鲁南中心县委取得联系。中心县委在保证他们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将他们编入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

3月18日，日寇占领枣庄。在敌人迫近山区之际，郭致远以峰县联庄会军政教官的身份和私人关系，以“武装民众，保卫地方”的名义，向庞炳勋的军械处长要了57支“七九”步枪和2万发子弹，组建起一支由大北庄一带的党员、基本群众和由枣庄撤出的工人、中兴职业中学的学生组成的50多人的抗日武装。19日下午，朱道南、刘景镇率部来大北庄会合，郭致远又打算向四十军要一部分枪支，结果没成，只得到了5000发“七九”子弹。郭致远把这些子弹全发给了朱道南的部队。当夜，四十军撤退时，却将库存弹药全部炸毁。

李乐平、王见欣等人在滕县鄱亩一带利用办抗日农民训练班的名义，组建了一支40多人的武装，很快就发展到70多人。

1938年3月，日寇迫近滕县一带，形势非常紧张。特委决定正式建立我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并由郭子化出面向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徐州专员李明扬提出组织抗日义勇军参加徐州会战的要求，争取到“第五战区抗日义勇队”的番号和2000元补贴，张光中被任命为队长。

5月16日夜，特委从徐州撤出，向抱犊崮山区转移，并调集特委所掌握的各地抗日武装到临枣路以北的墓山汇合。本月下旬，各部队相继到达墓山北面的凤凰庄、南塘一带，特委在老古泉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建立“第五战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特委委员张光中任总队长，特委委员、鲁南中心县委书记何一萍任政治委员，韩文一任参谋长，李浩然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连，全队共600多人。

第一大队由张光中和红军干部谢文秀带来的沛县、邳县、夏镇三部分武装编成，谢文秀任大队长，宋学敏（后叛变）任教导员。第二大队由李乐平、王见欣所领导的鄱亩一带农民抗日救国军编成，于公任大队长，渠玉柏任教导员。第三大队由朱道南、刘景镇所领导的峰县、枣庄一带抗日武装同郭致远、邱焕文在大北庄组织的武装合编而成，朱玉相（后叛变）任大队长，朱道南、纪华先后任教导员。

1938年7月，由丁梦孙和红军干部石世良组织的“临邳青年抗日义勇队”并入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

这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并直接领导的保卫四县边联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武

装力量。

1938年9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第五战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改用临沂专员张里元保安司令部“直辖第四团”的番号（翌年2月改为“保安十九团），名义上由张供给给养，中共派一部分干部到张部工作。

1939年10月，山东分局决定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脱离张里元，改为一一五师苏鲁支队。支队长张光中、政委彭嘉庆、参谋长胡云生、副参谋长阎超、政治部主任李荆山。1940年底，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地方游击队正规化的要求，一一五师将地方部队整编成五个教导旅。苏鲁支队改编为教导二旅第五团。团长胡云生，副团长贾耀祥，政委曾明桃，参谋长王六生，政治部主任杨永生。五团一直战斗在边联根据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咱们的老五团”。

四县边联常备队则是由四县边联办事处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开始只有50多人，很快发展到100多人。1938年下半年，办事处主任李仲勋出任峰县县长时，将办事处和常备队的人拉走一部分。边联县委将余部进行了整顿，并分别在大炉、车辋、埠阳、刘家郭一带发展武装，很快组织起300多人的队伍，号称四县边联一营。在甘霖、长新桥一带，地下党员宋逸安、杜季伟、王墨山等人团结开明地主宋云石，掌握了宋云石为营长的一支200多人的武装，号称四县边联二营。

台儿庄会战后，日军急于西进，无暇顾及后方，这一带反而平静下来。万春圃带着他的队伍到山外寻找战机，刚结束战斗的台潍公路两侧一片狼藉，老百姓基本跑光。从向城到兰陵、台儿庄之间，弃尸遍地，武器弹药随处可见。他们打扫战场时，竟然收集到8桶汽油、一门迫击炮、4挺机关枪、50多支捷克式步枪，还有100多箱子弹、手榴弹，这一下大大改善了部队的装备。

四县边联最大的一部分武装，就是基本不脱产的农民抗日自卫团。

边联地区民风强悍，抗战前由于该地区土匪较多，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利益，村村都有联庄会组织，都有自卫枪支。台儿庄战役后，中日双方都丢弃了不少枪支。这些枪支散落民间，为组织抗日武装提供了武装资源。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特委提出“抗日救国，武装保卫人民”的口号，决定在旧有的联庄会和民间枪支的基础上，广泛建立群众性的抗日自卫团。以车辋为中心，把四县边联根据地划分为车辋、大炉、长新桥、黎丘、流井、漫溪、贾庄、万村、鲁城9个工作区，后又发展到青山套、横山、丰山、车庄、仲村等21个工作区，每区组建一个自卫团，每团又抽调精锐组成基干队，负责本工作区的安全。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各团推举当地有威望的开明士绅任团长，共产党员任副团长，区委书记以指导员的身份领导自卫团。自卫团很快发展到1.5万多人，长短枪1200多支。

1939年4月15日，四县边联抗日自卫团成立，宋逸安任总指挥。

1939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来到四县边联后，罗荣桓政委派该师民运部民运队长邱励率30多人的民运工作队到边联工作（邱励后任县委书记），并先后拨给边联五六百支步枪，装备自卫团基干队，大大加强了自卫团的战斗力。

在消灭了王学礼、李长胜等顽固派后，罗荣桓政委和三地委指示：乘胜前进，组建边联支队，巩固根据地。

在三地委和边联县委的领导下，1940年3月22日，将四县边联特务营、大炉万春圃的部队，宋云石的部队及地方自卫团的部分基干队，统一整编为“四县边联支队”，任命万春圃为支队长，贾耀祥、宋鲁泉为副支队长，于化琪为政治委员，靳怀刚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大队，共1100多人。

一大队由边联特务营、特务连，漫溪、黎邱工作区基干队组成。大队长王乡南，教导员郭仲选，副大队长崔梦坡、孔觉民，副教导员任玉玺。

二大队由尚岩陈玉山的中队及尚岩、青山套的自卫团的基干队合编而成。大队长陈光晨（陈西庆），教导员丁文达（袁达）。

三大队以费南大队为基础，吸收崮口、马庄自卫团基干队组成。大队长徐子仁，教导员孙士炎，副大队长杨明山。

1941年3月，与边联县成立的同时，建立了县大队，县长狄井芑兼任大队长，崔梦坡兼任副大队长，丁一任教导员，下辖三个中队，约480多人，长短枪380多支，六个区都建立了区中队，十四五五个乡建立了乡中队，区乡武装共有600多人，400多支枪。

（三）政权建设

四县边联政权的建立可谓水到渠成，是鲁南抗日根据地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在农救会、民众抗日自卫团、民众动员委员会等群众组织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

其实，从四县边联联庄会办事处建立的那天起，就行使着行政权，最早没有政权，只得靠就地筹款筹粮。那时人少，也好对付。行政事务靠各地联庄会办理。1939年4月，民众抗日自卫团成立后，除了对敌斗争的事情外，边联办事处的一些行政命令，如公务员出差、集市管理、捐款筹粮、办给养、出夫集调等，也都通过自卫团贯彻执行，农救会成立后，也办理这些行政事务。

1939年6月，日军集中2万多兵力，对鲁中、鲁南展开“大扫荡”，国民党敌后政权纷纷垮台，政局一片混乱，这时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民主政权，组织领导人民抗战。6月21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要乘日军扫荡后鲁南混乱的局面，将一一五师师部、六八六团开进鲁南，以巩固根据地，并应大放县长，区长，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可放专员以和敌人争夺政权。一一五师主力进入鲁南后，拔除了一些据点，扫除了一些反共势力，有效地制止了伪化活动，巩固了以大炉为中心的边联中心区。

1939年底，鲁南民众动员委员会第三分会成立，狄井芑作为第三分会的领导成员，协助边联县委开展工作，在发动群众的同时，努力争取和团结社会上有影响有势力的各界人士，积极开展各级动委会的组建工作。1939年9月，四县边联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宋鲁泉为主任委员，潘振武为副主任委员。宋鲁泉、宋子成、潘振武、刘子才、王拱辰、李淑明、主敬如、张元章为常委，此后，边联办事处的行政命令，大部分都通过各级动委会来贯彻执行。

1940年春，四县边联区域内先后建立了八个区级政权。

1941年3月28日，四县边联在万村召开了临郯费峰边区抗日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撤销四县边联办事处，正式成立“三三制”的临郯费峰边区联合县政府，简称“边联县”，选举狄井芑为县长，盛清沂为县参议会参议长，其他有声望的开明士绅也都进政府任职，除秘书、财政科、民政科长外，其他都由民主人士担任。

1942年秋，为纪念在银厂惨案中英勇牺牲的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鏞，经上级批准，在纪念赵博烈士牺牲一周年大会上，正式宣布改边联县为赵鏞县，直属鲁南区党委领导。至此，四县边联的历史正式结束。

曾国华传 (七)

王连城 曾林辉

1947年3月26日，杜聿明见北满我军因松花江解冻不能南下，立即调动14个师的19个团约10万兵力向临江地区举行第四次大规模进攻。在南起安东、凤城北至海龙、梅河口250公里宽的正面横扫过来，由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和十二军军长石觉到新宾坐阵指挥，企图解通化一九五师之围，然后向八道口、临江进攻，把我军挤出南满。

辽东军区政委陈云和司令员肖劲光认为，表面上看敌众我寡、兵力悬殊，形势严峻，但这次粉碎敌人进攻的条件比上次更为有利。他们要求部队拿出打硬仗、打大仗、打恶仗的决心，找出敌人的弱点，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同时，两位军区首长又决定，由三纵司令员曾克林和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共同组成前方临时指挥部，以加强前方作战的统一指挥。当韩先楚同志来到三纵驻地时，曾克林、曾国华都从屋里出来热情迎接。因情况紧急，他们进屋立即研究反击敌人的战斗部署。

曾克林和韩先楚在先打哪股敌人的问题上争论不下。曾克林主张先“拣软的打”，保证首战必胜。韩先楚则主张“擒贼先擒王”，先打敌八十九师，这是敌人主要的一路。曾克林摇头说，敌八十九师是蒋的嫡系，美械装备，战斗力强，如果不能很快拿下来，其它敌军围上来就危险。韩则坚持说：八十九师新调来，人生地不熟，没和我军主力碰过，狂妄自大，容易上钩，只要部署得当，用1个师顶敌军北路，南路敌军较远，集中3个师加上炮兵有把握吃掉它。

曾国华听着两位首长的争论，动摇了开始也想“拣软的打”的想法，觉得韩先楚的主张虽然有点冒险，但取胜的根据可信。他没有急着表态，在两位首长各持己见的情况下，只好把两个方案报请军区首长裁决。陈、肖首长接电不过两个小时就回电：“同意韩先楚意见，由韩曾统一指挥三、四纵队，争取彻底消灭敌军89师。”

曾克林、曾国华接到电报没想别的，立即对韩先楚说，“老韩，陈、肖首长的电报来了，按你的方案打，由你统一指挥，我们听你的。”他们立即制定作战方案，下达各师开始行动。

战斗打响后，完全按预订的作战方案发展。八师牵牛很艰苦，又顶又撤，顶要象顶的样子，撤也要装成连饭菜做好了都扔掉的狼狈样子，硬是把敌人牵到预定的作战区域。八师的牵牛是关键，韩先楚亲自掌握其动态。曾克林则掌握九师的阻击。曾国华向韩报告七师和十师已从两翼插到敌侧后。

围歼战一开始，七、八、十师三个师从四面八方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敌群，敌人意外惊雷，闻风丧胆，营不成营，连不成连，溃不成军。这次战斗自发起攻击不到10个小时就结束战斗，俘敌7800余人，毙伤敌团长以下660余人。其中，七师十九团九连在拦截溃退的敌军时，边打边喊话，一个连就俘敌团长以下30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50余门。而我军只伤亡数百人，敌我伤亡人员比为25:1。

新华社播发评论指出：“此次南满民主联军在柳河战役中，在10个小时内歼灭美械嫡系1个师和1个团，……创造了我东北解放区军民爱国自卫战争的光辉战例。”

南满粉碎敌人第四次进犯临江之后，战局发生了根本的转折。正如此时林彪指出的：“现在我们已经由拉锯式的战争形势，走向全面反攻的过渡阶段……”

曾国华在回忆四保临江的胜利时颇有感慨，他对韩先楚司令员的高明指挥钦佩不已。

1947年5月，曾国华协助曾克林指挥三纵队发起南满的夏季攻势。5月13日17时，三纵首先向山城镇地区的敌一八四师发起攻击。激战一夜，速战速决、全歼一八四师五五一团及保安、警察各1个大队，共2000余人，打响了夏季攻势第一炮。

5月17日，曾克林、曾国华趁热打铁，又指挥三纵乘胜攻击敌新六军二十二师。它是三纵的老对手。曾国华对七师攻击部队说，这次要狠狠煞煞它的威风。这是三纵和新六军的又一次较量。敌人虽然天上还有飞机狂轰乱炸，地面有坦克横冲直撞，但是现在的“国军之花”已失去当年的威风。当年的土八路可是今非昔比，越战越勇，越打越强。在秀水甸子地区激战一昼夜，歼灭二十二师1000余人，缴获坦克9辆，榴弹炮10门，迫击炮20多门。二十二团八连一排副排长、孤胆英雄陈树棠带领1个战斗小组猛打猛冲，俘敌52人。二十三团炮连炊事班长带领两名炊事员往阵地送饭碰上一股敌人，靠1支步枪，两根扁担就俘敌40余人。

曾克林、曾国华决心继续扩大战果，5月24日命令七师攻打东丰县城。25日，全



东北野战军在夏季攻势中

歼守敌青年军二师六团，东丰解放。接着三纵又配合四纵攻打梅河口。七师十九团于5月27日18时发起进攻，全歼一八九师师部和两个团，俘敌2100人。三纵给该团记集体功，辽东军区给十九团赠“铁拳”锦旗一面。

收复梅河口之后，6月2日，三纵又回头攻打西安。敌大部西逃，一部被我追歼，西安遂告解放。与此同时，海龙、清原等地守敌，闻风丧胆，弃城逃跑。至此，南满与北满的联系已经打通。

6月11日，为配合北满主力攻打四平，曾克林、曾国华又率三纵于威运堡地区集结，打敌援兵。6月24日，与新六军十四师和交警总队展开激战。29日，敌人向西溃退。这时，四平停止进攻。夏季攻势结束。

1947年7月，四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升任三纵队司令员。曾国华和政委罗舜初一起欢迎韩司令员到来，主动汇报部队当前的情况。在谈到秋季攻势的设想和作战预案时，罗舜初提出计划攻打驻西丰的敌一一六师三四六团。韩则觉得这个方案胃口太小，过于谨慎。罗舜初认为慎重初战，还是有把握一点好。韩则说，“不能总是打豆腐么！”“三纵是主力部队，只消灭敌人一个团不解渴，我们要吃它1个师。办法是：长途奔袭威远堡，打它的师部，各团必然来增援，在运动中消灭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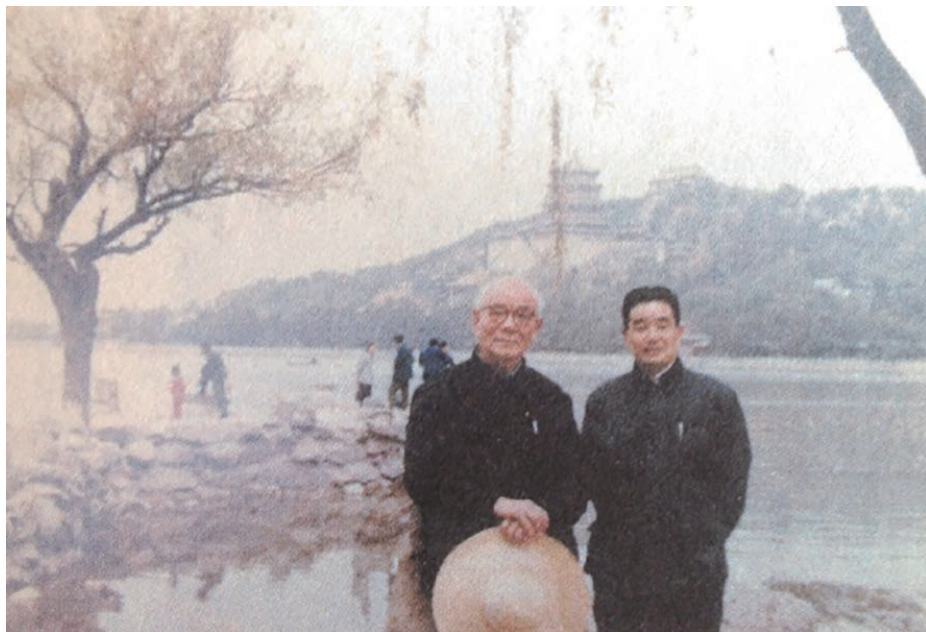
曾国华在一旁听了，虽然罗舜初的方案是他们一起制定的，但又觉得韩的计划有道理。因为这时的国民党军已不是刚到东北时那样子了。这回又遇到了上次韩与曾克林关于攻打敌八十九师的类似争论，那次是先打软的还是打硬的问题，后来事实证明，韩对了。这次则是打多的还是打少的争论，一面是新到的司令员，一面是老政委，曾国华不好表态，保持他在首长面前一贯的沉默。因为争论不下，各持己见，又采取上次那个办法，“两个方案同时报，请上级批准吧”。三纵电报发出不久，东总就回电批复：“按先楚方案实施战斗。”

接东总来电，曾国华即协助司令员、政委进行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9月29日，正值阴历八月十五，三纵各部队杀猪宰羊，欢度中秋佳节。是夜，按预定作战方案，各师长途奔袭，速战速决，仅以19个小时就干净利索地歼敌一一六师，计俘敌师长刘润川以下8100余人，缴获火炮108门、轻重机枪283挺、汽车13辆。这是三纵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歼敌1个整师。

曾国华对韩司令员的高明指挥十分佩服。决心在他的领导下多学一些东西。这时，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艰苦的防卫阶段已经过去，敌退我进的反攻阶段开始了。

秋季攻势结束，三纵撤回西安进行整训。曾国华在即将离开战斗部队时，对自己来东北这两年的经历做了这样的总结：“在新的形势下，新的战斗环境里，同疯狂的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较量，我的战斗意志是高昂的，胜利信心是坚强的，虽经艰苦的防卫和退却也未曾灰心。随着战争的变化，失败和胜仗的经验，使我懂得：必须丢掉过去的游击战术，学会新的运动战战术，必须克服过去的各自为政的分散主义，树立集中统一的思想；必须转变过去的游击作风，树立正规的战斗作风。”（全文完）

张文俊：我的艺术年表



1980年张文俊（右）和李可染（左）在颐和园

1918年11月15日，我生于山东临沂傅家庄，家有土地几十亩，由祖父张德顺劳动管理，父亲怀琪经商，开杂货小店。我童年生活多随父亲，少在家中跟母亲一起生活，有时跟外婆一起生活。外婆是一位非常善良的老人，针线活很好，也常帮人裁衣。我的大舅帮父亲做生意，另有一位长工叶老井。

1925年（8岁）开始读私塾，由本庄陈文堂教师教四书五经，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读起，以后读《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千家诗》《书经》《礼记》等。我的父亲特别重视我学写字，要求写对联不要求人，所以我从十岁就开始过年写对联。在私塾读书每天写小字、大字，约四年，为我写字打下了基础。

1929—1933年，读初小（从四年级学起）高小（在朱陈庄毕业后考取临沂市师范讲习所，学习二年）。

1934—1936年，在临沂读师范讲习所，继续学习颜字、柳字，由于受同学高立明的影响，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开始读鲁迅的文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我追求进步思想影响很深。

1936年暑期，我考取了临沂山东省第三乡村师范学校。我的书法、国画成绩是优秀的。

1937年秋，在山东省立第三乡村师范读书。读进步书。11月28日，因当时济南沦陷，我随亲戚韩汝钧离家去徐州，参加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团。1937年12月由徐州随军至河南潢川，在第五战区战抗敌青年团受训后，1938年3月至8月在河南息县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8月，因病离开青年团去湖北均县湖北中学读书，10月随校到四川梓潼国立六中一分校读书。1938年5月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因组织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学籍，流浪至成都。

1940年失业、失学，后在成都南区贫儿寄托所教书。

1941年8月由中共地下党介绍在四川洪雅中山乡小学教书。

1942年1月15日在洪雅被捕，至1944年夏，先后被囚禁于成都、重庆歇马场五云山集中营。

1944年秋，出狱后考入重庆国立艺专，学习中国画，先后师从李可染、郑午昌、潘韶、诸乐三老师。1946年随校迁至杭州，1947年秋毕业。在校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带领同学参加庆祝旧政治协商会议大会，被特务破坏，发生震惊中外的校口场事件。参加重庆各界庆祝旧政协成功大会筹委会。

1947年8月起，先后在杭州、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美术组织，今艺社新民主主义艺术同盟。

1948年3月去南京，在邮汇子弟学校教书，和朱克可在地下党领导下负责美术工作，迎接南京解放。

1949年4月23日，成立南京文工团，任美工组组长。同年6月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由李可染引荐拜望齐白石先生。

1949年10月至1950年，调南京军管会文化处秘书处任处长，又任市文联联络部总干事、任美术供应社副主任。《人民美术》第四期发表“南京市第二届美展”一文。

1951年，任市文联秘书处副处长。

1953年，任江苏省美术工场场长、江苏省文化局美术创作组副组长、江苏省美术工作室副主任。同年加入中国美协。

1954年，国画《江南水乡》获美展三等奖，同年赴京筹备全国工艺美术出国展。10月去安徽梅山水库写生。发表《对江苏当前美术创作的一些看法》。十月和胡毓容结婚。第六期《美术》发表《无锡惠山泥人艺术的改造问题》。

1955年，在《新华日报》发表作品《无锡吴桥》和《人民喜欢的年画》一文，与魏紫熙等人合作发表插图16幅。

1956年，任江苏省文化局艺术处副处长，负责筹建省国画院、省美术馆、省美协、书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同年发表《梅山水库清基图》和《继承和发扬国画优秀传统》一文。

1957年，在单位参加“反右”运动，发表《造型艺术的典范》一文。

1958年，作品《梅山水库》入选莫斯科国际造型艺术展，得到好评，并收入《十年中国绘画选集》，由中国美术馆收藏，王朝闻撰文评价《梅山水库》为中国画的新声。与钱松喦等人为人民大会堂合作国画《太湖新貌》，与傅抱石先生赴京举办江苏

国画展。全苏美协主席谢格拉西莫夫撰文，评价中国画家作品，有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蒋兆和、李可染、张文俊等六人。

1959年，作品《东山运果》选入《中国画刊》，发表《美术创作经验谈》论文，《锦屏磷矿》入选江苏画院画集，《三门峡》入选山东画集。《中国文学》英文版发表《梅山水库》。与钱松岩等人赴连云港写生。文汇报发表《略谈国画表现生活》和《国画集体创作问题》文章。

1960年，在江苏吴江桃园公社参加整社一年，在《中国画新观察》发表《九龙桥》《三门峡》。《河北美术》发表文章《评待细把江山图画》。

1961年，作品《扬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画片，光明日报发表钱松喆《评山水画莲花峰》，同年秋在黄山写生20天，同年陪石鲁、何海霞等陕西画家访问苏州写生。与钱松喆、亚明等人黄山写生。与钱松喆合作《江上曙色》《洞庭春晓》等国画。

1962年，任江苏美协副秘书长、省文联委员，人民日报发表《天都雨后》，与傅抱石等人合作《化工城》参加全国美展。同年随江苏画家写生团（钱松喆、林散之等）访问青岛，和李苦禅、于希宁等人谈艺作画。

1963年，《美术》发表《洞庭春晓》，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画片《春耕图》。同年10月与张晋先生去三峡、峨眉山写生，为时约四个月。

1964年，《柳影渔歌》等编入现代山水画集，江苏美术馆收藏《铁矿山下》。4月10日至15日与陈大羽、张晋、宋文治在江苏省美术馆合办作品观摩展，作品110件。

1965年9月下旬，与傅抱石先生、钱松喆先生、宋文治先生去上海为虹桥机场作画准备，后因傅先生去世，未果。11月陪钱松喆去井冈山、瑞金、庐山等地写生。

1966至1973年，“文化大革命”，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创作系列国画小品三峡40余幅。73年返宁，在家创作并临摹宋元名画。

1977年，调南京艺术学院任教。

1978年，任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副主任。暑期去淮安瞻仰周总理故居，收集创作材料。创作《周总理故居》。

1979年春，带学生徐建明、张兴来等去连云港写生。作品《周总理故居》参加省美展，被吉林博物馆收藏，同期创作《钟山雄姿》《山高水长》等。

1980年秋，带研究生董欣宾去华山、三门峡、葛州坝等地写生，同年在南艺、南博办画展，刘海粟为画展题词：吐故纳新，蝉蜕龙变。5月应文化部之邀去北京作画，创作国画《海上生明月》。同年任江苏省美协副主席。香港《文汇报》发表《刘海粟较量刘海粟》一文。7-8月陪刘海粟去苏州、黄山写生。

1981年，带研究生去雁荡山写生。《海上生明月》参加中国研究院画展、《山高水长》参加全国美展。同年被聘为南通书法国画研究院顾问。

1982年，去广西艺术学院讲学，并带学生李怀林在广西写生。《芙蓉耸翠》参加广州国画展，《钟山雄姿》被江苏省美术馆收藏，同年还任少儿书画会顾问。

1983年10月，带学生朱峰、严南麟去四川写生，发表《夔门天下雄》等作品，发表文章《工艺美术是人民的美术》。

1984年6月，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作品共有120幅。《江山旭日》被评为六届全国美展优秀奖，由中国美术馆收藏。马鸿增（美术评论家、江苏省美术馆副馆长）撰文评论。

1985年，带学生郑佰劲去新疆写生，应新疆教育学院邀请，前往讲学一个月。出版《张文俊画选集》。发表《谈山水画写生取形》一文。任江苏省农民书画研究会副

会长、山东省临沂画院、四川嘉州画院名誉院长。

1986年发表《赛里木湖》等作品，同年晋升为教授。李可染、杨建侯、华夏撰文评论，任南艺研究生答辩委员、临沂市经济顾问。

1987年，发表《岱宗瑞雪》等作品，发表文章《中国现代绘画史笔谈》，应邀担任河北省高级艺术专业职务评委。

1988年，带研究生李小山去东北、浙江等地写生，同年4月去浙美参加校庆，11月参加全国第五届文代会。

1989年，带学生陈士桂去泰山写生，应聘为南师大研究生答辩委员，安徽师大研究生答辩委员。

1990年，带学生去苏州、无锡写生，任金陵印社顾问，写出《忆可染师》一书。《江山旭日》等五幅作品入选《当代中国画名家选》大型画集。

1991年，有两幅作品参加赈灾义卖。

1992年，在江苏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作品120幅，香港《收藏天地》《美术杂志》发表作品多幅，丁涛撰文评介。为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创作《山高水长》，被毛主席纪念堂收藏。

1993年秋天，去苏州举办个人画展。参加省文代会，被选为名誉委员，省美协顾问，为中南海创作《峡江秋色》《海上生明月》等作品，为军事博物馆创作《飞流石上鸣》。10月带学生去四川九寨沟写生，返宁创作巨幅《诺日朗瀑布》等作品，对画水有新的提高。同年被选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当代书画名家大辞典》。

1994年，被选为江苏省文德中国山水画研究会会长。3月迁居江心州，开始创作丈二大画。《科学大众》发表多幅作品。任江苏省美术馆艺术顾问、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

1995年，在江心州创作丈二大画《黄河》等18幅作品，为电影《南京大屠杀》义卖，作品《雪霁》获日本国际美术特等奖，《人民日报》发表王朝闻致张文俊的信，肯定文德山水画研究会宗旨。

1996年，现代书画报发表作品7幅，作品《新安江水电站》参加嘉德秋季拍卖会，《东海扬波》入选中学教材。

1997年，创作册页小画，江苏美术出版社发表作品多幅，《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收入《夔门天下雄》《山高水长》，马鸿增撰文评论。同年12月爱人胡毓蓉逝世。

1998年，创作细笔大镜片20多幅，任现代书画报、淮阴师范艺术顾问，李可染基金会委员。作品《大宁河》在加拿大展出，《江苏画刊》和《现代经济报》发表多幅作品和专访，为抗洪救灾义卖，在《南艺学报》发表《回忆黄宾虹》一文，周韶华、周积寅均撰文评论。入选《中国现代书画家大辞典》，李小山发表《老师教我》一文。

1999年，《水乡曲》入选江苏美术五十年画册，《梅山水库》入选南京美术五十年画集，并刊登专访。《夔门天下雄》入选《中国当代美术》，简介入国际互联网，作品《澳门风景》被印刷成明信片。发表《关于山水画如何学习传统，深入生活及创作问题探索》长篇论文。春季创作大镜片山水80余幅，5月至10月创作丈二大画及丈二对开、六尺大画约10余幅。出席澳门回归中国名家书画展，并接受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采访，《澳门日报》发表《井冈山飞流》《山高水长》等作品入选《人民画报》画集。入选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大辞典》。

2000年1月，任澳门书画研究院荣誉院长。

2000年9月5日-12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张文俊山水画展”，参展作品80

件。画展期间举行了座谈会，肯定了作品的创作，认为作品“得山川之灵气、唱魂魄之赞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文艺报》用一整版的篇幅报道座谈会的发言。同时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8开精装本《张文俊山水画集》。此画展中央电视台、《工人日报》《中国文化报》《现代书画家报》《文艺报》等均有报道。以下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春山欣欣》《千峰峥嵘》《钟山雄姿》《夔门天下雄》。

2000年12月至2001年3月因心脏病住院。

2001年创作大小作品100余幅，其中不乏得意之作。

2002年5月，带研究生孙涛去长江三峡及小三峡写生。同月被聘为徐州老年书画院名誉院长、南京徐悲鸿画院名誉院长。

2002年6月，带研究生孙涛去广东韶关丹霞山写生，陈履生在《羊城晚报》撰文介绍。

2002年7月，在《美术》杂志上发表《我与江苏省国画院》一文，各大网站、《南艺学报》皆进行了转载。

2002年8月，去云南丽江虎跳峡、玉龙雪山、昆明石林写生。

2002年9月，画大小镜片20张。刘曦林撰文评价：“张文俊先生为金陵画派最后一位代表人物。”

2002年10月26日至31日，在溧阳参加常州天目湖书画研究院成立大会，应聘为名誉院长。

2003年4月19日，“张文俊教授画展”在常州隆重开幕，同时由澳门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张文俊溧阳风光作品集》，常州市领导及南艺院长，书记等出席画展。

《芙蓉耸翠》被收藏，南艺发去贺信：“欣悉我院著名画家张文俊教授画展在常州隆重开幕，南京艺术学院谨向画展及张文俊先生个人表示衷心的祝贺！张文俊教授长期致力于山水画创作是金陵画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年来在传统的山水画创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们对张文俊教授取得的杰出成绩由衷的钦佩。”

2003年5月，被聘为中国画研究院（中国国家画院）顾问。

2003年8月22日，参加上海美术馆画展，《雨后秋泉石上鸣》被上海美术馆收藏。

2003年10月带学生殷南柱去梅山水库、沂蒙山写生。

2004年4月23日在香港举办个人画展，香港媒体广泛进行了报道。

2004年5月8日--10日在广西桂林写生，并与阳太阳先生会面。

2006年11月3日接受《南京晨报》专访。

2008年4月27日，在家人和学生的陪同下以90高年龄登上泰山顶。

高赞非与梁漱溟

林桂榛 整理

高赞非，郟城县马头镇人，儒学大家。师从梁漱溟，一生与梁漱溟交集甚多。

高赞非曾师于梁漱溟、熊十力等大儒，是曲阜师范大学创校校长，据说还是首任党委书记，然公开出版的相关记述甚贫乏，重要的唯见荣言《高赞非与山东乡村建设运动》一文及曲阜师范大学退休教授刘光宇《高赞非：一位优秀的大学教育家》一文。



梁漱溟（中坐者）
与部分学生。右
二为高赞非

高赞非结识梁漱溟，始于1924年夏。1924年以前，梁漱溟在北京大学任教。1924年开始，梁漱溟离开北大，到山东筹办曲阜大学未成，便结合曹州（菏泽）地方实力派王鸿一，在曹州办高级中学，并准备办“重华书院”。梁漱溟办学的目的，主要是宣传他的那个“东方文化”，也就是他所说的“儒家哲学”。梁曾自称他13岁以前过的是“佛家生活”，是倾心佛家学说的；30岁以后，转到“儒家生活”，在他所作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儒家特别是孔子的思想和生活是推崇备至的。这之前，高赞非考入济宁中西中学，做过商店学徒，当过小学教员。高赞非饱读诗书，文章功底颇厚实。这一年（1924年），高赞非前往曹州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拜见梁漱溟。学者熊十力在梁漱溟主办的重华书院教书，高赞非所撰《论语研究》，深受熊十力和梁漱溟赞赏。梁漱溟认为中国必须推行儒家思想才有出路，所以他所说的“东方文化”，实际就是他所认为的儒家思想。高赞非对此是很支持的，对梁的思想很推崇。

高赞非很欣赏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这是梁自认为研究“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得到的中国唯一“出路”，他认为这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以为只有依靠他所说的“乡村自治组织”来建立所谓“乡村文明”才是中国的出路。他的“乡治”学说中，一不要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二不要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三不要中国发展工业。那么他所要的是什么呢？便是永远受帝国主义压迫，永远受地主剥削，永远保持落后的农业经济的这种殖民地式的封建社会，这就是梁漱溟所说的“乡村文明”。这种“乡治”思想，进步作用是有，但不大。当然这种评判有历史局限性。高赞非所看重的是发展乡村教育事业，教育兴国。1928年左右，梁漱溟在广州接办了那里的第一中学，依然把高赞非等门徒安插进去，担任班主任，来向学生进行所谓的“人生教育”。除高赞非之外，还有潘从理、黄存之、徐名鸿、席朝杰。黄良庸为校长，徐名鸿为教务主任（徐名鸿以后到福建参加“闽变”，为蒋匪捕杀）。在梁的“乡村建设”的理论影响下，高赞非也以“乡村建设”道路为改造社会和进行民族自救。

1929年，梁漱溟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的文章。高赞非等知识分子很是欣赏和赞同。这时军阀韩复榘任河南主席，河南的地主豪绅代表就征得韩复榘的同意，请梁漱溟到河南辉县百泉去办“村治学校”，于是“乡治”就一变而为“村治”。“村治学院”在1930年正式成立，它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前身，是梁漱溟与韩复榘建立关系的开始，当然是梁漱溟也是乡村建设派历史上重要的一页。1930年初，应梁漱溟之请，高赞非前往百泉“村治学院”任教，此后高赞非跟随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研究多年。高赞非与“村治学院”的主要人物都相熟。院长彭禹亭，是河南镇平的地主；副院长梁仲华是河南的地主兼商业资本家；教务长王怡柯也是河南的地主。这三个人都是村治学院的核心人物，地位比高赞非高。当然他们都和河南的上层官员们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彭禹亭又是老西北军的军官，和冯玉祥、阎锡山都有来往。梁漱溟祖家住北京，也认识不少官僚地主，因此和梁漱溟的政治思想非常接近。他们就约梁漱溟为学生讲课，和梁漱溟结合起来，成为河南一个正式的地主集团。高赞非、孙则让、张叔知都是该院的班主任。孙则让是王鸿一的学生，曾作过西北军某部的军法官，弄了一些钱，到日本住了两年，学了些日本和丹麦资本主义的合作社经验，回来就在这个学院里讲合作社“理论”，以后就成了乡村建设派的主要人物。高赞非后来离开河南，随梁回到了山东。1931年，梁漱溟开始在山东邹平县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接着就分派人员到邹平等27县招收学生，6月15日正式开学。从这个时候起在山东有了所谓“乡村建设运动”，并逐渐加以扩大。高赞非也担任了邹平山东乡建研究院班主任。当时邹平与定县、无锡的“农村运动”也有联系。高赞非担任研究院菏泽实验县的巡回导师、山东乡建研究院第一分院院长（教育

长)、菏泽乡建师范教育长。高赞非曾撰写刊印《地方自治与民众组织》等书籍,与梁耀祖、孙则让、陈亚三、梁漱溟、叶云春、王冠军、徐晶岩、时霁云、裴雪峰、蓝梦九、武诏文、张筱姗、于鲁溪、张继武、白莲村、方象鹤、王平叔等研究院的主要人物都有交往。

高赞非和梁漱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主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月,为了全国团结抗日,求得国家之进步与统一,梁漱溟奔赴延安,进行考察和交换意见。他拜会了毛泽东,以国事问题与毛晤谈多次,并将两种小册子和40万字的《乡村建设理论》赠给毛泽东。当时梁对抗日有悲观情绪,经毛泽东《论持久战》示之之后,心情豁然开朗。梁在延安待了18天,延安给他的印象是:生活条件差,但精神面貌却朝气蓬勃,与国民党地区大不一样。高赞非也主张坚决抗日,并与共产党建立联系。而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后,就解散反日会,取缔反日宣传,活埋县党委,韩复榘早和日本人有一种类似《何梅协定》的默契,韩在山东为了自己的利益,给日本人一种错觉,认为韩听话,能合作,可以利用。日本的政策是拉拢韩,要整个山东。抗日战争开始后,韩复榘逃避抗战,下令将乡农校枪支、壮丁抽走,日军很快逼近黄河北岸,占据鹊山,向济南打炮。高赞非认为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救国家,必须与韩复榘决裂。于是,高赞非在菏泽、郓城一带,组织抗日武装,创办《鲁西吼声》宣传抗战。高赞非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共产党武装取得联系,到八路军根据地参观,并与徐向前、宋任穷会见。1938年,高赞非在家乡出任临郛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鲁南抗日动员委员会四分会主任。他团结各阶层人士,展开动员参军、支前工作,创办青年劳动学校。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国共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高赞非为此很兴奋,也认为国难已纾、团结在望。但后来内战仍未停止。高赞非通过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思想发生极大变革,慢慢与“乡村建设”旧理论决裂。梁漱溟此时亦加入争取民主、反内战行列。1943年2月,高赞非加入共产党,以后献身党的教育事业。

沂蒙大地一支笔 (四)

——惠玉昆先生的书法历程和业绩

刘瑞轩

谈书论艺真知灼见

惠先生不是只知埋头写字的实践家，而是有高明的书法理论支撑的书法家。他虽然没有写过书法理论的文章，但他在教学中，在指导学生写字时都表露出他对书法的真知灼见。我们把这些片断、零碎的言论梳理、归纳一下，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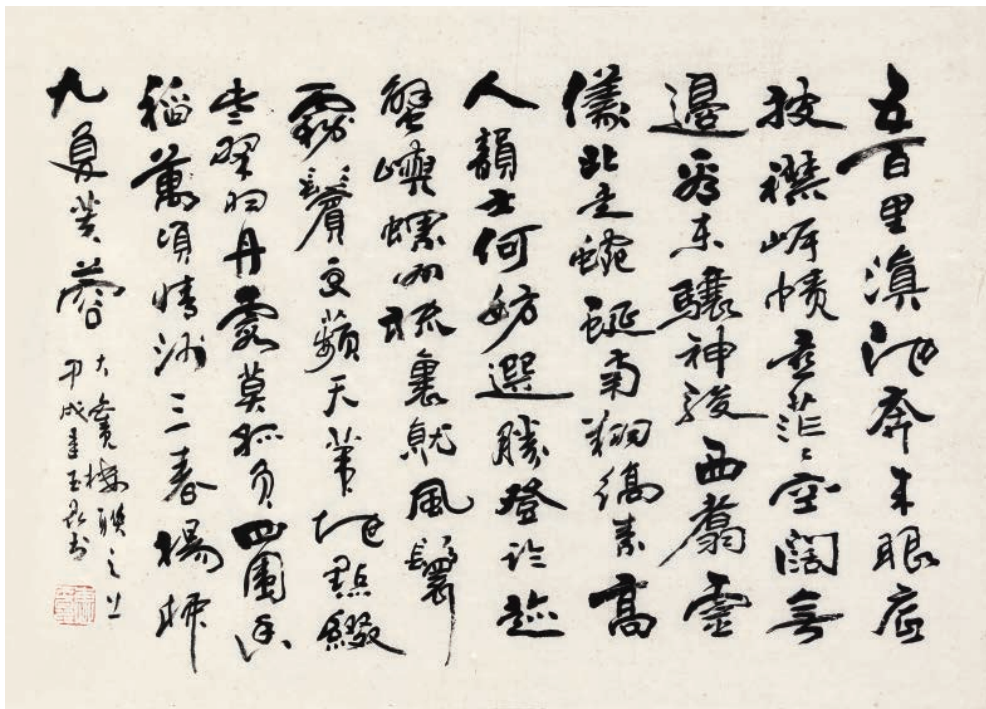
首先，他经常反复谈的是书品和人品的关系。他常引古代书论教导学生：“学书先贵立品，右军人品高，故入神品，决非胸怀卑污而书能佳，似可断言也。自来书品，视其人品，故无学不足以言书，无品尤不足以言书，此书道之理也。”（《书道》）他对学生许某说：“历朝历代，书品就是人品。我非常崇拜颜真卿，他为官清正刚强、忠君爱国。反映到作品上是崇高、壮美、正大的气概，他做到了人品与书品的高度结合。”他在指导身有残疾的学生薛玉霜时说：“学习书法，一定要先学做人，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要以德立人，练好字外功。”

书品和人品的关系，是书法美学中一个重要命题。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的、复杂的。如用线性思维方式，认为二者是直线关系，就是非此即彼，或此决定彼，此好彼也好，逆定理即彼好此也一定好。这样把复杂的关系简单化，得到的结论是会有偏差的，用实践来检验也不符合。比如：无产阶级革命家，写毛笔字未必都佳，而失败的皇帝赵佶却创出瘦金体，正人君子未必写得好，奸邪横暴之徒未必写得不好。

奸臣蔡京、秦桧的字也很可观。至于人们因人恨字，不喜欢他们的作品，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应该分开来说。根据现在书法理论家的研究结果，认为书法受一个人的性格气质、文化修养、审美观点影响较大，而与其政治观点、阶级立场无关。否则，历朝历代的封建官吏、名人雅士创作的书法精品能够为不同阶段的人所喜爱，能够流传至今，为我们当代人所欣赏学习，就不好解释了。

其次，书法爱好者在初学阶段，向惠先生请教时，他都要强调临帖的重要性。一位上过“书画函授”的学员说：“恩师结合自己几十年学习研究书法的经验，深入浅出地向我们讲解如何读帖、悟帖、临帖及背帖的要诀。”

古人有不少关于临帖的论述。赵孟頫在《兰亭跋》中说：“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意。”董其昌在《画禅师随笔》中说：“临帖如骤遇



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黄庭坚在《论书》中说：“余尝谓临摹不过学字中之字，多会悟则字中有字，字外有字，全从虚处着精神。”

惠先生融会古人的经验，讲临帖的方法。首先要选好帖，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如果喜欢肥厚的，则选颜体；如果喜欢瘦硬刚劲的，则选柳体，赵体比较圆润，有的笔画连带像行书，不宜初学。临帖时不要像儿童那样，看一笔写一笔，要去领悟笔画结构之特点，烂熟于心后再去临，这就叫悟。比如颜字，并不是笔画都粗，它是横细竖粗；它的竖并不是垂直的，有左弧竖，有右弧竖，如“国”字，左右两竖向两侧鼓，像人的肚子鼓起来，当然字就肥厚了，还要记住笔画之间的呼应、连贯，这样写起来一气呵成，才不致于把字写得支离破碎。他在教学生学柳体时，还专门总结出几句口诀：“点圆波短，横弱竖强。撇强捺重，并运圆方。短撇粗壮，短横上扬。回锋起口，挫口相当。笔笔顿挫，筋骨开张。折须提笔，颜柳同行。”

再次，惠先生能根据学生的水平不同因材施教，对学习有一定基础，能创作整幅书法作品的学生，便提出高层次的要求，引导学生向上提升。当他看到薛玉霜的作品，笔画和结构都可以，就是笔力不够，便指导她：“要讲究骨力。书法的骨力指的是点画中蕴含的力感、力度和笔力，这是审美的要义。古人多用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等语言表达书法骨力的雄健。”

古人很重视书法之骨力，蔡希综《法书论》云：“每字皆须骨气雄强，爽爽然有飞动之态。屈折之状，如钢铁为钩，牵掣之踪，若劲针直下。”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云：“书家贵下笔老重，所以救轻靡之病也。然一味苍辣，又是因药发病，要使秀处如铁，嫩处如金，方为用笔之妙。”

笔力是指用笔和字的笔画方面说的。笔画的点、线本来只有长短、曲直、角度、距离的区别，无所谓有力或无力。线条上这种力，是在它身上负荷着几何以外的一种成分，这是书写者赋予了自己的力这种精神的因素，并为广大的观赏者所理解，从而引起共鸣的结果。这样就把静止的笔画当作动态的东西来看待，把死的文字当作活动艺术来看待；有动静、死活的区别，强弱，开阖、起伏等便相应而生了。从文字的点 and 线，到书法的力度，中间存在着很大的一个距离，要经过漫长的岁月，书写者艰苦

的无数次的练习，才能走完这段路程，使书法成熟起来。

书法的笔力，与人身体的力有关系，但也不是绝对的。运动员很有力气，但写字未必有力；文弱的书生写字照样可以有笔力，但如果手臂衰老和病弱，也是写不出有笔力的字来的。

惠先生还要求学生讲究墨法。因为墨的浓淡枯润，是表达书写者的心意和追求的。黄宾虹说：“古人书画，墨色灵活，浓不凝滞，淡不浮薄，亦自有述。”（《画语录》）姜夔说：“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续书谱》）古代是喜爱浓墨的，所谓要“一点如漆”。唐人和宋代的苏东坡也都喜浓墨，清朝的刘墉被称“浓墨宰相”。相反的一派是喜欢淡墨，北宋黄庭坚常用淡墨，明代的董其昌也用淡墨，笔画写在泥金纸上，墨色清疏淡远，其笔毫转折处丝丝可数。作为一个书家，要把墨的浓淡配合好，浓者要如雄山，淡者如薄云，枯者如老树，润者如美玉。要想用好墨，必长期用功，日积月累，经验丰富，自然会控制自如，熟能生巧。

有的学生书法已很成熟，字内功已可以了，惠先生便要求要练字外功，要全面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比如日照的女书法家李晓君，她是在老师的教导下不断成长的，其作品已能参加国内省内展览，并加入了中国书协。在惠先生指引下，她又去北京拜花鸟画家吴悦石，学习大写意花鸟，这使她的书法线条更苍劲、有韵味，整幅字也有美的意境。惠老师看后很高兴认为其字已脱俗了，写诗赞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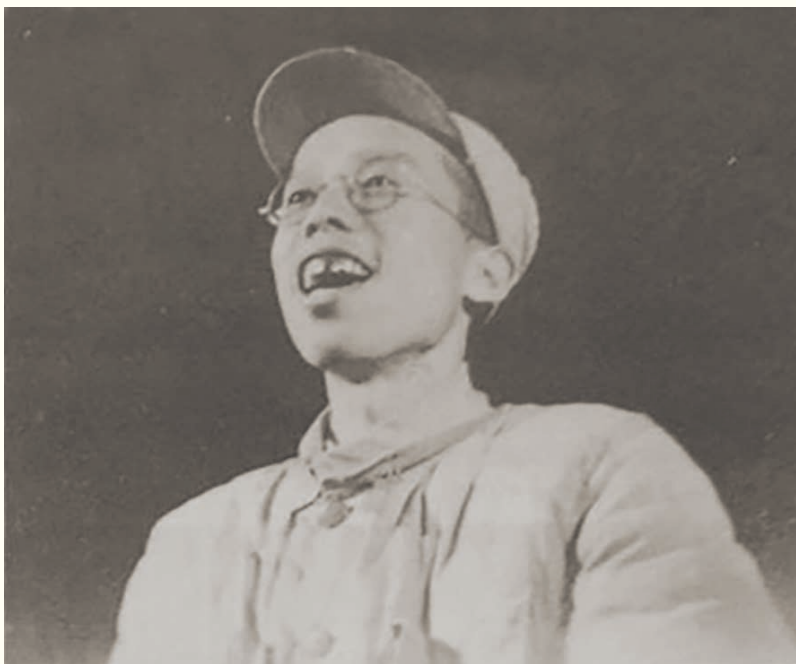
婉约苍茫两势通，走笔布阵见古风。

书韵不随流俗转，赖有学养字外功。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山东的音乐活动

章 枚



1948年章枚在济南演唱《黄河颂》

1946年2月14日，我到了山东临沂，被任命为华东军区联络部交际处翻译科长。这时华东军区文工团第一团已在临沂。团长是张望，指导员是李淦，团员有李乐、芦令和、姜雨生、严励、铁牛、徐兵珂、东峰、吕其明、刘泉、傅泉、孙永平、李琳、李玲君、李玲云、马旋、董克娜、黄坚、吴海影、王霞岚等。他们当时最爱唱的歌曲是李淦的《别让它遭灾害》。歌词的意思是，要保卫解放区的和平民主生活，别让它遭灾害。词曲的口吻很亲切，曲调也很顺口，合乎作曲的规律，是一首很好的抒情歌曲，也是李淦的代表作。

1946年4月，华中建大迁到临沂，成立了山东大学。校长是李澄之、田珮芝。领导上调我回去任艺术科主任。主要教音乐班，也兼教英文班。我通过排练合唱节目提高学生的音乐感。这批学生大都来自青岛和济南，很容易就唱准了七声音阶。山东大学的戏剧教员是王杰，他为山大大写了一个校歌《年轻的母亲》，我为之谱了曲，并在全校教学生们唱。

这首歌词写得很好。山东大学是党开办的学校，她的学生都是由于仰慕共产党的抗日民主、为人民服务、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来自五湖四海，投奔新解放区的青年。学校的教育就是党的教育，用“年轻的母亲”来形容共产党的学校，给青年学生一种异常亲切温暖的感觉。歌词“这儿有新的生命，这儿有火的热情，这是炼钢的熔炉，这是革命的家庭”，生动地概括了这个学校的性质。“山大啊山大！你是我们的母亲，在你温暖的怀抱里，把我们抚育养成”，热情地概括了学校与学生的亲密关系。最后几句则替同学们表达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雄心壮志。“祝福你永远年轻！”这个愿望有多么深远的意思，至今都值得我们去回顾、深思。有了这样的歌词，我的旋律就油然而生了。想当初，他们都那么热情地唱这首歌，他们毕业后，一听见这首歌，一定也会回忆起当年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地参加革命的情景，从中感到无比温暖。

1946年4月8日，博古、王若飞、邓发、叶挺四同志由重庆乘飞机回延安途中由于飞机失事而牺牲。临沂党政军文教各界于4月19日举行“四八烈士追悼大会”，王杰和我在16日作了《悲歌》，由华东军区文工团在会上演唱。四位烈士的老战友罗炳辉同志竟痛哭失声。我指挥的时候，带着沉痛的心情，慢步走到指挥台上，低头默念一会，才抬头用悲痛的眼睛环顾歌咏队，然后慢慢举起两臂，开始指挥。在排练的日子以及后来的许多天，华东军区文工团的同志们一早起床穿衣时，只要有一同志哼起这曲调，大家就不禁都跟着清唱起来，他们都很喜欢它呢！

1946年5月4日，山东大学正式开学。盖了新瓦房，分配给我一间，里面有一床，一凳，还有一张未上漆的新书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6月9日，音乐戏剧班奉命迁到离临沂城几里路的后辛庄，这里风景幽美、树木繁多、丘陵高低起伏，层林远近相映。有一块低地，四周树木环绕，绿草葱郁，我称之为“仙人窟”，我们在庄里每天排戏练歌。为了准备上前线慰问部队，9月12日成立了山大剧团。我任团长，萧挺、陈芬任指导员，王杰和傅超武任导演。女团员有何云、惠玲、杨梦致、王苏、张敏、张仲璧、燕临、张兆惠、林雪荫、张素芬、王鲁鸿、朱沐、李伟、章丁、贾克、杨梦幻、杨梦玲、苏佩双、叶丹等19人；男团员有徐史、姚新德、曹鹏、宗弼、何彬、郭集义、胡其明、姜淮璞、仲星火、邱石平、郑重、王骏、郑虹、杨梦昶、李琦、郭宗林、殷金通、高骅、高水、崔耀东、李玄、顾黎平、苏嘉、周城、饶兴义、袁峰、姜超、林建文、王志棠、戎圣才、王绍义等31人。全团共55人。这些同志中有许多在解放后都成了导演、指挥、电影演员、音乐教师、文学编辑、美术编辑以及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成绩，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和山东大学的教育培养给他们打下基础是分不开的。

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民主人士闻一多和李公朴的消息传来，临沂各界准备开追悼会，对国统区的民主斗争表示声援和支持。山大同学何彬和我于7月29日写了一首《悼受难者》，在8月10日的追悼会上演唱。

1946年秋天，蒋介石向华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在苏北，粟裕部队七战七捷，阻遏了敌人的进攻。陈毅司令则准备迎击进驻鲁南枣庄的蒋军的快速纵队。领导上决定山大剧团到枣庄前线慰问部队。傅超武写了一个话剧《英雄好汉》，由王杰主演。内容描写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故事，剧中有一个插曲《囚徒歌》，是由主角在狱中唱的，由我谱曲。同时还写了一首《向解放军致敬》。

接着，为了动员妇女为前方战士做棉衣，何彬和我写了一首《做棉衣》，歌词写得很好，写出了农村妇女拥护解放军的深切之情，各句在字数上有许多变化，使我在曲调节奏上也有多种变化。

1946年4月，王杰写了一个歌词《打得好》，让我配曲。因歌词从头到尾都是七

个字一句，没有节奏上的变化，我没有配好，让朱践耳配。朱践耳想了一个好办法，把“打得好来打得好，四面八方传捷报”改成“打得好来，打得好来打得好，四面八方，传捷报来传捷报，”使后半句字数多一点，象打锣鼓点子一样，热烈而又紧凑，结果曲子也写得很好。这首歌曲是很适合群众唱的，后来为了演出的效果有更多的变化，我把它配成一个二部合唱。

我们山大剧团于1946年10月19日步行出发，21日到达鲁南前线的安家庄，24日起先后为第一纵队的一团、野战军直属队、三团、特务团、二团、二旅旅部、四旅和六团演出《英雄好汉》。演戏前先唱合唱，第一首就是《向解放军致敬》，然后唱《打得好》《做棉衣》《擦枪歌》等齐唱歌曲，最后以《勇敢队》结束。

《向解放军致敬》的歌词写得很亲切、热情，把后方人民对前线部队的热爱和殷切希望都表达得很动人。在音乐上，我运用男声和女声的音色对比，恰如其分地表达歌词的意思。当时来解放区参加学习和工作的女同学比男同学少，合唱队中男声比女声多一倍，他们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所以我作曲时都把调子定在他们的自然音域里，使他们的高音唱得圆润而不至于尖锐嘶哑，尽可能用三度和六度这种和谐的音程，使二部合唱有四部合唱的和声效果，不需要有和声效果的句子就用齐唱，而发挥亲切的语气来取得效果。我尽可能在适当的地方运用对位化的和声来造成众口同声来表现热烈气氛，这首合唱和《勇敢队》在我们每次演出中都是必唱的保留节目，每次都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据在听众中听取反应的同志说，有一个干部在第一天听过我们的演唱以后，第二天晚上特地从很远的地方来专门再听一次，看来他很欣赏这首合唱的和声效果。

鲁南战役前，我们还在路边设了“宣传棚”，向过路的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战役结束后，我们还参加四团阵亡将士的追悼会，唱了追悼歌。我们的胜利是战士们的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要学习他们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由于蒋军重点进攻山东，山东大学分散转移，离开临沂。1947年2月，山大剧团奉命转移到北凉水，归华东军区政治部领导，改名为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第三团。此后，我们曾到“伤兵归队处”、卫生部和平医院和休养所为伤兵演出慰问了两个月。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我们四月底从鲁南经过鲁中的山区，步行了20天，到黄河北的渤海军区去。后来听了陈毅司令的报告，才知道我军已经经历了一场非常艰险的战役，扭转了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局面。我们在渤海区参加了一个时期的土改、审干和整风、学习，准备南下。

为了配合土改运动，山大剧团排了《白毛女》，演喜儿的是惠玲。后来人们反映，这出戏对土改运动起了推动作用。8月，我们曾下乡参加土改工作。

8月19日，我被调到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艺科工作，编了两期油印刊物《文艺工作》，其中发表了我写的两篇辅导文章《旋律与节奏的展开》和《洋嗓子与土嗓子》，据读者反映，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许多同志寄来了一些作曲的习作，我也尽可能帮助修改。

这时在广大的解放区，有很多部队、农村剧团、文工团和学校，但是音乐干部是很缺的。我们的华中鲁迅艺术学院、师范学校、建设大学、山东大学等，由于敌人不断骚扰，不能在和平环境中长期办下去。大量的知识分子到解放区来参加革命，大部分读过小学或初中，有一些文化基础知识，包括会读简谱或会记谱，能把听过的民歌和自己心里想象的曲调记成简谱就算很不容易了。我们的文工团有时把部队文化教员或农村剧团的干部集合起来教几个歌子，通过教歌也教了识谱、指挥（实际上只是打拍子）。他们起了推广歌曲的作用。但是他们除了听过、唱过一些民歌或简单的歌曲以外，见识不广，脑子里没有储蓄多少旋律材料，所以作起曲来一想就是那些简单的曲调，表达不出自己的战斗热情，他们的作品在旋律上不敢作五度以上的大跳越，

在节奏上比较呆板，不敢把音拉长，缺乏长音和短音的变化和对比，所以总的听来觉得很拘束、不舒畅。我本来也没学过这些乐理，自己作曲时也不是有意识作这些变化的，只是根据自己的感觉，选择较好的自然而然地流出来的。但是我看了这么多习作，又有提意见和帮助修改的任务，发觉出许多不舒畅的地方，反其道而行之，才发现这些问题。由于来的稿子很多，不能一一作答，就把修改的例子总结起来，用例子说明问题，写成一篇《论旋律和节奏的展开》，在我编的一期油印刊物《文艺工作》上发表，发到连队里去，这种辅导工作只是对初学者的一种启发，并不能教会他们作出优秀的作品。但是当时在战争环境中，没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优秀作品供他们参考和借鉴，也不能长期和他们在一起共同切磋，群众的唱歌水平也不高，只能唱一些比较简单的歌曲，所以有些歌曲还是起了鼓舞士气的作用的。

此外，我自己在战争时期也写了21首水平不高的歌，例如《解放军独立第四军军歌》《运河水》《五十年代的青年》《护士学校校歌》《农村挑战歌》《战斗英雄》《魏来国》《自卫战》《金星笔》《千里的雷声》《新潍坊》《王耀武》《唱个解放歌》《向人民解放军致敬》《一万张捷报》《一九四九年》《新妇女》《追战犯》《你看你看》《咱们工人多爱他》等。写得不成功的原因有多种：（1）歌词题材是广泛的，但缺乏艺术性；（2）没有用心把它写好；（3）缺乏精益求精的精神，满足于一般化。所以在这里只能作为一种经验教训来提。

孟良崮战役后，被俘蒋军的一个军乐队转入我军编制，由华东军区宣传部派余中石和宗弼二人去领导，后来朱践耳调来，我们也为这个乐队编了一些军乐谱。我曾编过《马赛曲》《大进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三八节歌》《凤阳花鼓》《孟姜女》《勇敢队》《国际歌》《红缨枪》《野战军进行曲》《跟着共产党走》《红旗歌》《东方红》《秧歌舞》。

1947年9月，宣传部内干部整风。11月，文工团精简，大部分同志分散到各旅工作。

1948年4月，香岩同志为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写了一个歌词《五月的太阳》。

1948年7月底，我认为1946年9月写的一首《胜利呀前进》写得太一般化，没有表达出歌词中的战斗气概和解放战争一往直前的气势，就把它重写了一遍。

1948年9月至1949年4月，我被调到评剧团和军乐团帮助“三查三整”、审查干部和整风。

1948年9月，我军解放潍县，10月解放的济南。华东军区文工团的三个团和新安旅行团都进济南演出。济南广播电台还用钢丝录音带录了我唱的《怒吼吧长江》《延安颂》和《胜利之歌》。

解放济南后，我们从别的文工团那里学会了几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其中有一位不知其名的作者创作的《解放区的天》、陈志昂自作词曲的《解放区的歌声》和王久鸣的《跟着共产党走》。它们写得非常好，可以说是山东解放区有代表性的作品。

后来有人开玩笑地说解放区无“嘿”不成歌，还有人批评这些歌中的滑音以喊叫代替音乐。其实这些“嘿”声和滑音来自群众的歌唱，我们只是因为它们很能表达群众对得到解放高兴得不得了，非要把这种欢乐的心情喊出来才痛快，我们自己也觉得很好，所以才把它们记录在谱子上。外国的歌唱家们的演唱中也不是象机器一样按着音高的振动频率来唱的，而是要求依照情绪作各种“偏离”。作为一种艺术表现的手法，且不说我国的民族传统唱法中经常运用滑音了。《解放区的天》中的许多“嘿”是由于歌词唱到那里还不足以表达心中的高兴，所以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加上“嗓之嘿之”才行，好象一些花腔女高音的许多“啊”和小提琴协奏曲中的“华彩乐

段”那样。

还有些人批评《跟着共产党走》中“灯塔”用“拉”“米”音，听起来象“等他”，倒字了，这也许是一个缺点，适当注意是对的，但若处处防止倒字，就会束缚旋律的自由发挥，使歌曲唱得象说话差不多。而且这首歌试用几句话就把共产党的本质特点即它的性质、作用、最终目的和群众对党的忠心和对革命胜利的信心都表达得很准确。这首歌在解放初期，由于有领导传达了一位苏联专家讲的一句令人误解的话，这首歌被禁唱了，以致被埋没了几十年。在1981年国庆节“老战士合唱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中，我建议不唱我的《黄桥烧饼歌》而唱《跟着共产党走》，替它恢复了名誉。

这期间，在山东解放区进行文艺工作的，除了山东军区文工一团和我们三团之外，还有野战军文工团。该团团是黄燊和张望，下分为七个队，一队以前线剧团为基础，队长是丁世贤、李永怀（后来是沈亚威）；二队以大众剧团为基础，队长是张洛；三队以淮南剧团为基础，队长是张泽易，副队长是郭民，指导员是何捷明；四队以淮北大众剧团为基础，队长是苏坤；五队是军乐队，队长是洛率，副队长是张海，指导员是李桐生；六队是电影队，队长是苏理；七队是京剧团（娃娃剧团），指导员是张蔚。此外还有新安旅行团，团长是左林（后来是张拓），团员有陈明、陈强、陈伟、陈捷、张渔、张依、黄叔宽、王德威、王山、郭立范、方南君、李群、舒巧等70余人。他们在德州一带演出和宣传，济南解放后进了济南。此外还有广东东江纵队文工团（团长是谭军、团员是乔毅、华英、游波、邓长珠等）、耀南剧团、京剧团（团长是常平，指导员是刘泽）、军政大学文工团（团长是王瑜）等。

由于分散活动，我除了偶然对他们进行辅导外，具体活动情况不了解。这里所提的，只能说明当时有大批文艺工作者在为解放战争服务；我在这篇回忆录里，只能介绍我亲身接触到的情况。

在淮海战役中，我们的前线指挥所，不但有军事指挥处，而且还有政治工作指挥处，专门指挥火线的政治与文艺工作活动。各文工团不仅利用电话教歌，而且在梅花形地堡内，教周围地堡中战斗着的战士们唱歌，鼓舞他们的士气。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他们的活动：

一、在淮海追击战中，部队追到哪里，小群演唱、快板和号子小组也追到那里做鼓动工作，有一首《飞毛腿》歌：“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在追击战中普遍流传。当部队围困敌人时，文工团的同志配合这一任务，实行了“锣鼓围困”“快板围困”“歌唱围困”与“腰鼓围困”，在敌人的四周，大打其锣鼓、腰鼓，大唱其歌，大说其快板，敌军抱着好奇心，不管长官吆喝和危险，探头探脑地要看个明白，正好达到我军宣传瓦解敌人军心的效果。

二、在军事行动中，文工团预先赶到部队必经之路，设立了“鼓动棚”，在部队行进中展示标语、招贴画，唱歌，喊口号，喝采，鼓舞战士士气。有些战士说：“文工团的女同志们都能比咱吃苦，咱们还能说辛苦吗？”

三、“前沿鼓动”。例如当我军的山炮开始轰击时，某军的沈雄飞文艺活动小组立即到突击排去唱歌：“同志，别轻敌，别骄傲！死虎要当活虎敲，勇猛和技术结合好。”战士们感动地回答说：“谢谢同志们的关心，我们一定完成光荣的任务。”

四、“单兵活动”。在战斗进行中，文工团零星分散，各人带把胡琴或口琴等乐器到战壕里，到班排里，从这个战壕到那个战壕，从这班到那班，采访，编曲，唱歌。例如女同志马旋带了小提琴到战壕里参加一个班的火线庆功，为英雄们奏乐、唱颂歌，并把亲手剪的光荣红星挂在英雄身上。战士们感动得流泪，说：“上级太关心我们了，我们更要好好地打仗！”

在淮海战役中，沈亚威、韦明、陈大莹、张锐等同志分别写了《乘胜追击》《捷报！捷报！歼灭了黄伯韬》《打铁要趁热》《狠狠地打》《歌颂淮海胜利》等歌曲，组成《淮海战役》组歌。朱践耳在1980年出版的《沈亚威歌曲选》中的代序中说：这些“都是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此外，在华东解放区工作的音乐工作者们也写了不少较好的歌曲，例如晓河的《山是我们开》《靠我们打胜仗》《穷根祸根齐挖掉》和《看它跑哪里》，张锐的《武装保卫解放区》《两个部队不相同》和《向南进军》，沈亚威的《打》《工农兵》和《功劳运动歌》，尤飞的《前方有一个兵工厂》，何方《依靠老百姓》和《拉开两条飞毛腿》，何仿的《练兵》和《去掉一个大祸害》，梅滨的《行军歌》，张革非的《临蒙道中》，黄苇的《飞毛腿》，佩之的《战斗进行曲》，朱践耳的《敲碎你的脑袋》，李淦（水金）的《立功歌》等。这些歌曲的词作者有陈毅、赖少其、天然、鲁岩、彭彬、吴镇、闻达、严寒、杨浓、蓝燕、韩塞、培武等，有些是晓河、张锐、黄苇、何仿、陈大莹自己写的。

1948年12月，华北解放军解放了石家庄，延安的文艺界都到了石家庄。新安旅行团派了张拓、张依等同志去那里向华北文工团学了秧歌和腰鼓，我也和胡德风去了解他们的文艺政策和经验。李焕之、张鲁、姚锦新等同志都给我介绍了他们的经验。1949年1月，我军解放天津，我们一小部人去听取孟波同志介绍的经验。二月初我军解放北平，我们也随同华北的同志们进北平住了一个多月。由于徐州即将解放，华东军区政治部令我们回济南，3月9日进徐州，然后回到滕县住了两个多月，准备南下。5月25日上海解放，我随军进入上海，任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音乐室主任。

华东军区文工团的同志们入上海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有三团傅超武、朱践耳、仲星火、王骏、邱石平、顾黎平、陈芬、张兆惠等，一团的严励、李玲君、李玲云、铁牛、吕其明、董克娜、孙永平、刘泉等。萧挺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宗弼到了军乐团，曹鹏被送到苏联学习后到了上海乐团，胡德风和一团的马旋到了总政合唱团，王杰到了山东省话剧团，一团的李淦到了济南军区宣传部，张望到长影，二团的洛辛、张锐到了南京军区歌舞团。他们都各自发挥了在解放区斗争生活培养的奋斗精神和才能。

抗战时期的沂蒙农村剧团

郑玉强

抗日战争时期，沂南县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在另一条战线上，即文化战线上的宣传鼓动和文艺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农村的文艺活动，迄今仍令那些亲身经历者和知情者赞叹不已。

1940年7月，山东省文化救亡协会总会在青驼寺成立。文协成立后，为了广泛地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各级文化团体在抗日根据地大力提倡发展农村剧团。但1942年以前的农村文艺活动，只是在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有所开展，新年、春节期间能活跃一时。那些常年生活在闭塞山乡的农民，只知道世上有大戏，听过一些地方小戏；对于话剧、歌剧、歌舞剧和各种曲艺舞蹈等没有听过，更没有见过。1943年，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积极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尔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到基层农村，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在山东省文协及各区文协、剧团的帮助、推动下，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农村文艺活动才有组织、有计划地广泛开展起来。

当时，群众文艺活动的开展，主要是以戏剧普及与大量组织农村剧团为重点。在这一工作开展得最活跃的鲁中区，沂南县是最活跃的两个县之一。当时全县有321个行政村，而农村剧团则发展到110个，约占全县村庄的三分之一。

农村剧团演员大多是比较活跃的男女青年，以青年学生、教师为骨干。演出的戏剧种类很多，有话剧、歌剧、小调剧、秧歌剧、锣鼓快板剧、京剧、弦子戏、活报剧、杂耍剧等。最普遍的是秧歌舞，包括打花棍、打花鼓、跑旱船、木偶戏、抬赃官、踩高跷、老婆舞等形式。演出活动经常是在春节及各个纪念日举行，方式多种多样。既有在春节期间的娱乐性表演，也有为庆祝、欢送、欢迎、祝捷等活动举行的各种农村剧团的联合会演。1943年的元宵节，沂南县举行了第一次联合会演，三个区到了九个农村剧团、十多个村庄的杂耍。观众达4000多人。岸堤区兴旺庄剧团的一个女演员的母亲跋涉了30多里路也赶来参加，亲自为女儿化妆。演出从上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方才结束。

这些农村剧团演出剧目的来源，大多是靠各文化部门及各戏剧团体的帮助，有的剧团也能创作或改编适合他们自己口味的剧本。岸堤剧团改编和创作了《战长沙》、皮簧《战济南》、梆子《辞母抗日》等。兴旺庄男女两个剧



团，在一年春节前的10天内，排练了七幕戏，还创作了《老李参军》等三幕剧。常山区（今马牧池乡）横河村剧团在刚成立的时候，用生产业余时间排演了三幕剧，两年内创作了三个剧本，两个杂耍。南瓦庄剧团的领导人孔老道，60多岁了，还创作了10多个剧本。不要以为抗战时期的农村剧团都是因陋就简，很粗放，演员又大都是庄户土老帽，没有什么演技可言；但是他们不仅把群众斗争的故事编成戏剧和活报剧演出，而且演出也很有水平。1944年，沂南县举行第二次联合会演时，界湖、横河、马牧池、南寨、上高湖等五个农村剧团演出的话剧《铁牛与病鸭》、小调剧《归队》、梆子戏《两个错字》、快板剧《慰劳》、小调剧《劝郎参军》等，由于剧本丰富的政治内容和演员良好的表演水平，观众赞叹不已；尤其是从敌占区里来的开明绅士和青年学生们，甚至以为是八路军部队剧团以农村剧团的名义演出的。为了证实是泥腿子庄户汉演的，第二天，这五个农村剧团的演员又在舞台上来了一个大合唱。当这些绅士们亲眼清晰地看到台上既有小脚放成大脚的年轻姑娘，也有面色黧黑、粗布衣裳到处打着补丁、腰里别着旱烟袋的庄稼汉时，这才相信是真的。在抗战时期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沂南县农村剧团还创造发明了很多的演出道具。横河村剧团用泥铸成钢盔模型，兴旺庄剧团用葫芦头作胡琴，有的剧团燃烧干木柴代替灯光，用十多个学生手拉着手，站在前台当作前幕，开幕后分向两边，代替边幕；而且在幕间唱歌，活跃会场。尽管这些道具都是很简陋的，但演出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农村剧团的文娱活动，还注重配合当时农村的各项工作来进行。在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变工互助开展大生产运动、反奸诉苦、动员参军、开展冬学运动、支持妇女解放等工作中，都能看到剧团所起到的良好的配合作用和表现出的热情。在根据地开展的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运动中，常山区横河村的一个地主看了剧团演出的《减租》后，急急忙忙找到村干部说：“你们不要再演这个戏了，我照减就是。”在减租减息运动开始动员的时候，剧团排演了京剧《谁养活谁》，群众看过戏后，争着找地主讲理。有的村在进行“查减”的时候演出《明减暗不减》，佃户们原来是不承认地主的明减暗不减，看过戏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被地主愚弄了。于是，纷纷积极地行动起来，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彻底地进行减租减息运动。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许多农村剧团都排演了根据莒南县的劳动模范郑信的事迹编写的剧本《郑信开荒》，以歌颂劳动光荣，推动大生产运动。马牧池剧团配合

扫盲运动，演出了反映不识字害处多的《两个错字》。该剧说的是某村父子二人在外地做买卖，开了一处小商店，给家里人写信说，生意很好，每天能赚不少钱，“并雇一人”。只因识字太少，把这后一句写成“病故一人”，引起在老家的婆媳二人的误会。婆媳在老家悲痛欲绝，并披麻戴孝哭着去城里处理后事，上演了一出闹剧。演出时，其中扮演儿媳的女演员演得悲痛动人，观众也跟着落泪，都感受到了不识字的害处；暗暗下定决心要多识字、学文化。为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有的剧团排演了鲁西梆子《老婆婆的觉悟》，有的排演了《王大嫂翻身》。许多刻薄的婆婆看了以后对媳妇的态度就有了改变。

当时许多农村业余剧团，就建在日军和伪军据点的周围，村庄和据点只有一河之隔。如岸堤区兴旺庄每一次演出时，都会吸引一部分敌占区的群众偷偷渡过汶河来看戏。看完了戏，再渡河去。回去后，便长吁短叹地说：根据地就是好。咱们这里哪有这个福气！河东和河西好比是天堂和地狱啊！

信鬼神迷信，在当时的农村是比较普遍的。通过文娱宣传和冬学、识字班、小学内进行破除迷信的教育后，情况都大有改变。不少村子里的土地庙和其他的庙宇中的神像都被农民掀掉了，有的村子干脆把庙宇变成了冬学、小学和民兵自卫团的值班室。许多村子还办有读报组、黑板报、街头识字牌等文化组织与活动形式。农村中的“庄户学”“识字班”（青年妇女学文化的组织）、抗日中学和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剧团在1945年秋季解放军向敌占区大进军的时候，也走上了前线。他们在城郊、在炮火下、工事里以及民工的行列里，用戏剧和歌舞，直接为战争服务。有的农村剧团在临沂解放前的一个月的战斗中，一直活跃在前线；其后，沂南县南薛庄、北薛庄等村庄的秧歌队，其中多数还是妇女和儿童，到了包围伪军王洪九的阵地。尤其在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时，沂南人民担负了极为繁重的支前任务，农村剧团又组成了支前随队剧团，面向战士和千百万支前民工，进行宣传鼓动。他们以真人真事为题材，随编随演，“看见什么，听见什么，演什么”。还有的做什么演什么。“有一刻演一刻，走到哪里演到哪里”。农村剧团以及由他为基础、为骨干的随队剧团，在支前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不仅培养了和锻炼了更多的文艺积极分子，而且推动了民工的进步，在广大民工的行列里，涌现了大批的立了功的英雄和模范。

（说明：本文参考了《山东革命文化丛书》有关章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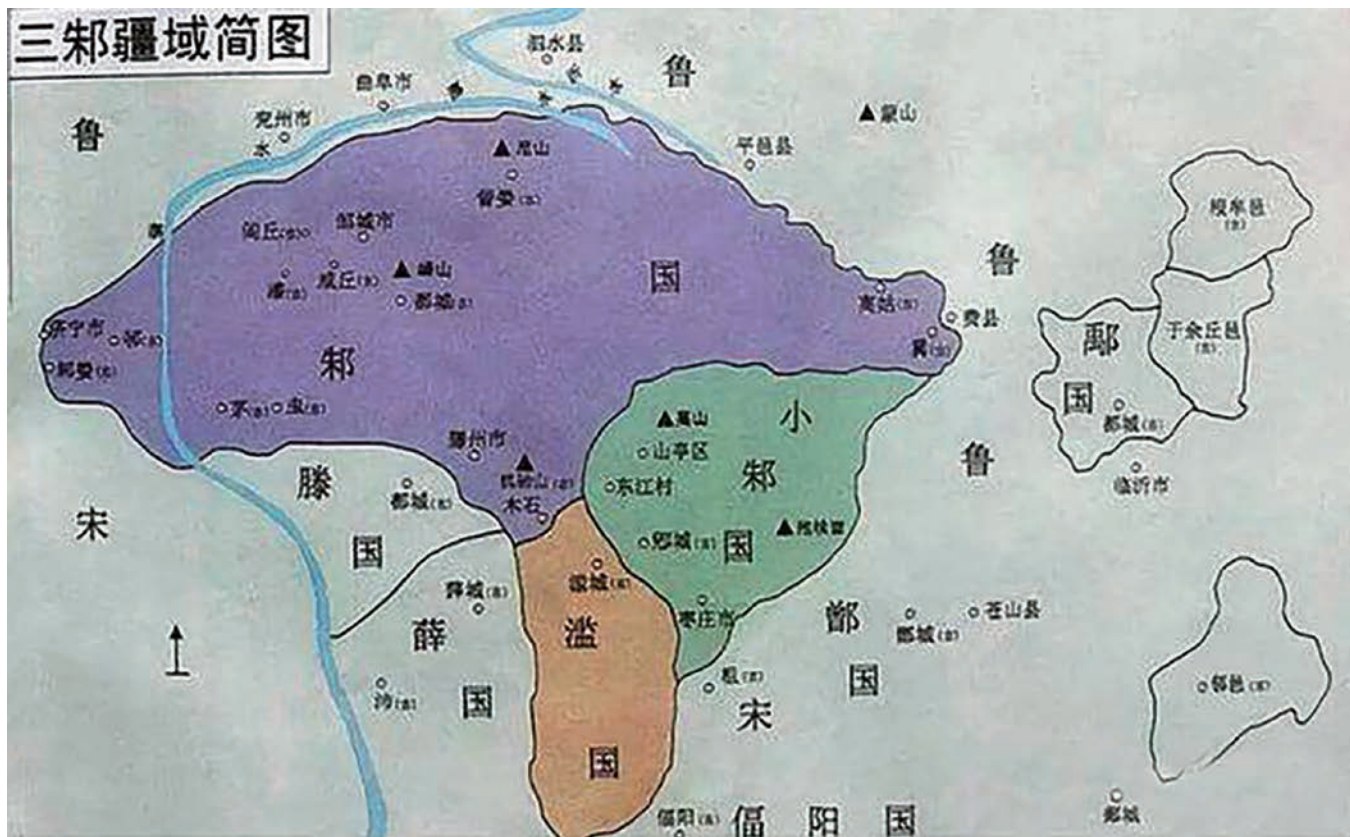
东夷故乡寻踪 (四)

高雷

四、邾分三国

邾国横跨鲁南，位于今济宁以东、枣庄大部、临沂以西，之所以被称之为东夷，一是占据了东夷故地，二是沿袭了东夷习俗，《春秋·僖公十九年》：“己酉，邾人执郕子，用之。”《左传》解释这件事说：夏天，宋公要邾文公杀了郕子来祭祀睢水之神，想以此震慑东夷部落。而祭祀睢水之神是东夷人的习俗。对此，陈槃理解为：“然则邾，东夷也。（《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

邾最早出现在金文中，有两种写法：《邾公劬钟》则记作“邾”，《邾公恽钟》《邾公华钟》铭文作“邾”。邾，从邑，朱声，形声字，表示地名，这种造字方式出现在春秋之时，说明邾国那时已经存在了。邾在文献中有不同的



称谓，《古今人表》《路史·后记八》作“朱”；《路史·后记一》又作“侏”；《国语·郑语》《晏子》作“邹”；《孟子》《韩非子》《新书》记为“骆”；《公羊传》《礼记》作“邾婁”。造成这种现象原因有二，一是造字初始，增笔减笔现象的发生；二是同音假借，导致了文字上的差异。

邾人来源世系明确。祖先为高阳氏，即颛顼。《大戴礼记·帝系》和《世本》记载，颛顼生称，称生卷章（老童，字形之误），卷章生重黎，重黎弟吴回又名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6人，《大戴礼记·帝系篇》载：“陆终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产六子，其五曰安，是为曹姓。曹姓者，邾氏也。”陆终之第五子晏安（一曰安）。晏安受封于曹，是曹姓的开姓始祖，传二十世后而被灭国。陆终之第六子是季连，“半姓，楚其后也”，为楚国的先人。可以说楚与曹本为一家。商周鼎革，周武王兴灭国，继绝世。绍封晏之后曹侠于邾，为附庸国。这就是邾国的来历。

任孔闪在《“曹国”新考》中考证：曹族以“曹”为姓或是因为晏安在原始部落联盟中担任过处理诉讼的职务，故姓曹。曹姓部落早期居住地在今河南灵宝市的“曹阳”，商汤伐夏桀，消灭了居于今定陶城南的三鬲部落，迁曹姓部落于此地，“更其国曰曹”，作为商附庸国。周灭商，武王将其六弟振铎封于此，一山不容二虎，不得不将曹姓部落东迁至邾。《路史·后记》记载：“武王得曹挟（侠），复封之朱，曰朱婁。”这就是邾国人姓曹的渊源。其实曹侠虽然仍生活在曹地，至武王鼎革前，已失去了贵族的地位。周武王兴灭国、继绝世，恢复了他们家族显赫的身份，并把他们迁到东夷，邾人乐得其所。

王献唐《春秋邾分三国》里说：“邾初本据邹县东北訾婁一带，后渐吞灭附近小国，而南而西，奄有邹滕，若咸，若郛，若茅，若于余，若须句，若根牟，若鄆，若闾，若郟均为所灭。夺人之地，以为己有，疆域日拓，自非昔比。”

邾国最盛时期的疆域，东至沂，与莒国隔水相望；北至濑，同鲁国划河为界；中据邹峰，西南以茅邑（今鱼台东北）为边境，和宋国接壤；西及西北以郛（今济宁以北）为边疆，跟曹国搭界；南部与郟国（今兰陵）、滕国、薛国相邻。

邾都前后凡数迁，《路史·国名纪》载：“周封侠，后迁婁，是为邾婁。”《滕县金石志》载：清道光十年（1830），城东北80里凤凰岭涧沟中，出伯俞父诸器……其中鬲、盘、匜、簋等铜器铭文中，皆有“邾”字。这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凤凰山南一带曾是邾国故都。这里距曲阜古城东南数十公里，也印证了《路史·国名纪》“一云仙源故曲阜东南四十古邾城”的说法基本正确。其年代比邾文公迁峰（公元前614年）早约200年左右。

《左传·文公十三年》云：“邾文公卜迁于绎”，“绎”或作“峰”，《水经注·泗水下》云：“春秋左传所谓峰山也，邾文公之所迁，今城在邹山之阳。”即在今邹县东南20里的峰山之阳纪王城一带。

陆终第五子晏安至邾国第一任君主曹侠之间的世系已不可考。曹侠封邾后，侠生非，非生成，成生车辅，车辅生将新，将新生訾父，訾父生夷父。夷父，名颜，又称邾婁颜，是为邾武公。邾武公时正值周宣王在位时期。秦嘉谟辑本《世本》中记载：“邾即安之后，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侠为附庸，自安至仪父十二世进爵称子是邾子克。”邾国初为鲁国之附庸，《左传·隐公元年》称“邾仪父”而不称爵，传曰“未王命，故不书爵”，而邾国被封爵的时间，据《左传·隐公元年》孔颖达《正义》引杜预《世族谱》云：“齐桓行霸，仪父附从，进爵称子。”故邾国为子爵当在齐桓公称霸时。但直至庄公十六年，《春秋》载“邾子克卒”，似乎至此才正式称邾子。

王献唐认为：“春秋时邾分三国，一为邾，一为小邾，一为濫，同出一系。土地

政权，各不相谋。（《春秋邾分三国考》）”

据《公羊传》记载：邾武公，夷父颜娶盈姓之女为妻，生子夏父及友（一名肥），其后，邾颜封次子友于邠（今山东省滕州市东）这个地方，以颜为氏，作为邾国的附庸。时间呢？大约在周宣王（？—公元前782年）当政的时候。邾友所建小邾子国，传到他的孙子黎来时，因数次跟从齐桓公勤王有功，《公羊传·僖公七年》载：

“夏，小邾蒯子来朝”汉何休注：“至是所以进称爵者，时附从霸者，朝天子，旁朝罢，行进，齐桓公白天子进之，固因其得礼，著其能以爵通。”其后正式被周王室封为子爵，成为子国。或称邠，或称邾，俗称小邾国。此为邾国二分。小邾国初封的旧滕县城东的邠城（小邾国故城），四世邠犁来迁移至今枣庄市西北山亭区的“邠犁来城”，鼎盛时期的疆域大致以现在的枣庄市山亭区为中心，东达兰陵县西部，北达平邑县、费县南缘，西达滕州市中部，南达枣庄峰城区。

公元前796年，夷父颜卷入鲁国内乱被周天子诛杀，其弟弟叔术被立为君。《公羊传》记载：夷父颜的妻子盈姓之女，非常美丽，国色天香。为了为夫报仇，她提出：谁将杀害夷父颜的凶手杀掉，就做谁的妻子。后，叔术用计将杀害夷父颜的罪魁鲍广父、梁买子二人杀死。她便做了叔术的妻子，并育有一子，名盱。据《公羊传·昭公三十一年》所载，年幼的盱与邾颜长子夏父争食物，叔术恐“小争食，长必争国”，遂将国君之位让给了侄子夏父，携家眷迁居濫地，别为一国。时在周厉王初立。此为邾国三分。王献唐认为：“濫非天子所封，僻处一隅，与同时诸侯无邦交兵伐之事，不著于世，天下几不知有濫。”（《春秋邾分三国考》）濫城的位置在今滕县东南，陶山以北，周围十余里。

邾国的历史主要见于《春秋》《左传》两书。经考证可以确认邾的国君连同叔术和夏父，只有十世。青铜器中与文献记载的邾国国君世系相印证的有邾公恂钟、邾公华钟、邾公鋤钟及邾伯御戎鼎。郭沫若认为：“邾君之名见于春秋者八世，曰克（字仪父）、曰琐、曰蘧蔭、曰纘且、曰恂、曰华、曰穿、曰益，无与御戎相当者，疑此器在春秋以前。”（《两周金文辞大系》）西周与春秋之交邾之世系有两世无考，则邾伯御戎很可能就是这两位国君中的一个。此外还有邾来佳鬲和邾讨鼎，邾来佳与邾讨的身份暂时无法确定。

见载于史册的第一位邾君是邾仪父。邾仪父，名克，生卒年月不详，即位时间亦不可考，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其事迹才见于《春秋》。《左传·解经》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杜预《世族谱》云：“自邾侠至克十二世，始见《春秋》”。邾夏父至邾仪父传四世。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邾国自有文字历史就纠结于结盟与争战之中，尤其是曾作为鲁国的附庸；并且几度处于鲁国的包围之中，发展空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所以，邾鲁之矛盾争斗贯穿着春秋之始终。王献唐考证：邾国“邻国来侵，亦时以兵戎相见，其愁结最深者，莫如鲁。”（《三邾疆域图考》）清朝学者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记载：“《春秋》内兵之伐国仅二十，而书公伐邾者六，书大夫伐邾者八，止书伐邾者一。”

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初摄位，而欲求好于邾，乃与邾仪父盟于蔑。此时邾国仍是鲁国的附庸。这一年邾国率领周天子的军队、虢国的军队讨伐卫国，请求邾国军队合击卫国。邾仪父私下邀请鲁公子豫一同伐卫，“豫请往，遂及邾人、郑人盟于翼。”（马星翼《二邾史论》）公元前718年，宋国人侵占了邾国大片土地。邾君告诉邾国国君说：“请君王攻打宋国，报仇雪恨，敝邑愿意做向导。”郑国人带领周天子的军队和邾军会合，进攻宋国，攻入了外城。此时的邾国尚有一定的实力，并依附郑国，结成了牢固的政治联盟。



《公羊传》载：公元前705年，鲁桓公攻打邾国，攻下城池，抢夺财物，并将咸丘付之一炬。前704年，鲁国再次讨伐邾国。马星翼《二邾史论》记载：公元前697年，邾人与牟人、葛人同朝鲁，以世子往，故称人。公元前695年，鲁桓公及邾子克盟于雒（今山东省泗水县一带），重申蔑地的盟约。

公元前693年，鲁国公子庆父率领军队攻打邾国的余邱。公元前690年，小邾国邾犁朝鲁。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为宋伐邾，邾国此时依附于齐国，军队也参加讨伐邾国的战争。此后邾亦附庸齐桓公，进爵称小邾子，列于诸侯间。公元前678年，邾子克卒。邾子克是为邾惠公。邾自仪父卒后，子琐立。十二年卒，子籛籛立，是为邾文公。

公元前660年，鲁僖公在榘会齐侯及邾人。同年，“鲁败邾师于偃”。公元前642年，宋襄公约会邾人共同伐齐。公元前641年，宋人同曹人、邾人会盟于曹南。鄫子前往邾地会盟，宋襄公命邾人绑架鄫子，用来祭祀睢水之神。前639年，邾人灭掉了小诸侯国须句（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南），须句之子投奔鲁国。鲁僖公借此讨伐邾国。第二年，鲁国再次攻打邾国，夺取了须句，护送须句的国君回国。《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邾人由于鲁国帮助须句的缘故出兵攻打鲁国。僖公麻痹轻敌，消极防御。“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鲁僖公根本听不进去。战于升陞，大败而归。邾军获得了僖公的头盔，挂在城门上炫耀。

公元前627年，鲁僖公伐邾，占领邾国的訾娄（今山东邹城市西南），以雪升陞之败的耻辱。秋，鲁国公子襄仲攻打邾国。

公元前620年春天，鲁文公利用晋国内乱的间隙征伐邾国，夺取了须句。公元前614年，为躲避鲁国，邾文公要史官占卜，可否将国都从邾迁到绎。史官说：“利于民不利于君。”文公听后说：“国君的使命就在于让老百姓得到好处，我个人寿命的长短，就听天由命吧！只要对老百姓有利，迁了就是最大的吉祥。”于是迁到了绎。五月邾文公薨。《春秋》中邾子称谥自文公始。

马星翼《二邾史论》载，文公元妃齐姜，生矍且，二妃晋妃，生捷菑。文公薨，

邾人立纘且而捷菑奔晋。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邾人辞曰：“贵则皆贵矣。虽然，纘且长。”赵宣子曰：“其辞顺，弗从不详。”乃还。纘且立，是为定公。”公元前600年鲁宣公取邾娄之邑根牟。公元前599年，鲁公孙归父帅师伐邾，取绎。前591年，邾国进犯鄆国，冲入鄆国宫殿杀死鄆子。公元前586年，邾人在虫牢与晋及诸侯结盟。前585年，鲁背虫牢之盟而占领邾邑郟。

公元前574年，邾定公卒。凡定公立四十年。《礼记·檀弓下》记载：“邾娄定公之时，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寡人尝学断斯狱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杀无赦。杀其人，坏其室，洿其宫而瀦焉，盖君逾月而后举爵。”这段意思说对于杀君，杀父之人，全民共讨之，不仅杀无赦，而且还要毁其房屋，用水淹没其院落。因为境内出现杀父这件事，邾定公很自责，一个多月没有举杯饮酒。

公元前573年，邾定公的儿子慝被立为君主。首要大事就是到鲁国朝拜。第二年，鲁国君主交替，邾子复朝于鲁。会晋悼公及诸侯之师，围宋彭城，伐邾。公元前569年，邾及莒人伐鄆。鲁臧孙纘救鄆，侵邾。鲁师败于狐骀。公元前567年，鲁国派遣穆叔携带礼物，到邾国访问，重修友好关系。公元前559年，邾人、小邾人与诸侯会盟于向城（今兰陵县向城镇），遂从诸侯之师伐秦。公元前556年，邾国侵入鲁国南部。

公元前555年，邾宣公卒，子悼公华立。公元前554年，晋及诸侯盟于督阳，以侵略鲁国边境的原因拘留了邾悼公。在泗水边上，重新划分邾鲁的疆界，将濊水以北的邾田划归给鲁国。公元前552年，《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邾大夫庶其以漆、间邱奔鲁。公元前545年，邾悼公朝于鲁。

公元前541年，邾悼公卒，子穿立，是为庄公。《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前529年，晋会诸侯于平邱，邾与莒同诉于晋：邾人、莒人向晋国控诉说：“鲁国经常进攻我们，国家都快要灭亡了。我国不能按时进贡财礼，是由于鲁国的缘故。”晋侯为此拒绝面见鲁昭公，并拘留了鲁国的使臣季孙意如。前524年六月，邾国国君亲自出城督促耕种，邾军趁机入侵鄆（今临沂市兰山区北）国，邾人慌忙关闭城门，为时已晚，邾将羊罗将看门人斩首。邾军随即进入鄆都，俘虏了全城的人。鄆子悔丧地说：“我也没有地方去了。”跟随他的妻子儿女到了邾国。邾国国君夫人是宋国大夫向戌的女儿。邾庄公归还了鄆君的夫人而留下了他的女儿。第二年，宋为鄆故伐邾，包围了邾国的虫邑，三月后攻克，迫使邾国放还了全部鄆国俘虏。邾人与宋人、邾人、徐人在虫邑订立了城下之盟。公元前519年，邾人在翼地筑城，完工准备从离姑返回，公孙鉏说：“鲁国将会截击我们。”商量绕道武城，沿着山路往南走。徐鉏、丘弱、茅地说：“山道一直往下，碰上雨，出不去，无法返回。”于是就取道离姑，武城人前后夹击，消灭了邾军，俘虏了徐鉏、丘弱、茅地。邾人向晋国控诉，晋国国君扣押鲁国大臣叔孙婼。晋人让叔孙婼和邾国的大夫辩明是非，叔孙婼说：“诸侯国的国卿，相当于小国的国君，本来是周朝的制度，小小的邾国还是夷人呢。有寡君所任命的副使子服回在，请让他担当这项任务。”强硬拒绝了晋君。韩宣子让邾人召集他们的人，准备把叔孙婼转交给他们。士弥牟对韩宣子说：“鲁国丧失了叔孙婼，必然灭亡邾国，邾君亡国，将要回到哪里去呢？”于是韩宣子就没有把叔孙婼交给邾国人，先让邾子回国，第二年才放还叔孙婼。

公元前517年冬，叔术的后人濫君黑肱以濫投奔鲁国，濫国终结。公元前516年，鲁昭公夺取了邾国的闾邑（今山东省汶上县西南）。

公元前507年的春天，邾庄公站在宫廷的门楼上，看见守门人抱着喝水的瓶子在庭院里洒水，邾庄公很生气。守门人说：“夷射姑曾在这转着圈小便。”邾庄公命令

把夷射姑抓起来，没抓到，恼羞成怒，自己从床上跳进火盆里，被炭火烧成残废，皮肉溃烂而死。用五辆车陪葬，用五个人殉葬。邾庄公暴躁得厉害又爱干净，所以才有了这个结果。庄公凡立三十四年而卒，同年，子隐公益立。

邾隐公即位后，修好于鲁。公元前495年，邾隐公前来鲁国朝见。邾子把玉高高地举起，面孔朝天。鲁定公谦卑地接受了玉，面孔俯就。子贡说：“用礼来看待这件事，两位国君都将要出事了。高和仰，这是骄傲的表现。低和俯，这是衰颓。骄傲接近动乱，衰颓接近疾病。鲁君王是主人，恐怕会先离去。”在这一年，鲁定公薨，邾隐公奔丧。其后，邾隐公果失国。公元前493年春季，鲁国三卿攻打邾国，准备先进攻绞地。邾国人爱惜绞地的土地，所以奉献濞东、沂西两地的田地作为交换，接受了盟约。公元前488年秋季，鲁国攻打邾国，军队到达范门，还能听到都城乐钟的声音。大夫劝谏，邾子不听。茅成子请求向吴国求援，邾子不答应，说：“鲁国敲打梆子的声音，在邾国可以听到，吴国相距二千里，没有三个月到不了，哪里能管得了我们？邾城内的兵力难道就不足够？”茅成子据茅地叛变，鲁国的军队攻进邾国国都，住在宫内，白天各处抢劫。邾国的军队退居绎山防御。鲁军夜间抢掠，活捉了邾隐公益回来，把他奉献于亳社，囚禁在负瑕。

邾国的茅夷鸿带了五匹帛四张熟牛皮自己去请求吴国救援，说：“鲁国以为晋国衰弱而吴国遥远，倚仗着他们人多，而背弃了和君王订立的盟约，看不起君王的执事，来欺凌我们小国。邾国不敢自己爱惜，惧怕的是君王的威信不能建立。四方的诸侯还用什麼来事奉君王？而且鲁国拥有战车八百辆是君王的手，邾国战车六百辆却是君王的部属。把部属去送给对手，请君考虑一下！”吴王听从了茅夷鸿的建议。公元前487年，吴为邾故伐鲁，克武城，次于泗上，取盟而还。《左传》载：“齐侯使如吴请师，将以伐我，乃归邾子。邾子又无道，吴子使大宰子余讨之，囚诸楼台，柝之以棘。使诸大夫奉太子革以为政。”

邾子革，是为桓公。桓公立七年，越人送邾隐公归国，邾桓公逃奔越国。公元前471年，邾子益归国旧习不改，越人执之，而立公子何。何无谥，何立之年，距邾隐公立之始三十六年矣，其后隐公乃卒于越。

马星翼《二邾史论》考证：自邾仪父至隐公益，八世皆可谱。隐公之曾孙考公，是为邾娄考公。自考公下至战国时，世次莫纪，而邾后为邹云。

《春秋·僖公七年》首现“小邾子来朝”，其小邾子为邾犁来。公元前566年鲁襄公七年“小邾子复朝鲁”，此为小邾穆公。小邾穆公之时，多次参与了晋、楚等国的盟会。公元前525年，小邾穆公再次朝鲁，鲁昭公设宴款待。席间，鲁国大夫季平子赋《采芣》诗，小邾穆公赋《菁菁者莪》以和对。昭公说：“假若没有治理国家的人才，国家能长久吗？”小邾穆公凡三朝鲁。自始朝至此，相距三十有一年。小邾君首任邾友，其四五世至邾犁来，始称小邾子，其后为小邾穆公，名讳不清。有邾甲者，为小邾穆公子。其后世次莫纪。

公元前491年，宋人执小邾子而告于同盟曰：“小邾子无道于民。”此处小邾子不知是哪路神仙。前481年，小邾国的射献上句绎逃亡到鲁国来，说：“派季路和我约定，可以不用盟誓了。”派子路去，子路推辞。季康子派冉有对子路说：“一千辆战车的国家，不相信盟誓，反而相信您的话，您有什么屈辱呢？”子路回答说：“鲁国因为此事和小邾国发生战争，我不敢询问原因曲直，战死在城下就行了。他不尽臣道，帮助他实现诺言，作为正义之举，我不能办。”邾国还有小邾惠公，小邾穆公之孙也。在春秋后六世而被楚灭掉。

邾自春秋进入战国称邹，邹为邾娄之转音，与邾互为通假。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孟子就是邹国人，《孟子》之中保存有孟子与邹穆公的一段对话：“邹国与鲁国交战。

邹穆公问孟子：‘我的官员死了三十三人，而百姓没有一个肯为长官效死的。杀了他们吧，无法杀尽；不杀吧，又痛恨他们见死不救，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道：‘灾荒来临，您的百姓，年迈体弱的辗转饿死在荒山沟里；壮年人流落四方，几千人。然而国君您的粮仓里粮食满满的，库房里财物足足的，官吏不把真实情况报告，这就是对上怠慢国君，对下残害百姓啊。’曾子评价说：‘警惕啊，警惕啊！你做出的事，后果会反加到你身上。’”对话的邹穆公就是战国时邹国的君主，而邹穆公与邾隐公益之间的世系，有待考古发现。

邹穆公这个人是儒家学说中的理想人物，贾谊《新书》记载：“楚王欲淫邹君”，于是送给了邹穆公四个歌伎美女，邹穆公早上观看表演，晚上便停止欣赏，因为他的妻子刚刚离世。当时邹穆公车衣不用毛皮、布帛，马匹不吃青苗、粮食，没有过分乖僻的爱好，没有骄纵肆意的行为。吃饭一个菜，穿衣不讲求。严以律己，亲近贤明，视民如子。“邹国之治，路不拾遗。臣下顺从若手之投心。”邹国虽然弱小，鲁国、卫国不敢轻视，齐国、楚国不能胁迫。“邹穆公卒，邹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邻于邹者，敏向方而道哭，抱手而忧行。酤家不售其酒，屠者罢列而归。傲童不讴歌，春筑者不相杵。妇女扶珠璜，丈夫释玦珥，琴瑟无音，期月而后始复。故爱出者爱入，福往者福来。”

战国中期，邾国走向衰落。《史记》载：“齐湣王时，灭宋，欲并周室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于齐。”《战国策·赵策》另有载：齐湣王“将之薛，假道途于邹。当时是邹君死，闵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将倍（背）殡柩，设北面于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邹之群臣曰：“必如此，吾将伏剑而死。”故不敢入于邹。”即使此时邹人仍守礼如此。

《世本·氏姓篇》言：“朱氏本自高阳后，周封于邾，为楚所灭。”杜预《春秋释例·世族谱》中称邾“春秋后八世而楚灭之”。晋《太康地记》称“楚灭邾，迁其人于江南（古人称淮水以南为江南），因名县也。”（见《史记·高祖本纪》司马贞索隐引）《续汉志·邾县》条梁人刘昭注引晋人王隐的《晋书·地道记》曰：“楚灭邾徙其君此城”。马星翼《二邾史论》引据《路史》说：“邾为楚所并，封其君为钜鹿侯，迁之江夏，江夏故有邾城。”此城在今湖北黄冈地区。或为原弦国都城。

《路史·后记》云：“小朱十四世而朱二十有九世灭于楚。”王献唐考证：“滥亡最早，小邾次之，邾最晚。《路史》载称邾传二十九世，七百余载，亦列国中享国久长者。公羊徐疏‘公羊以为邾娄本大国。’滥与小邾，疆域宇未广，若合三国计之，以仅次于齐鲁。（《春秋邾分三国考》）”

刘墉祖籍日照考

夏勇



刘墉画像

在编修《东港区志》过程中，发现了一份明代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记述清代刘墉的日照始祖的族谱，激起笔者浓厚兴趣。

刘墉是中国历史上著名廉吏之一，同时刘氏家族在“康乾盛世”，以刘统勋、刘墉、刘鐔之祖孙三公二宰相，轰动朝野，成为中国文坛文学创作百用不厌的历史题材，如《天下粮仓》《刘公案》《宰相刘罗锅》《和珅挨打》《江南围》等众多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刘墉与日照的关系，查阅清代《日照县志》、建国后的《日照市志》等史料，皆无有关记载。笔者深深感到，这既是一项历史空白，又是今天东港区、乃至日照市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不可多得的一大人文资源，有着可开发利用的巨大价值。

为此，笔者通过实地调查，寻根溯源，走访了诸城、高密、潍坊、临沂等地村镇的刘氏后裔德高望重的长者，拜访了大学、博物馆的有关专家教授，广泛搜集了明、清两代史料，经初步整理，草成此文，以飨读者。

一、始迁日照

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年）为巩固初建的大明江山，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在明初有组织地组织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活动。

明代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和自然原因。

宋金、宋元及金元之间的战争，造成人口大量流亡。一方面使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另一方面，战争不断、大的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加之游牧民族重牧轻农政策，使北方许多地区荒无人烟。

元末明初的连年战争，先是明军与元军殊死的搏斗、后是燕王朱棣与建文帝残酷的争夺皇位的“靖难之变”，加之大规模的兵灾期间，天灾连年不断。水灾、蝗灾、旱灾轮流发作……广阔的山东、河南、河北等北方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烟稀少、虎豹出没、土地荒芜，甚至沦为“无人区”，军民粮食短缺，财政收入剧减。

而在南方，宋元以来的地主豪富势力日盛，左右地方官吏，威胁朝廷；在沿海，倭寇在从辽、山东到福建、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屡犯海疆，登岸剽掠；在漠北，新建王朝在元残余势力包围中，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

面对内忧外患，朱元璋采纳了知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建议，采取了移民和军、民屯田的政策，以加强北部边防，开垦荒地，保障军民用粮，恢复农业生产。

朝廷数次颁布了迁徙贫民流民垦荒、“迁大户实畿辅”、屯田戍边的诏命，让数百万人告别了山西洪洞大槐树、告别富庶的鱼米之乡苏杭、沿海……地少人多的“狭乡”居民徙迁往地多人少的“宽乡”——北方地区、淮河流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人口大迁移。

山东的众多镇村就形成于这一时期，众多居民从晋、浙、苏、豫、皖（南直隶）等地迁入。

江南直隶南京徐州府砀山县大刘村（今属安徽）居民刘思源众族人（按年代推算应为祖、高祖辈，以刘思源为始祖的原因见下文），遵奉朝廷诏命，于洪武三年（1370年）踏上了北向移民之路。

刘氏众族人一行循道迤邐北去，来到群山巍峨的甲子山西北十公里、今日照市东港区黄墩镇与莒县交界处，打量了一下这里的地形地貌。只见这里群山环绕，涧水涓流，花草茂密，树木繁荫。涧泉边参天古树上，住着一窝喜鹊；涧边山岭，两翼宽阔，北高南低，象一只传说中的凤凰……果真是个好地方，于是便在这儿定居下来。后人为这里取名喜鹊窝，后因祖居失火，住宅西移，改称草涧。

这就是日照西部刘姓的始祖。

大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日照刘氏家谱（注：2003年在日照市东港区三庄镇卜落崮村刘禄后人处发现），记载了这一历史情况，记下了这一刘氏家族的大事：

“我刘氏自汉隶籍于莒，由来久矣……委因元社将屋，我祖见机，迁居徐州府砀山县大刘家村。红巾（徐刘）乱起，我祖逃居东海当芦村。至熙朝洪武三年，下旨迁民，我祖复由东海迁居日照喜鹊窝”。

民国十三年（1924年）的一幢石碑记载：“我刘氏原籍江南徐州砀山大刘家村，

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始祖思源公迁日照草涧庄。生我二世祖福、禄、寿、禧、诗、书、忠、厚兄弟八人。”

二、兄弟分离

时间到了明天顺年间（1457—1465年），刘家人丁日盛。家里一场意外火灾，几乎烧掉了一切。面对这场意外，刘思源决定让儿子们先分开，四处谋求生路，只留四子刘僖与刘思源留守故里。

明谱记载：“天顺年间，该村（注：日照喜鹊窝）被火……成化年间（宪宗1465—1488年），我高祖（注：从日照喜鹊窝）移居草涧庄（与喜鹊窝相距里许），生福、禄、寿、喜、诗、书、忠、厚兄弟八人。余与弟君质修谱，断以思源为始祖，以福、禄诸祖为二世焉。虽然，惟喜祖仍住故里。如福、禄二祖，同迁大刘家沟。福祖又避匪，率三子恒公迁居诸诚逢哥庄，将长子志干、次子志贞托付于我二世祖禄。寿祖分居刘家庄子。诗祖分居洙洲庄。书祖分居西刘家沟。忠祖迁居兰山全刘庄。厚祖迁居沂水刘家店，分支卜全庄。”

碑刻记载：“福、禄二公同迁刘家沟（今三庄镇刘家沟），福公弘治年间（孝宗1488—1505年）又迁诸城逢哥庄（现属高密市）。寿公迁刘家庄（今三庄镇刘家庄）、诗公迁洙州（今黄墩大株州）、书公迁莒县、忠公迁临沂、厚公迁沂水，族谱备志。惟我禧祖仍住故里。”

经过几百余年的子孙繁衍，到现在，故里刘喜后人已是人丁兴旺，有3000多人的大家族了。

刘福后人，清嘉庆十九年（1814），即九世孙刘墉卒后10年其族重修家谱时，女性及移居外省、外地未入谱者不计在内，刘氏家族已繁衍14代，其家族已有822人。

这是后话。

明谱的发现，不仅重现了世远年湮于史海的一段家族史、民族史，而且填补了刘统勋初立其诸城族谱时无法上溯的一段历史。

刘统勋在丙子年（高宗乾隆1751年），即其祖刘福迁移到诸城县250余年始创家谱，在凡例中说：

——吾家自前明弘治年间始祖讳福公迁诸城后，至祖讳恒公，家谱因遭兵燹，中间世次莫考。故列祖讳恒公为第二世。

——族谱刊于都中，丙子冬间，凡我族人游宦他省及在家乡者，其新生男口名字家邮未及致，盖不谱载。……盖未及载，容后纪——统勋谨识。

三、海岱门第

逢哥庄地处袤阔的胶莱平原上，土地肥沃，明属青州府诸城县。刘福来到这里，先是为人为耕种收割的帮工，人勤快，吃苦耐劳，赢得主家的喜欢，并被主家留下，定居下来。经过几代人的创业，家境从贫穷渐至小康。传到第五代，即刘墉的高祖父刘通，已考中了秀才。第六代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已考中了进士，当上了户部广西员外郎，是刘氏在外任职的第一任高官。到刘墉的祖父刘荣，已官至四川布政使，刘荣二哥刘果官至江南学政。父亲刘统勋，官东阁大学士，四库全书总裁。刘墉父辈中、同辈、子孙辈为官者就更多了。

清代嘉庆十九年（1814年）刘家重修家谱时统计：从刘福五世孙刘通科举考得秀才算起，全家先后科考得中198人，其中进士11位，举人35位。科考取中者，约占其

家族男丁比例的1/4；考取进士、举人者又占科考人数的1/4还多。

在官位上，自清顺治初年六世孙刘必显步入仕途算起，至道光末止的六个朝代中，七品以上的官员就出了73位，接近家族男丁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出任的官职，从知县、知府、道台、学政、布政使、巡抚、总督、御史、尚书直至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各个级别的重要官职都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到了第八代上，竟一门出了“文正”公刘统勋、“文清”公刘墉、“文恭”公刘鏞之，祖孙三公二宰相，轰动当朝上下。成为书香门第，名门望族。

在刘墉以优异成绩殿试结束后，乾隆皇帝欣然御赐“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予以鼓励。（海岱：大海到岱岳，指当时青州府所辖地域）。

四、恪守家训

是什么力量造就了刘福后人的“海岱高门第”？

这要从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说起。

刘必显，字微之，号西水，为刘家第一个进士。生于明万历廿八年（1600年），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中举，清顺治九年（1652年）中进士，卒于清康熙卅一年（1692年），享年92岁。他的官位不算显赫，仅做到员外郎，但他为官清廉，正直有胆识。他晚年对后人立下家训：“当官清廉，积德行善，官显莫夸，不立碑传，勤俭持家，丧事从简”。他为后世晚辈的成才建立了规范。

他十分崇尚教育。他认为：“教家之道，千条万绪，非言语文字能罄述。然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教子之方，莫要于读书。必能读书乃能明理，能明理始能成器，始能保家，至进取成名。登科、发甲，固视乎命运。然其家三世读书而发始达者十居八九；若先世目不识丁，而其身崛起田间，至登甲、乙榜者，百中仅一二焉。俗语所以有‘书读三世发’之言也。”

良好的家教，使刘氏子孙不依赖父辈，树立了较强的自尊心和进取心，一个个成为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这使刘统勋、刘墉父子能先后被皇帝钦点任《四库全书》总裁、副总裁，统领4300多人，编纂经、史、子、集一万二千四十六种，把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典籍，几乎包揽殆尽。

刘必显归里后，常住槎河山庄（今属五莲县，刘家槎河一带）。刘统勋兄弟们、刘统勋、刘墉父子多在此读书用功过。爱屋及乌，他们对这个杜鹃花盛开、“月明星影窥窗际，夜静溪声到枕时”，给他们人生打下良好基础的地方，感念至深。曾请当朝名家绘制了《槎河山庄图》，并请纪晓岚等众多名流题写咏吟诗篇，极一时之盛。

“清廉做官”，子孙们恪守了这一家训。

刘必显有四个儿子：长子刘楨，次子刘果，三子刘桀、四子刘棐。

刘楨字世卿，号石斋，贡生，考授从六品。

次子刘果，字毅卿，号木斋，顺治十一年（1654年）中举，康熙三年（1664年）中进士，第六年授山西太原府推官。康熙六年改补直隶河间县知县。康熙八年为刑部江南司主事。康熙十二年升四川司员外郎。康熙十八年升江南提学道。

三子刘桀（1657—1718年，刘统勋之父），字弢子，号青岑。康熙十四年（1665年）十八岁中举，十年后中进士。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任湖南长沙县知县。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擢陕西西宁羌州知州。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升宁夏中路同知。后补湖南长沙府同知。康熙四十九年任天津道副使。一次在天津迎驾时，诏许从官恭瞻。因奏其兄刘果在河间县任知县时受到“清廉爱民”褒奖的事，并顺便请求康熙皇帝赐书。康熙帝十分高兴地赐写了“清爱堂”三个字。从此，御赐“清爱堂”便

成为了刘墉家族的堂号。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九卿应诏举廉能吏员，以知府被举者，唯刘焯与陈鹏年二人。《清代名人传略》称其为“是当时以清廉闻名的几位官员之一，声望与陈鹏年同等”。

刘统勋（1698—1773年），他自清雍正二年（1724年）中进士，入仕途。他“服官50年，家原有田数十亩，茅舍一处，未增尺寸。及卒，乾隆皇帝悲痛异常，当日亲临祭奠，晋赠太傅衔，赐祭葬，入祀贤良祠，谥文正。柩归故里前，诏令沿途20里以内的文武官员，均至灵前吊祭”。

他一生虽然位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显官要职，是乾隆朝最受乾隆器重的重臣之一；是清朝最有建树的几位水利名臣之一，做了许多大事，可他没有给后人留下富足的家产，家里没盖楼堂瓦舍的阁老府，门前和祠堂里没有炫耀官显的旗杆，莹里没有歌功颂德的石碑，就连当时皇帝御赐他祖莹的蟠龙石碑也没有树起来。这都是尊其祖父家训办的，他只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清官的美名流传至今。

刘墉，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能够听到历史脚步前行之声的家庭里。

在刘墉谢世后，清礼亲王昭槤在《啸亭杂录》一书中尚有这样一段追忆文字：

“刘文清公墉为文正之子，少时知江宁，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以一介知府，而获全国声誉，甚至以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包公来比拟他的正直、清廉，可以想见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该是怎样励精图治、兴利除弊，又该是以怎样的高明手法与南京这一数朝古都内的大户贵戚们做斗争，才赢得了这一声誉的（史有详细记载）。以致后人妇孺皆知的《江南围》《刘墉私访》《刘公案》等相声、戏剧。目睹王公大臣、豪门权贵竞相夸侈，炫耀富贵的厚葬之风愈燃愈烈时，刘必显不为时风所动，为子孙订下遗训：“凡我儿孙不必厚葬”。

刘必显让刘氏子孙们把一笔笔“财富”留给了老百姓，留给了清王朝。

也同时使刘氏子孙们“独善其身”，走出了在同时代与和珅等人命运不同的从政之道。



沂水“孟母故里”考（上）

刘海洲

每一位母亲都是伟大的，而全人类最伟大的母亲，当首推孟子之母。孟母以“择邻教子”和“断杼喻学”的事迹被誉为中华三大名母之首。“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孟母教子的故事最早出现在汉代刘向的《列女传》里。《旧唐书》载：“天宝七年五月，诏历代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建立祠堂，岁时致祭。”其中“孝妇七人，邹孟轲母居其五”。元、明、清历代都对孟母进行加封。可是，孟母姓什么，故乡在哪里，因为《孟子》《史记》等早期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在孟母去世后的2000多年间一直是个迷。宋代纂修的《孟子世族谱》只说孟母姓仇，未提籍贯。明清以来孟母故里是山东邹县凫村的说法开始流行起来，并逐渐成为“定论”。但是最近几年来，山西省又认定太谷县范村镇仇里村为孟母故里。

孟母的墓地在哪里？在孟母仇氏去世后的2000多年里，同样因不见史书记



载而一直是个谜。宋代景祐年间孔道辅担任兖州知府后，因孟子的社会地位逐渐高于孔子的几个高徒，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孔道辅决定在他治域内的邹县寻找孟子墓，于是在邹县城东的四基山下找到了孟子墓。邹县孟母墓被“确认”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肯定是在寻找到孟子墓之后。现在孟母墓前最早的石碑是元朝元贞二年（1296年）刻立的。

当邹县的孟母墓变成了庞大的“孟母林”；当孟母故里被认定是邹县凫村，后来又有人认为是山西太谷县仇里村时，山东省沂水县就一直存在着一座孟母墓和墓前一座孟母祠，还存在着一个传说是孟母出生地的仇林村。孟母墓、祠边上的村庄是明初由赵姓立村的，却以“孟母”作为自己的村名。孟母墓与仇林村相距只有4公里。

孟母墓尽管在沂水县存在了2000余年，但因地处偏僻，孟子后裔也不集中在此间居住，虽然历代沂水县衙对孟母祠修葺不废，但此处孟母墓一直没有得到朝廷及州府的重视，这就是外界对孟母故里、孟母祠、孟母墓存在于沂水县的事实知之甚少的原因。

沂水县“孟母故里”碑

沂水城门外曾立有一通巨大石碑，上面镌刻着四个大字“孟母故里”。但何朝何年所立已经难以考证了。因为外城墙在抗战前后多次拆、建，致使石碑消失了。沂水县已故文史专家和考古学者马玺伦先生，曾在上世纪70年代详细探访过城南门旁这两通石碑的下落，他曾在城南茶庵街等采访过几十位长者，这些长者都亲眼目睹过石碑，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这两通石碑的去向。《沂蒙大观》在“孟母墓”一节有这样的记载：“沂水城师范旧址也有一碑，上书‘孟母故里’，后毁于战乱。”“师范旧址”就在外城南大门外，茶庵街西侧。

“孟母故里”碑的存在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因为孟母仇氏出生在沂水县杨庄镇南。

沂水县很多年来从未有仇姓人口，却有两个以仇姓命名的村庄——南仇林、北仇林。南、北仇林都在杨庄镇，南北相距约15公里。因为本地没有仇姓人家，很多人不认识这个字。“仇”在古代是“掌”的古字，但后来只作为一个姓氏使用。由此可知，沂水县南、北仇林，原来是以姓氏命名的村名是确定无疑的。仇林村（南）原来是一个仇氏人家居住过的古老村落，后来一部分仇姓分到北边建立新的居住点，也叫仇林，为了区别两个村庄，于是后来才有了南仇林、北仇林。

南仇林（原仇林村）何时仇姓人家居住？何时迁走或者灭绝？除了后来迁居到此地的陈姓人家至今保留着一些传说外，现在已找不到任何可以解开谜团的史料和证据。

笔者曾多次去过南仇林村，采访过多位村中老人。据村民陈学文（生于1936年）、陈顺廷（生于1942年）等老人说：他们陈氏祖祖辈辈流传下来一个说法是，仇林村原来不仅是仇姓人家居住过的村庄，而且是孟母仇氏的出生地。他们陈氏祖先迁居此地时，这里只存留一些旧宅基的遗迹，已经没有人家居住好多年了。但是周边村庄的人们都知道，这里原来是孟母仇氏的出生地，村落存在了千余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在什么时间仇姓人家不在了。虽然村落没有了，但仇姓人家在村边栽下的柏树和仇姓人家的坟墓还存在着，于是新迁来居住的陈姓祖先出于崇敬先贤的原因，在此建立自己的新村落时，仍然以原居民的姓氏“仇”来作为自己的新村名。

从南仇林周边党家山、上儒林、下儒林等村名所包含的信息来看，在此居住过的仇姓族群就是孟母的族群。仇林西南方向五里远有村叫党家山，党家山的党姓人家

是明代初期大移民时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仇姓源于党姓，两姓同源，在过去宗法制度为社会基础的时代，同姓同宗的关系非常重要。党姓人口也很少，因而完全可以认定：当年党姓迁来时是奔着这里的仇姓而来的。在南仇林的东边十多里的金华山上，有一处古老的寺院，叫“儒林寺”。“儒”是指儒学或读书人，这一带历史上没有出过重要的学者，“儒林寺”应该是缘于此寺建在孟母的家乡亦即孟子的出生地附近而得名，后来先后有两个村庄在儒林寺西侧建立，遂以寺名为村名——有了上儒林村、下儒林村。

郑宏峰、张红著《中华姓氏》载：“仇姓源出于党姓，原为春秋时鲁国大夫党氏之后裔。孟子的母亲即为仇氏，以择邻教子闻名。山东省沂水县杨庄镇党家山村距孟母村八里之遥，党家山村的东面六里处为仇林村。”南仇林村与孟母村仅仅相隔约8华里的距离，同属杨庄镇。孟母村（原来叫“孟屋庄”，清代中晚期改名“孟母庄”）的得名，是因为在村前沭河之畔，有一座庞大的孟母墓，还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孟母祠。南仇林是孟母的出生地，北边不远处的孟母村又有孟母的墓、祠，这绝不是简单的“巧合”。

历史的真相应是这样的：孟母仇氏出生在沂水县的南仇林。春秋时期今沂水县属鲁国的东部疆域，仇林村距离鲁国的东郛邑（遗址在今高桥镇徐家荣仁村）仅仅5华里之遥。当时孟子的父亲在为鲁国东郛戍边时认识了孟母仇氏，并在郛邑结婚生子。孟子幼年时，孟父战死或离家出走，孟母仇氏带着孟子一直在自己的家乡一带迁徙流浪（笔者认为，孟母三迁一是为改善孟子的教育环境，二为生活贫困所迫）。孟母在齐国去世后，孟子将母亲葬于娘家附近。因为孟子没有将母亲归葬于父籍邹国，而是葬于母籍所在地的鲁国东郛，这就是《孟子》特别记载为“葬于鲁，返于齐，止于嬴”的原因。如果孟子将母亲葬于父亲老家的话，应说“葬于邹”而不应说“葬于鲁”的。

春秋时期的鲁国两个郛邑，一个在今菏泽市郛城县，至今还保存使用这个“郛”字，这是鲁国西郛邑；另一个是在今沂水县高桥镇徐家荣仁一带，称之东郛。东郛西汉时期是东莞县的县治所在。郛邑所在的徐家荣仁村在南仇林村之西，两村只隔着一条沭河，相距不过3公里！



朱 瑞

本 编



毛泽东与朱瑞

朱瑞（1905—1948），江苏省宿迁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广东大学。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1939年5月，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徐向前赴山东统一指挥中共在山东和冀鲁边、苏北、皖北的部队。同年10月兼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1943年9月，奉命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1946年10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1948年10月1日，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战斗中牺牲。



1943年春，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左二）、委员陈光（左三）、黎玉（右一）与滨海区党委书记符竹庭在滨海区合影。右二为陈光爱人史瑞楚。



1939年4月2日，北方局战友送别朱瑞（左一）、陈若克（左二）。



朱瑞与爱人陈若克



朱瑞与妻子潘彩琴

虎头崖

王相理

蒙山的北麓有一座造型奇特的崮，位于蒙阴县城西南联城镇城子村附近，状如虎啸，老百姓称之为“虎头崖”，清代《蒙阴县志》称之为“叟崮”，其名被列入《辞海》，可见其崮名头不小。

虎头崖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方是虎头，高数十丈，西南是虎尾，中间是虎腰。俗语称：虎头崖，万丈高，十二联城紧挨着。十二联城，指的是虎头崖周边十二个村，有类家城子、禹家城子、宋家城子等。

虎头崖，听名字就知道山头的样子像老虎的头，但是“叟崮”这个名字就颇有些莫名其妙，莫不是从侧面看上去虎头崖的样子又像老头？

虎头崖下有古颛臾国遗址，传有颛臾庙。《论语》载：季氏将伐颛臾。





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据历史学家考证，蒙阴城北的司马寨曾是祭泰山的地方，那么虎头崖呢？想必是颛臾国王祭祀蒙山的地方。颛臾国被灭之后，颛臾王的后人四散逃奔，余下的百姓在虎头崖下周边生存下来，为了纪念颛臾王，就建了颛臾庙。蒙阴县志记载，此庙清朝时尚存。据说遗址在古老的黄连树旁边。我怀疑“叟崖”原本是“臾崖”，是古人在传抄历史文字的时候弄错了，又以讹传讹流传了下来。虎头崖使我想起秦朝大将蒙恬，蒙恬被誉为“中华第一勇士”，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功高盖世。蒙恬和他的弟弟蒙毅都是秦始皇时代的社稷重臣，蒙恬的爷爷蒙骜，蒙恬的父亲蒙武，他们家祖上就生活在蒙山下，以蒙山为氏。蒙骜、蒙武、蒙恬，三代忠臣，皆是战无不胜的虎将，为秦始皇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虎头崖其实应该叫虎头崖。虎头崖与青龙山隔河相对。两山之间，一条公路蜿蜒而过。向西通往平邑县城，向东到达蒙阴县城。虎头崖位于蒙山下，距离泰山也不算远，但奇怪的是山石的地质既不同于蒙山石，也不同于泰山石。既不是石灰岩，也不是砂页岩，全部是麦饭石！麦饭石属火山岩类，其主要矿物质是火山岩。据科学家研究，麦饭石是一种天然的硅酸盐矿物，学名石英二长岩。麦饭石是对生物无毒、无害并具有一定生物活性的复合矿物或药用岩石。麦饭石的主要化学成分是无机的硅铝酸盐。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麦饭石可入中药，著名医学家李时珍曾对此有专门论述。现在，当地有多家麦饭石加工厂，主要制做成麦饭石饮水机、麦饭石茶具、麦饭石碗、麦饭石锅等一系列产品。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还会生产出更多关于麦饭石的更多产品，丰富人们的生活用品。

虎头崖上松树颇多，因此野生的蘑菇也就很多，每当雨后，上虎头崖上拾蘑菇的人就特别多。虎头崖的西面，就是著名的钻石公园。

钱谦益《费县道中》赏析 (二)

平凡

钱谦益的七言律诗《费县道中》其二是一首写景诗，描写费县县城周边的景色。

费县城边紫翠重，恰凭登顿看山容。
云舒雾縠浮千嶂，雨濯烟绡出数峰。
石瀨咽沙流浅浅，野花眠草吐茸茸。
停车伫想东蒙客，欲讨莼羹兴已慵。

钱谦益从常熟前往北京，走的应该是驿道。沂州原来没有驿道，明代天启末年才加开驿道，在沂州境内有蒙山前路和蒙山后路两条驿道。途经费县的这条驿道是蒙山前路，从兰山县进入费县，由探沂向西到岩坡庄，过凤山桥下北，经过季家疃、任和庄、万良庄，在玉贵庄村西的小花山后面过温凉河，经崮子、演马庄、埠南湖，在桥庄过浚河，经古城、上冶、荆埠、柏林、保泰、仲村，奔泗水、曲阜方向。

“费县城边紫翠重”，说明钱谦益并没有进入费县县城，而是在城外，估计是站在县城东北部、崮子村南面的神山（《光绪费县志》作“神女山”）东麓，远远眺望县城及其周边的山光水色。

紫翠：山色。是紫色与青绿色混合而成的颜色，多见于日光较弱的清晨时分，或者阴云密布的天气。唐代王翰《蛾眉怨》诗有“琳琅禁闼遥相忆，紫翠岩房昼不开”，宋代杨万里《赣守张子智舍人寄诗送酒，和韵谢之》诗有“诗来风雨荒凉后，语带江山紫翠横”，曾巩《甘露寺多景楼》诗有“云乱水光浮紫翠，天含山气入青红”。费县城三面有山，南面是文山，东面是肖山，北面是钟罗山，只有西面是狭长的开阔地带。

“恰凭登顿看山容”：登顿：上山、下山。唐代孟浩然《行出东山望汉川》诗有“征马疲登顿，归帆爱渺茫”，杜甫《郑典设自施州归》诗有“攀援悬根木，登顿入天石”。

“云舒雾縠浮千嶂”：云彩舒展开来，雾茫茫的水面浮现出层层山峦。雾縠：轻细的云雾。《汉书·礼乐志》：“侧雾縠。”唐颜师古注：“言其轻细若云雾。”

“雨濯烟绡出数峰”：雨水洗刷之后，绸缎般的天空崭露出几座山峰。绡，生丝织成的薄绸。唐代白居易《琵琶行》有“一曲红绡不知数”。宋代陆游《钗头凤》有“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挹鲛绡透”。诗中的“数



峰”，大概是指城南的文山、方山等较高的山峰。

“石濑咽沙流浅浅”：水为石激形成的急流，冲刷着细沙，发出溅溅声响。《楚辞·九歌·湘君》：“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王逸补注：“濑，湍。”浅浅（读音jiànjiàn）。马茂元《楚辞选》注：“‘浅’，古音笈。‘浅浅’，水流疾貌。”《木兰诗》有“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诗中描写的是固子村前的温凉河，就是今天的新时代药业公司西部的那一段河流。

“野花眠草吐茸茸”：野花悠闲地睡在草丛里，小草吐出毛茸茸的细芽。野花：野生的不知名的花。宋代赵蕃《野花》诗有“野花吐芳不择地，幽草吹馥宁只春。兹日纵为无事日，此身不是自由身。”茸茸：草又软又密的样子。《说文》：“茸，草茸茸貌。”宋代秦观《忆秦娥》有“茸茸细草承香车，金鞍玉勒争年华”，张炎《清平乐·平原放马》有“茸茸春草天涯，涓涓野水晴沙”。

“停车伫想东蒙客，欲讨菹羹兴已慵”：东蒙客：指杜甫。唐代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诗有“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也泛指隐士。晋皇甫谧《高士传·老莱子》：“老莱子者，楚人也。当时世乱，逃世，耕于蒙山之阳……饮水食菽，垦山播种。”后因以“东蒙客”指隐士。唐代高适《送郭处士往莱芜兼寄荀山人》诗：“君为东蒙客，往来东蒙畔。云卧临峰阳，山行穷日观。”

菹羹：用菹菜蒸制或煮制而成的糊状食物。此处是借用杜甫《与李白同寻范十隐居》诗的后面两句：“向来吟桔颂，谁欲讨菹羹？”《晋书·张翰传》记载：“齐王冏辟为大司马东曹掾，……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菹菜、菹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张翰（字季鹰）是吴中人，在洛阳见秋风起，思念家乡的菹菜菹羹鲈鱼脍，说：人生重要的是投合自己的心意，怎能被官位系缚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地方追求虚名地位呢？于是弃官回家。张季鹰因为思念家乡吴地的菹菜羹和鲈鱼脍，连官都不愿做了。

钱谦益家乡常熟，也属吴地，想必也喜欢吃菹菜菹羹鲈鱼脍，但是他说“停车伫想东蒙客，欲讨菹羹兴已慵”，表示自己渴望归隐，连家乡的菹羹都懒得去想了。意境比张季鹰更进了一步。

钱谦益的这首诗，首联是破题，颔联是远眺，腹联是近观，尾联是感叹。全篇看似写景，实则借景抒情，通过景物描写抒发内心的苦闷，而又含蓄蕴藉，属于典型的“温柔敦厚”诗风。

清代的山东东路驿道及十二邮驿

赵建国 田 忠

山东地理位置自古重要，与外界交流频繁，是历代封建王朝南北交流的必经之地。山东的交通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期就辟有各种驿道。到了明代，山东的驿道传递事业就已经很发达了。不过，自南北朝以来，由济南经兖州、徐州通向江南的驿道（史称“山东中路”）屡遭黄河水患而中断，特别是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在河南原阳决口，进入山东现在的东明、菏泽，在梁山、东平一带分为南北两条河道，南面河道流经嘉祥、鱼台过徐州入淮，形成大片汪洋。现在徐州一带尚有黄河古河道遗存。黄河决



古驿站

口，不仅洪流奔涌冲毁朝廷命脉的驿道，而且带来的大量泥沙沉淀，对南北交通发挥重要作用的大运河造成淤积，形成“中梗塞”。据明史学家讲，明朝的灭亡，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这种“中梗塞”造成的困境，南方各省的钱粮不能及时运到北京充实国库，最高领导机关的政令军令不能及时地传达到南方各省，致使朱明王朝统治的疲软和废弛。

清王朝建立之初，吸取历史教训，十分重视南北驿道的使用和畅通。面对黄河屡次决口水患，由豫省督抚提议，朝廷决定开辟山东东路驿道，亦称京福官路山东段，以避开兖、徐间这个黄河水患横行无忌的地区。这条驿道的起点是由现在的泰安，经新泰、蒙阴、沂南、兰山、罗庄、郯城出山东境，全长260公里，与现在的京沪高速公路以及205国道新泰到郯城段平行。

这条驿道通过的地区是从北京到长江北岸惟一的山区，山东最大的两座山峰泰山和蒙山盘踞在这一带。据《新泰县志》记载：这一地区“在元明时，僻处山径，非孔道也，原无驿路。”因为手头资料所限，我们无法得知修建这条驿路时艰苦的情形和宏大的场面。但是，清顺治十年，即清王朝建立的十年内，这条驿道就全部贯通了，“以东南全闽、两浙、吴会、淮扬诸路至京由泰沂为捷”，“凡輶轩之使，谟猷之告，以及文檄饷课，轮蹄绎络，咸取道焉”。车粼粼，马萧萧，山乡水廊酒旗风的繁华场景扑面而来。清朝皇帝多次南巡时，走的应该就是这一条道路。

按照古代定制，道路上设置驿站是有一定要求的，山东东路一共设置了十二座邮驿，下面是它们的基本情况。

泰安县驿：山东中路济南以南第二个邮驿，自元明时代沿袭下来，无考。

崔家庄驿：道光八年《泰安县志》记载：“雍正四年添设崔家庄驿，马七十匹，马夫六十五名，白夫一百名。”

羊流店驿：光绪十七年《新泰县志》记载：“羊流驿东距（新泰县）城驿六十里，西至泰安崔家庄驿五十里，马六十匹，马夫三十名。乾隆二十四年，奉文裁去马十四，夫五名。”

新泰县驿：同上，“又以羊流至蒙阴一百二十里，山径行险，马力不支，遂添设本县驿”。可知新泰县驿的添置应该是在顺治十年这条驿道开通之后。

蒙阴驿：见上。

垛庄驿：道光七年《沂水县志》记载：“垛庄驿，东北至县（指沂水县城，与本驿道无关）一百四十里，南至徐公店七十里，走递马六十匹，马夫三十名，康熙十二年沂州知府邵士详准垛庄设驿而长途马困之苦始少（苏）。”

青驼驿：康熙十二年《沂州志》记载：“康熙二年设青驼驿，十二年移至徐公店。”根据实际使用的情况来看，青驼驿应该是这条道路建成后首批使用的驿站，顺治十年与康熙二年只相差五年，时间不长。由于设置不合理，于康熙十二年裁撤，移至三十里以南的徐公店。

徐公店驿：同上。

沂州（今临沂）驿：何时设立没有查到明确记载。但是，沂州是山东东路上最高的行政领导所在地，沂州驿站应该最先设立。据康熙十二年《沂州志》记载：“自未开辟东路之先，止设白夫四十名，青夫二十名，所供差使不过轿执事”而已。

李家庄驿：康熙十二年《沂州志》记载：“在于南路李家庄添设一驿，自州前驿至李家庄驿计程五十里。”

郯城驿和红花埠驿：嘉庆《郯城县志》载：“甲驿（指郯城驿）在地内县治东，里甲马二十匹，马夫三十名，驿夫一百名。红花埠驿在县南四十五里，驿马七十匹，马夫三十名，抄牌二名，飞递公文马夫二名，药材兽医一名。”在史书中，郯城驿号

称“山东东路之首”。根据这种情况分析，郟城驿的设立应该早于红花埠驿，不晚于山东东路的全线贯通。

从红花埠驿再往南，便出山东地界，下一站便是江苏的宿迁。以上这十二驿站，不是同时设立的，而是根据驿路及其使用情况大体分为两批。第一批是随着这条驿路的通行而设立，有泰安、羊流、蒙阴、青驼、沂州、郟城；第二批设立的时间不等，有崔家庄、新泰、垛庄、徐公店、李家庄、红花埠，青驼随着第二批驿站的设立而被裁撤。第一批驿站的设立以一百里左右为限，在使用中发现不适，遂在中间又增设一驿站，以解除鞍马劳顿之苦。这在《沂州志》上记载得比较详细，“凡江南淮扬京口苏松（淞）常镇等处以及两浙豫章八闽三楚一切上差大人、文武百官一承差等项或自京师出或自各省达于京师，南来北往”，驿站的马夫和马匹，“数十年以来不堪沥血泣陈，尤苦站路遥远，倍于他驿”。“如南出州（沂州）前驿以至郟城，计程一百二十里，北从州前驿以至青驼计程一百余里，再从青驼以至蒙阴计程一百二十余里，往返一次皆二三百里不等，前差未回，后差旋至，驿遥路远，疲毙堪怜。自康熙十二年知州邵士详酌量程途，在于南路李家庄添设一驿，自州前驿至李家庄驿计程五十里，自李家庄驿至郟城驿计程七十里”。“又将北路青驼驿移至徐公店，又于徐公店之北沂水县界内垛庄地方请立一驿，自州前驿至徐公店释驿以及垛庄释驿俱计程七十里，远近适均”。

在清代这条道路上，除了国家使用的这十二驿站之外，尚有一定数量的地方使用递铺。史书记载，从泰安县城到蒙阴县城依次有逯家庄铺、崔家庄铺、荏家庄铺、化马湾铺、关桥铺、敖阳铺、常路铺等，自蒙阴至郟城没有统计。

由于这条驿路是国家命脉，经过的这个地区又山势险要，人烟稀少，对于驿站的人员马匹配备，不仅多而且好。还在一些紧要地点驻扎有军队，如垛庄驿，在青驼还设有巡检司，一切都是为了这条驿路的畅行无阻。

以上各驿站，均于光绪年间逐步废除，为现代邮政所取代。畅通的道路上正在奔跑的不再是马匹，而是汽车。斗转星移，光阴流转，目前这条驿路上的驿站痕迹几乎全部湮灭了，只有新泰市东面十五里的南敖阳尚存石板古道和递铺时代的老屋。



国民党临沂监狱的酷刑

搜 狐

在临沂北门外沭河南岸，有一座万人坑，埋着近万名受难者，其中女性有1000多人。这1000多人里，既有共产党员和土改积极分子，也有普通妇女，还有被敌人掳来发泄兽欲的女学生。这些人大多数是在王洪九当临沂专员时被杀害的。王洪九出身土匪，后来投靠国民党，当了国民党临沂专员。

王匪生性残忍，当土匪时就杀人如麻。来到临沂后，他就专门设了一座监狱，号称“模范监狱”，用来关押和拷打折磨沾“共”字边的“犯人”。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在土改时逃往外地的地主分子，纷纷组织了还乡团，回乡反攻倒算。许多来不及撤退和留下来坚持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土改积极分子被他们逮捕、拷打和杀害。那些被他们认为是“顽固不化”的，就被送到这所监狱里来，继续拷打审问，王洪九任命了和他同样凶狠毒辣的亲信许大胡子为监狱长，专门来审讯拷打这些“犯人”。

临沂监狱是“阎王殿”，是“地狱”。这里各种刑具应有尽有。只要进来，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进到这里来的人是非常不幸的，进到这里的女



国民党还乡团

人更不幸，她们不但要忍受敌人的酷刑拷打和折磨，而且还要经常被看守和打手们奸淫凌辱。有许多在受刑时被拷打致死，死后就被扔在万人坑里。例如苍山庄坞冯秀芹和临沂小李庄张丽华、张瑞华姐妹，被捕前她们都是我党农村干部。还乡团抓到她们后，先是严刑拷打，见她们坚贞不屈，就把她们送进了临沂监狱。

敌人在审讯冯秀芹时，竟然把烧开的热油倒进她的阴户里，把她活活烫死了。在审讯张丽华、张瑞华姐妹时，残忍的敌人把铁棍捅进她们的肛门放在火上烤，姐妹俩竟然被活活烤死。侥幸没有死在酷刑下面的遭遇更不幸。王洪九处决女“犯人”，凡是沾上“共”边的，从来不用砍头枪毙一类的普通手法，而是挖空心思想出各种惨绝人寰的手段，在万人坑旁处决她们，使她们受尽折磨而死。例如著名的“沂蒙三霞”（杨朝霞、张继霞、杜京霞），“四英”（王美英、惠林英、郭启英、许秀英），“五兰”（吕宝兰、尚梅兰、王凤兰、赵凤兰、李晓兰）和著名的母女英烈李芳、夏婉瑜母女，都是在被还乡团严刑拷打后，送到监狱来的。

在监狱里，她们都遭受了酷刑拷打，然后被用极端残酷的手段杀害在万人坑的。其中杨朝霞和郭启英是被敌人用浸了桐油的白布裹起来，头朝下绑在柱子上，从脚上点火慢慢烧死的。尚梅兰和惠林英则是被用一种叫做“郯城呛驴”的酷刑，用开水灌进嘴里活活烫死的。吕宝兰阴户里被插上树枝，裸体游街后被押到万人坑割乳剖腹处死的。李芳、夏婉瑜母女被敌人在阴户里捅进木桩活活钉死的。

在临沂监狱牺牲的女英烈里，职务最高、年龄最大、同时也是受刑时间最长最残酷、死得最悲惨的是刘瑞霞。她是临沂地下县委委员，以开纸箱厂作掩护，领导临沂交通站。刘瑞霞长相俊美，善于交际，利用美色获取了许多情报。1946年初，由于闫秀玲的叛变，交通站被破获，刘瑞霞和她的儿媳妇刘媛媛，地下交通员张建红同时被捕。敌人为彻底破坏我党地下组织，用尽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拷打她们。她们虽然受尽酷刑，但却坚贞不屈。敌人为了获取口供，没有立刻杀害她们，而是长时间地审讯拷打。

王洪九来临沂后，案子落到了许大胡子手里。刘瑞霞三人遭受了吊打、压杠子、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酷刑。许大胡子不但用点燃的香火烧灼她们的腋窝，用钢针和猪鬃捅扎她们的乳房和乳头，用竹签子钉她们的十个手指，用烙铁烙她们的大腿和后背，用酒精灯长时间烧烤她们的肛门和阴户，还把烧红的铁棍捅进她们的直肠和阴道里，把她们折磨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

刘瑞霞、刘媛媛和张建红一直被敌人折磨到1948年底，华东野战军南下，王洪九逃台湾前，决定杀害她们。

农历十一月初二，寒风凛冽，刘瑞霞三人被放到木驴上被押往万人坑。她们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遍体鳞伤，敌人还是不放过她们，一边走，一边用皮鞭抽打她们。随着木驴的行进，木驴背上的木板在她们阴户里上下戳捣着，她们早已溃烂的阴道里的脓血顺着木驴的腿流下来，惨不忍睹。到万人坑后，敌人把她们头朝下绑在柱子上，然后点了灌进她们阴道里的糞油。白色的火苗冒起来，烧得她们的肉体哧哧地响。三个人一起厉声哀嚎起来，那声音真吓人。几天后，她们的声音才渐渐小下去。

山东日照、临沂两地区的 明初“东海”移民

海曲申

今天看莒县村庄资料，观其当地人多半是明初自江苏北部迁来，继而细察周边县市，明代的沂州、莒州周边县市几乎多半是东海移民后裔。莒南人的祖籍和故乡多系江苏古之东海，自东海迁入莒地的时间也多为明朝洪武初年和永乐年间，这是莒南人普遍了解的常识性史实。这一史实，在全县各大姓氏的谱牒、碑文中也多有记载。《重修莒志·氏族上》记载：“氏族之兴，肇自古昔，以官以邑，各有本源，莒之已羸，今竟闾如，晋南以来，诸葛、徐、刘、臧氏诸族，文学勋名，大显于世，而求其遗裔，渺不可得。今之诸氏，多于明初来自东海，以前皆无可考。”也明证了莒南人的祖籍多为江苏东海。而查阅《莒南地名志》发现：在莒南现在有的759个行政村，994个自然村中，约近百分之九十五的村来自东海，其姓氏包括张、王、李、陈、孙、刘、徐等100多个姓氏，更明证了东海是莒南人的祖籍和故乡。为什么在明洪武初年和永乐年间，大举北迁并在莒地落户生根呢？查阅《明史》《重修莒志》《胶南移民考》等史料，参考各大姓氏的家谱、族谱综合分析之，大致认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原因：

一是宋金时期的南北战争和宋王朝的南迁，造成莒地大量人口消亡和迁徙。莒地东近黄海，气候温和，山川秀丽，土地肥沃。历史上不仅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好地方，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宋金南北战争爆发后，莒地作为战争双方的拉锯战场，战争连年，生灵涂炭，人民群众房屋被毁，田禾遭劫，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为躲避战争，百姓们纷纷举家外逃，造成莒地人口锐减。宋金战争结束后，腐败无能的北宋王朝为逃避金人的追歼，逃亡到江南，并以长江为界，苟且偷安。在北宋王朝南迁之时，莒地部分北宋遗民不堪忍受亡国之辱和金人的欺凌，也纷纷举家随宋王朝南逃，再一次造成莒地人口大面积的消亡。对此《重修莒志》记载：“盖赵宋南迁，隶属金元，板荡流难，而搢绅编户，具祸以烬，岂不痛哉！”

二是宋王朝南迁后，占据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的金（女真族）、元（蒙古

族)两大少数民族,为争夺北方的土地、人口、政权,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终以元军战胜并取代金朝而雄踞北方广大地区。元军为征讨南宋王朝,在两淮地区大量屯兵,并在土地肥美的沂沭河以东地区,驱赶人民,纵兵牧马,致使本受战争蹂躏的宋朝遗民,再受背井离乡的煎熬。莒地出现了“蓬蒿四十里,村舍两三家”的荒凉景象。

三是元朝末年,由于元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战争非常残酷。元军与地主武装联合对农民起义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莒地作为元末农民起义军活动频繁的地区,也连遭战争重创,人口十亡八九,真正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无人烟”的境地。

四是莒地除了是宋金南北战争和元军同农民起义军战争的重灾区,还饱受地方军阀、土匪和流寇的洗劫。据《重修莒志》记载:“宋宁宗嘉定四年,益都人杨安儿起掠莒(州)、密(州),安儿死,其妹四娘子统其众,复掠食至莒之磨旗山(马鬃山)。十一年春正月,李全袭破莒州。夏五月,金黄阿鲁答袭破李全于莒州。”记载了杨安儿、杨妙真(四娘子)的红袄军与金兵在莒地特别是莒南马鬃山附近攻杀不息的战事。又据《陈氏族谱·序》中记载:“始祖本东海大村人也,稽自元末之衰,山东总兵有毛一清(中国通史记载为“毛贵”)者,乘元明未定之际,聚雄兵百万,横行一区,大肆杀掠,鸡犬扫荡,人民逃难,千里无烟,房屋尽空,荆棘满地,青草遍野。斯时也,父子朝食而暮不保膝下同欢,夫妻夜聚而昼难定旧巢之复眠。母南子北,兄东弟西,寂寂寥落,虽有山东之名,而无山东之实矣。”军阀割据,匪寇称雄,也是造成莒地人口消亡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战争过后的瘟疫,以及旱灾、水灾、蝗灾等自然灾害的重叠出现,也是造成莒南地方人口消亡的重要原因。

通过以上史料证明,莒地经过连年的战争消耗和匪患的洗劫、朝代的更替,人口大面积迁徙、消亡,至元朝末年,已成为人烟稀少的旷野。明朝建立后,为巩固边防,恢复经济,让人民安居乐业,实现富民、强兵、固国的战略决策,朱元璋首先使朝廷上下均明了“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决定了招募流民回乡、移民垦荒、移民屯田(分民屯、军屯两种)等战略决策,一场大规模的历时50余年的大移民就此拉开了序幕。

明代的大移民,自洪武二年至永乐年间先后10余次,共向山东、河南、安徽、陕西、四川等地移民数十万人。最初的移民基本方针是从人口稠密、经济富庶的广东、山西及江南的苏、浙、嘉、湖等省份、地区,以“三丁抽一”的办法,责令成年男子迁徙到人口稀少地区。此办法刚刚推行不久,朝廷紧接着又严令推行“二丁抽一”的法案,明令:凡一口之家中,以男为丁,一户中若有男丁两人者,必须分野,以加快大面积移民的速度。对此,《陈氏族谱·序》记载:“明太祖登基,首命汤和任山东宣抚使,招济离散百姓,但杀掠数十年,人民荡然,即有复业者,皆漏网之鱼耳。群臣本上,明太祖凄然,复命各省由人口稠密者三丁抽一,务携妻子各占地方。该抚使给其牛、种,垦野修庄,暂为栖身之处。”又载:“始祖六人自东海大村来我山东日照县西车疃桑行地,盖屋两间,锅造未干,而国命叠张,圣旨下:有二人同室,不分野而居者,依例问罪。”由此可见当时移民的决心之大,法令之严。

明朝大移民的分布很广,以河南、山东、河北为迁入人口最多,在山东以鲁西南、鲁东南迁入移民最多。鲁西南以滕州、枣庄、微山等为主要迁入点,迁入人口多为山西洪洞县人。鲁东南地区临沂、日照两市迁入人口除部分来自安徽、山西洪洞县,多为江苏东海。东海人外迁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东海地处沂、沭河下游

平原富庶地区，经济繁荣，人口稠密，是自秦、汉以来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虽同莒地一样同遭战争的灾难，但比较莒地而言，物质基础雄厚，人口密度高，基数大，对战争的承受能力也远远超过莒地。而且由于受经济的支持，人口繁衍速度较快，成为大移民的人口迁出地之一，也就顺理成章。二是元末明初，元末起义军张士诚残部和倭寇勾结横扰沿海，沿海被迫实行“海禁”以“备倭”。洪武年间，明政府就下令“片帆不许入海，如敢有私下与诸蕃互市者，必之以法”（《明太祖实录》）。明初海州云台山（今连云港花果山所在）尚在大海中。这样的海禁森严，致使海船断绝，商船无法往来，扣船封海，沿海岛民鱼无售处，货无购处，海州岛民失去了生活所依，逃亡者（外迁）愈众。其后海州地区为了封海截海，杜绝岛民与张士诚残部的联系，凡沿海居民悉令内徙。因此，综合分析之，第二个原因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而莒地作为与江苏东海相距百里的近邻，气候、物产、风俗习惯与东海基本相似，东海人要外迁，不愿背井离乡走得太远，选择莒地作为第二故乡也就情有可原，可想而知了。

需要说明的是：明、清时期各大谱牒所言称的东海（海东），其故址与区域、范围是指现在的江苏东海县以东，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连云港市所辖的赣榆、东海、灌云、灌南4县和新浦、海州、连云3区等更广义上的大东海，轴心在连云港，而决非狭义上专指的现东海县狭小的区域范围。

据史料记载：连云港古称瀛州，秦时称朐县，属东海郡。东魏武定七年（549年）始称海州。唐代以后，除元代一度称海宁州外，其余各朝连云港一直延称海州。清雍正二年（1724年）升为直隶州。民国元年（1912年）废州设县，海州改称东海县。1933年设立东海行政区。同年，陇海铁路终端港建成，因面向连岛，背依云台山而取名连云港。全境解放后设立新（浦）海（州）连（连云港）特区。1949年10月建立新海连市。1950年5月，东海县与新海连市合并为新海县，12月又恢复新海连市和东海县建制。1961年10月1日新海连市因港口而正式定名为连云港市。在这期间，东海县的行政中心一直在海州（连云港），直至1957年东海县城才由海州搬迁至牛山（今东海县城驻地）。

东海一词作为地名是以东海郡的形式出现的。汉在秦置三十六郡的基础上，为加强地方领导，又在不少地方增加了大量的郡置，东海郡就是在那个时候和背景下出现的。据《中国古地名考》记载：东海郡，汉置，故址在山东旧兖州府东南、至江苏邳县以东至海皆是，治郯，在山东郯城县西南30里。其区域范围包括今天的山东的枣庄、临沂、济宁局部，江苏徐州的新沂、邳县、睢宁，宿迁的沭阳，连云港的赣榆、东海、灌云、灌南等地。另记载：南朝宋置，东魏改曰海西，隋废，故治在今江苏涟水县北。东魏置，隋废，故城在今江苏灌云县郁州。东魏曰海州，隋改置，元废。东晋侨置于海虞县（今江苏常熟）北境，旋移京口（今镇江）。隋唐以海州为东海郡，治朐山（今连云港西南海州镇）。另据史料记载：古之东海郡，有二处。汉代的东海郡在今天山东省郯城一带；东魏及隋唐后的东海郡，相当于今天江苏省东海县以东、淮水以北地区。这说明东海作为行政区划的概念，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而不同的时期的东海，其行政中心也分别在今山东的郯城和今江苏连云港所辖区域内。史鉴于此，我们不难看出，明清时期各大谱牒所言称的东海，当为东魏及隋唐以后的所指的东海郡范围，也即连云港的故称海州的区域范围。

军旅一枝花

——女汉子气息的牟星

安迪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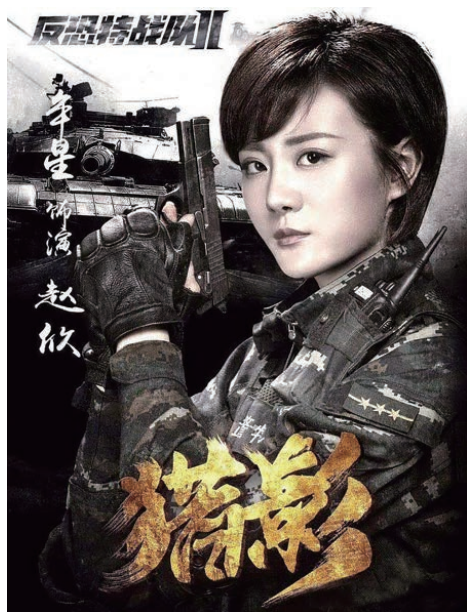
牟星因在《我是特种兵之霹雳火》的精彩演绎而被大家认识，她的演技也被观众认可，牟星女汉子的一面，在剧中可谓是军旅一枝花。生活中的她努力而又低调，她也在尝试各种不同的角色，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近牟星吧！

此前牟星在《我是特种兵之火凤凰》中客串出演蜂鸟，在《我是特种兵之霹雳火》中勇挑大梁饰演女一号谢思潇，出场便是一场精彩的狙击战，指挥若定，英姿飒爽，男友力爆棚，被观众盛赞为国民男友。

《我是特种兵之霹雳火》中，牟星饰演的谢思潇原是武警中尉、警犬技术员，手下带的都是精干的男兵，由于战绩出色被任天野饰演的飞虎旅教官高胜寒看中，欲将其“挖”走，原单位领导却死活不肯放人，谢思潇成了人人哄抢的“香饽饽”。高胜寒亲自前来迎接谢思潇，却被谢思潇嫌弃，一向带男兵的她并不愿带女兵，直到听说新岗位是飞行员才恢复活力，并表态一定会出色完成任务。据说牟星为了更贴近角色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将一头秀美长发剪短变成了假小子，气质与谢思潇十分契合，再加上剧中爽快硬朗的作风，仿佛牟星就是为谢思潇而生，难怪剧中领导都要说：“她其实就是个男的，只是投错了胎。”

牟星的出色演绎很快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关注与认可，好评如潮，“星哥”“星弟”叫不停，“国民男友”的话题一度被拱上话题榜首。有人喜欢牟星的女汉子气息，“不做作、不娇气，打起来帅气，笑起来甜美，我就是看到牟星才决定追这个剧的。”有人喜欢牟星的男友力，“这简直就是军旅版的太子妃，求不要让她演感情戏，根本不想看，只想看她撩妹啊！”更多的忠实粉丝更关注牟星的演技，“一直都这么低调又努力，但是演技一天天的进步，我们都看在眼里，感恩遇见最帅气的你！”其实长发的牟星也十分美艳靓丽，也并不介意“帅气”“女汉子”之类的评价，有时甚至跟着大家一块自我调侃一番，“小爷生活中就是男扮女装！”

如今备受关注的牟星其实在之前也没有想到自己可以挑战此类角色，“我一直追求的是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在拍特种兵之前我也没想到自己可以驾驭这么爷们儿的角色，事实证明，效果还可以。可能就像



牟星，山东临沂人，2011年毕业于上海师大谢晋影视艺术学院。曾获18届环球皇后大赛临沂赛区冠军。

天野哥在戏里说的，有些东西是天生的，与性别无关。”

牟星出道以来尝试了诸多戏路，但近年多演飒爽英姿的女战士，已经坐稳“军旅一枝花”的首席。出演《反恐2》的契机，是2015年出演刘猛执导的《特种兵之霹雳火》，使尤小刚导演关注到她。在个人气质方面，部队文工团的经历给她由内而外的经验辅助，多次出演军旅戏使她在接类似题材时充满自信。

刚开始进入《反恐2》的剧组时，与黄维德在剧中演夫妻的牟星心中还是略有忐忑。她所饰演的女主人公赵欣，性格温婉知性，既是英勇的战士，又是丈夫的贤内助，“首度饰演资历深又为人妇的军人，尤导和我说要稳一些”。为了把角色塑造得更真实，除了收敛自己活泼好动的性格，她也私下向过去文工团的前辈们请教并做功课。“其实生活里的我和在组里完全是两种性格”，牟星爽朗地笑道，“剧组不少工作人员都开玩笑称我为‘大哥’，觉得我比较爷们。”她也会敦促演对手戏的演员背台词。不矫情，不娇气，这是她一直以来的行事风格。

牟星进组定完妆后，第二天起便不停歇地拍了一个星期。“缓冲时间很短，睡眠时间也比较少。现场节奏非常快，但我喜欢这种严肃的创作氛围”。各部门各司其职，所有主演全部在组，完成整个周期，“高难度的戏我们都自己完成，大家跨年都在拍摄没有停工”。认真，是她对创作团队的评价。开机前，与导演和其他演员沟通走戏，开机后一气呵成，“上手快”成了牟星越来越娴熟的技能包。在这部戏中，牟星的戏份以文戏为主，面对种种突如其来的变故，不能言说的苦楚，撕裂的情感体验，她调动全部的经验 and 想象去完成角色。她觉得，一直以来不大自信的文戏这次得到了很好的锤炼。“光是哭戏，我就有十种方法了。”牟星笑言。

年幼时学过舞蹈，她在肢体协调方面更占优势，再加上1米72的身高，打起来很有型。“武术指导觉得我比替身打的好，一教就会，所以就让我自己来打”。渐渐的跟同期多演女军人的同行比，打戏成了她的一项过人技能。潇洒归潇洒，受伤是免不了的，牟星提起过往曾有演员做动作时断了五根肋骨，“我也有过爬窗户被铁丝划破肉，包裹好了第二天把纱布换成创可贴接着拍的经历。”

这股“拼命三郎”的劲头，成就了她的霸王花戏路。在牟星心里，2015年的《我是特种兵之霹雳火》使她上了一个台阶，早先她还怕驾驭不了武戏角色，然而，在尝试拍摄一天后倒看回放时，便打消了之前的顾虑。用她的话来说，“拼命将身上这股劲放大”，便是当时的诀窍。家里有军人的背景，以及自己之前的文工团经验，都能帮到她顺利塑造角色，“要感谢刘猛导演，发现了我有这种潜力。之前从来没演过部队的戏，一演觉得自己还行。



南下云南边陲 (三)

——记父亲张明远

张小平 张昆华

我们的父亲张明远，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沂南县岸堤区（当时属沂水县）塘子庄。曾就读私塾初小、高小。高小毕业后投考了沂水县暑期教员训练班学习两个月，在本庄小学任校长（义务职），1929年底投考沂水县师范讲习所，毕业后被聘到岱庄小学任教员。从那时，父亲即开始了教员生涯。

1937年下半年，父亲调回本庄小学任教（兼任塘子乡副乡长、主管教育）。抗日战争爆发，日军沿临蒙路向临沂进攻，塘子乡长郑文涌弃职而去，局势一度混乱。1938年初，父亲随即出任了塘子乡乡长。

1938年春，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开赴岸堤，至夏天，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和四支队一部也进驻岸堤，并且在岸堤设立了军政干部学校。受环境影响，父亲接触了许多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和刊物，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很快投入了革命阵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于1938年7月入党后，仍被党组织任命为塘子乡乡长，党内任乡支书记，主要任务是开展对敌斗争，发展党员，在农民自卫队的基础上（后改编为独立营）发展地方武装。



张明远夫妇

1939年12月，父亲调任沂南九区任武装委员兼区中队队长。1940年2月，区中队改编为县大队一连，任副连长，党内支委，同年3月调沂南县政府（当时称南沂蒙办事处，从沂水县分离）任视导员，科员等职；同年12月调任县府视导团主任，主要任务是到各区、乡帮助建立政权。1941年6月，调任沂南县垛庄区区长，党内分区委员。这段时期主要工作是拔据点、反扫荡、与敌伪展开拉锯战（分区书记江波）。在最艰苦的时间，采取隐蔽作战、钻深山、打游击的方式与敌人对抗，虽然环境艰苦，但同志们的情绪很高涨，坚定信心，顽强抗击，终于坚持到1942年1月反扫荡取得重大胜利，地区得到解放。同年2月调任界牌区区长。

1944年8月，中共沂南县委调父亲到鲁中区党委党校学习，至1945年日寇投降学习结束。1945年9月调到淄博特区工作，分配到崔军区任区长（系新开辟的区），党内分区委员。1947年1月任该区书记兼区长，1947年10月调到淄川县委武装部任部长，1948年12月带民工支援淮海战役，任淄博特区民工支队支队长兼一大队政委（淄川、博山两县民工）。1949年3月，民工支队服务期满，民工复员。上级指示留下区以上脱产干部，集训学习，动员南下支援渡江战役。

渡江后，父亲即被派到华东支前委员会第一民管处任政工队长。几天后，又被调到无锡市成立了粮食储运总站。之后上海战役结束，支前任务随即结束，支前干部集结学习结束后，到苏南干部大队五中队任指导员（驻南京）。后又动员编入西南服务团，任一支队一团五中队指导员，于10月1日进军西南。12月底到达重庆后，即被分派到川东区党委，任机关总支书记，后分派到川东行政干部学校任组织科长、组教科科长、党内总支书记。

1952年9月15日，父亲离开川东，远调云南，任云南省委党校党委委员，先到丽江支部帮助初步整党。1953年6月，被调到省纪委任办公室副主任。1955年8月任省委监委监察处长。1961年12月，省监委成立来信来访处，父亲调任信访处处长。1964年3月调任察审处处长。

父亲参加革命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曾参加了孟良崮、淮海、渡江、上海几个大战役，但父亲从不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在战争年代，他还曾经用自己教书时积攒下来的工资120多元大洋买了一支二十响参加抗日工作，之后又将孟良崮山南的几十亩地卖掉，买枪、买自行车用于抗日活动。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坚持与日本侵略者对抗。有一次父亲和警卫人员到边远的一个村庄开展工作，因路远天黑赶不回驻地了，就在该村的一个瓜棚里过夜。由于汉奸告密，与日伪军遭遇，警卫员为掩护父亲，壮烈牺牲。瓜地边的地里有很多豆茬，父亲赤脚奔跑，双脚被扎得伤痕累累。这样的遭遇，不下数次。直到解放后，父亲对这位烈士的后代很关心，经常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建国后，父亲一直从事党的纪律监察工作，工作中认真负责，业务能力强，为人谦和，不贪图享受，不搞特殊，还经常拿出自己的工资，去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下级。

1979年10月31日，我们敬爱的父亲，离我们而去。父亲的一生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为人正直，再艰苦的环境，父亲的革命意志始终坚定不移。

市委党史研究院开展“双报到”志愿服务。11月25日，市委党史研究院组织在职党员，到兰山区兰山街道通达社区开展“双报到”志愿服务活动，并组织了环卫设施捐赠活动。参加活动的党员共清理路面1500余平方米，清除垃圾100余堆，帮助社区居民改善了小区居住环境；与社区负责人、红领书记座谈交流，实地查看并统计了社区内垃圾箱等环卫设施数量及安置情况，捐赠大型垃圾箱10个。

市委党史研究院到沂水县调研开发利用服务基地建设。11月26日，临沂市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唐少清等一行到沂水县龙家圈街道、泉庄镇、院东头镇等调研沂水党史（史志）开发利用服务基地建设情况。

市委党史研究院（市地方史志研究院）荣获“全国地方志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11月27日，中国地方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全国地方志工作先进典型的通报》，市委党史研究院（市地方史志研究院）被评为全国地方志工作先进集体。

2019年1月，我市党史、史志部门机构合并，成立市委党史研究院（市地方史志研究院），实现了党史史志工作的融合发展。新机构成立后，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稳步推进新时代党史史志事业转型升级，“打造红色堡垒村助力乡村振兴”经验做法被省委党史研究院转发全省学习推广，党史史志书籍编修、志书年鉴编纂、场馆和信息化建设、党史史志成果开发利用等各项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市委党史研究院开展“守初心、践使命，做新时代合格党员”主题党日活动。11月28日，市委党史研究院组织全体党员赴市廉政教育基地、华东野战军纪念馆参观学习，开展“守初心、践使命，做新时代

合格党员”主题党日活动。

市委党史研究院向临沂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受理中心捐赠图书。

11月29日，临沂市委党史研究院举行向临沂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受理中心捐赠图书仪式。捐赠《沂蒙根据地历史资料汇编》《沂蒙南下干部》《沂蒙精神志》《临沂年鉴》等图书300余册。

《沂蒙精神志》出版发行。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临沂市委党史研究院编撰的《沂蒙精神志》，近日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包括概述、大事记、沂蒙精神的形成、传承、弘扬、宣传、研究、地位和影响、代表人物、纪念设施等。该志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是国内第一部关于中国革命精神的专业志书，填补了沂蒙精神研究的空白。

《沂蒙抗日根据地图志》出版发行。由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院（临沂市地方史志研究院）编撰的《沂蒙抗日根据地图志》，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全书包括概述、大事记、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巩固扩大根据地、根据地建设、人物等，共计15万字，收录图片2259余幅。志书形式新颖，文字精炼，主要以图片的形式，真实记录了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历史面貌，为人们铭记、研究沂蒙革命根据地历史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全市党史史志开发利用现场会在沂水县召开。12月13日，全市党史史志开发利用现场会在沂水县召开。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院东头镇桃棵子村沂蒙红嫂祖秀莲纪念馆、沂蒙乡医文化展览馆、峙密山居和蒙山龙雾茶博园等4处党史史志开发利用服务基地。沂水、兰陵、沂南、蒙阴和莒南5个县区作了典型发言。李洪彦院长做了总结讲话，要

求牢固树立保护利用意识，增强使命担当，以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的姿态，推动党史史志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更好地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全市党史史志业务骨干培训班举办。12月15日至18日，全市党史史志业务骨干培训班在临沂举办。市委党史研究院及各县区党史研究中心业务骨干共60余人参加培训。市委党史研究院院长李洪彦作开班动员讲话，并作了题为《如何做好地方党史研究》的专题讲座。

我院打造红色堡垒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做法被省委党史研究院转发全省推广。近日，省委党史研究院下发《关于印发临沂打造红色堡垒村助力乡村振兴经验做法的通知》，在全省推广临沂市委党史研究院打造红色堡垒村，助力乡村振兴的经验做法。

费县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开展“党史润童心，红色基因代代传”活动。11月1日，中共费县县委党史研究中心联合县实验小学、县新华书店到费县梨园实验学校举行“党史润童心，红色基因代代传”活动启动仪式，赠送党史图书及学习书籍近1000册，书架15个，以及部分校服等物品。

《中国共产党临沭县村级组织史资料（1939—2018）》出版发行。近日，由中共临沭县委组织部、中共临沭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临沭县地方志研究中心）编纂的《中国共产党临沭县村级组织史资料（1939—2018）》出版发行。该书主要收录临沭县现辖区域内自1939年以来村级党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历史沿革资料。

《临沭年鉴2019》出版发行。近日，中共临沭县委党史研究中心编纂的《临沭年鉴2019》，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